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DE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 德州十大历史名人文化读本

作者 周吉星 张立山 史兰芳 康荣锋 高文英 宋晓丽

付吉军 吴朝辉 王婷婷 李金甫 李东筱 高天宇

时间 2020年9月30日

## 序言

樊兆杰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高等职业学校要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教育方针，从“德”“能”两个维度对高等职业教育确定的人才培养定位的生动描述。其中，“高素质”就是从“德”维度，“技术技能”就是从“能”维度对高职人才培养的准确界定。那么，如何高水平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呢？其中，坚定职教文化自信，激发“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推进以文化人，无疑是重要的育人方式。

“德能”文化由德州职业技术学院率先提出的概念，内涵丰富，具有较强的理论“张力”。“德能”文化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崇德尚能、以德为先、德能兼修、德能并进。崇德尚能是理念，以德为先是根本，德能兼修是过程，德能并进是目标。在实践探索层面，学校确立了“崇德尚能、敬业乐群”的校训，铸建了标志性建筑“德能鼎”，建设德能文化广场和德州十大历史名人铜像浮雕长廊等。

“德能”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德州职业技术

学院之所以在全国能率先提出“德能”文化理念，是与对德州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弘扬是分不开的，对德州十大历史名人的“德能”思想的研究与探索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德州十大历史名人文化读本》就是通过对在德州历史上工作、生活过的实绩突出、影响较大的董仲舒、东方朔、窦建德、颜真卿、李之仪、邢侗、田雯、卢见曾、宋哲元、任继愈十位代表人物的主要经历、典型事迹、重要成就、代表作品等的分析与研究，旨在探究与传承他们的“德能”思想，从而给读者以启迪和教益，尤其是给高职学生以“德能”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帮助其早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

# 目 录

1. 董仲舒·····	1
2. 东方朔·····	22
3. 窦建德·····	40
4. 颜真卿·····	56
5. 李之仪·····	75
6. 邢 侗·····	89
7. 田 雯·····	102
8. 卢见曾·····	112
9. 宋哲元·····	132
10. 任继愈·····	148

# 董仲舒

## 一、生平简介

董仲舒(约公元前 179 年-前 104 年)，西汉广川国(下辖现在的德州，现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著作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他年少勤奋学习，熟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无论进退举止，遵守礼仪，时人师尊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所采纳。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 10 年；因言灾异之事，宣扬天人感应，触怒龙鳞，被罢免江都王相后，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公羊春秋》；汉武帝元朔四年(前 125 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 年后托病辞官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武帝尊重。公元前 104 年病故，享年约 75 岁。死后得汉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 经典故事：

#### (一) 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

第一年花园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学孔子的《春秋》，背诵《诗经》。

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头都顾不上抬一抬。

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之

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成为儒学大师。

## （二）传授儒学

董仲舒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他 30 岁时，开始招收大批学生，精心讲授儒家经典。他讲学时，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

董仲舒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儒学造诣很深，讲起课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相传，有个小男孩非常聪明，但是个聋子。他见同村小孩背着书包到董仲舒下帷讲诵的地方去上学很羡慕，跟母亲比划着说他也想去听课。母亲连连摇头，跟他比划道：“孩子，你是聋子，什么也听不见，怎么能听到先生讲课呢？还是在家干活吧。”可这个聋孩子很倔犟，又跟母亲比划说：“我想去听听，听不见就看先生的嘴怎么动，我回家再慢慢琢磨，能听懂多少算多少。”见聋儿非要上学，母亲心软下来，来到董故庄村拜见董仲舒。这位母亲一见董仲舒就跪下，含着泪说明原因，恳请董仲舒收下聋儿。董仲舒连忙把聋儿的母亲扶起，答应道：“可以让他去听听，听懂更好，听不懂也不要紧。”聋儿得知董先生让他去听课，高兴的蹦起来跟母亲比划道：“我今天太高兴了，我一定听先生的话好好学习。”第二天，他就跟着村里的小伙伴一同上学去了。聋儿一开始什么也听不到，光看见董仲舒的嘴动。但他不气馁，坚持听下来。久而久之聋儿一看董先生说话口型就知道个大概齐。聋儿跟着董仲舒学了好几年，竟也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邻村的一个哑巴孩子听说后，也缠着母亲要去听课。哑巴的母亲找到董仲舒，董仲舒也答应了。这位哑巴学生学习很刻苦，相传后来竟能开口读书了，还成了一名好学生。后人据此在董仲舒的塑像旁，塑了一个聋学生和一个哑学生，以纪念董仲舒在教育事业上为人民做出的突出贡献。

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

## （三）天人三问

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 （四）规劝刘非

董仲舒对策后，被汉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刘非不要称霸。

## 二、主要成就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 （一）明确提出“大一统”思想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是，黄老之术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

## （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加之儒家思想符合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需要，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走上与政权结合的道路，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影响中国历史达两千年。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史上承先启下的关键人物。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认为：仲舒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发展儒学做出巨大贡献。

## （三）社会“更化”

秦末农民战争导致生产力遭到破坏，汉朝初年，调整生产关系，在政治、思想上统治者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生产力逐步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随着形势不断变化，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的弊端日益显著，中央集权被削弱，诸侯国呈现出尾大不掉之势，沿用秦法统治人民日益引发人民的不满，土地兼并问题越发严重，等等。董仲舒提出“更化”（即改革、调整之义）的思想。

### 1. 刑德兼治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汉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

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他上疏汉武帝“任德教而不任刑”，即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但也不要放松刑律大法的制裁，应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

这种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方式，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对我国的国家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 2. “调均”

随着统治秩序的确立，西汉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皇亲诸侯王及其子女，巧取豪夺，扩大自己的领地。一些高官和发大财的商人都占领许多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汉书·食货志》中记载，董仲舒提出“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他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

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稳定和统一。

## 三、“德能”思想

### （一）静气勤奋，治学不倦

“静”与传统的哲学、美学概念“虚静”有相似之处，强调的是排除杂念，心态平静的状态；“气”此处指的是精气、元气。“静气勤学”指的是始终保持虚静淡泊的心境，并在这种心境中聚精会神、勤奋持续学习，这体现出对学习、职业的重视，面对诱惑等外界因素影响时对学习、职业的坚守，也体现出调整 and 保持良好心境的能力。

董仲舒还在《春秋繁露》中指出：“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汉

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回复汉武帝的对策时说，“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颜师古注：“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北宋大史学家对董仲舒刻苦读书、专心治学的精神十分推崇，作有《独乐园咏·读书堂》：“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董仲舒静气勤学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幼年和早年，也用实际行动坚守了一生。无论是被授予博士官，还是任江都相，被贬为中大夫，复任江都相，任胶西相，获罪被赦……都潜心研究《春秋公羊传》、著书立说。特别是获罪被赦免后，董仲舒再不想当官，从此闭门谢客，以“三年不窥园”的精神，一心一意修学著书研究学问。他晚年著作颇丰，著成《春秋繁露》一书，还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正因为董仲舒坚持静气勤学的思想，具有扎实的学识，才能顺应时代大势，对儒学进行改造，著作《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名篇，成为“儒者宗”。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评价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董仲舒静气勤学的思想影响了学生。《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太史公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效仿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严谨治学精神，刻苦钻研，攻读天文、地理、历史，打下良好的知识根基；立志继承父志修史著传后，从20岁起用10年时间游历祖国各地，行程8万公里，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饱览了名山大川，丰富了阅历，拓展了胸怀，了解到许多风土人情、百姓疾苦，并在先生激励下，发愤著书，完成《史记》。

## （二）胸怀天下，顺势而为

董仲舒生活的年代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西汉初期，刘邦大封刘姓和功臣，出现了许多诸侯国。诸侯国掌握着官吏任免、军队、经济等大权，

对中央集权产生了威胁，特别是汉景帝时，诸侯国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给国内生产力造成破坏，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西汉王朝成功平叛，但是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仍没有消除，到了汉武帝时还发生了淮南国叛乱。

内忧的状况没有解决，外患也不断加剧。西汉初，被迫对匈奴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换来暂时的和平。匈奴两次大规模入侵在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亲率十四万军队入侵汉朝，匈奴侦查部队一度来到长安附近的甘泉宫，直接威胁汉王朝的统治中心。经过休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随着国力的雄厚，反击匈奴势在必行。这也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为对匈奴战争做准备。

内外形势，迫切要求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董仲舒准确分析研判国家发展大势，从研读《春秋》中找到灵感，提出“大一统”思想。虽然身为布衣，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时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强调什么是“大一统”，侧重于概念的内涵和主要内容。是宇宙的规律，也是古今必须遵循的准则。那么“大一统”统一到哪里呢？从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层面，就是地方统一服从中央，加强中央集权；在皇帝与天下人之间的关系层面，就是“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也就是天下人像对待父母一样，归心于皇帝。所以，大一统，分为多个层面，归根结底是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帝的权威。第二个层次涉及到如何实现“大一统”，强化的是实现“大一统”的路径。董仲舒主要介绍了从思想方面强化“大一统”，即把“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作为汉王朝的指导思想，进而统一全国的思想，同时打压“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之外的百家思想，即我们经常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思想主张顺应了封建帝国发展强盛的需要，特别是用思想上的统一巩固国家的统一，为集中力量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避免皇帝独断专行，有效制衡皇权，保持国家政治清明，董仲舒又对“大

一统”思想进行完善，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董仲舒在回复汉武帝时，提出“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可以说，受历史条件的影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在科学上是落后的，有些说法是不妥的，但是，董仲舒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强调君主应受上苍约束，“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不能为所欲为，无疑具有牵制皇权的作用，对于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董仲舒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大一统”的思想，在实际行动，也不屈服于外力，作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时，先后劝说江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打消谋反称霸的念头，引导刘非、刘端安心治理诸侯国，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

此外，董仲舒胸怀天下，强调礼乐教化、任人为贤和为国育才方面。他主张兴太学，开创了国家举办高等学府的先河。他长时间收徒讲学，为汉帝国培养大批人才。

### （三）弘扬正义，提倡公平

公平正义是董仲舒追求的理想，也是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在收徒讲学时，不嫌弃学生的天资禀赋，收聋儿、哑巴等残疾人为徒，维护教育公平。

西汉初期沿用秦朝的律法，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比如，虽然缇萦感动了汉文帝，救出了父亲，汉文帝也废除了一些严刑峻法，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富商、官吏任意残杀奴婢的现象十分严重。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情况？董仲舒继承孔子儒家传统，强调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应以德教为主、刑者为辅，“阳为德，阴为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同时，强调君主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这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这摆正了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说明了统治者在国家治理得失方面应该承担道义和责任，维护了道义上的公平。

他对统治者利用强势地位，搜刮人民提出批评。“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羨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为了避免人民因贫苦而铤而走险，他提出，“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就是堵塞兼并之路，吃国家俸禄的人，要安于本分，把治理国家的工作做好，而不要与民争利，薄赋税，这样天下的财富就相对均衡，老百姓也有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财富。他认为，这是“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否则“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与此同时，董仲舒还希望统治者不要与民争利、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主张，体现了董仲舒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董仲舒指出，在考核评价官员时标准不够科学，亦即没有体现出公平正义。“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即官员政绩考核以是否称职为标准，不是熬资历和年头，而当下评价的标准是“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这就导致“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董仲舒认为，要任人唯贤：一是养士，“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二是推荐贤者，即建议汉武帝“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 **（四）传承创新，影响深远**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在儒家学派，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使儒家成为延续 2000 多年封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

在传承方面，董仲舒精通“六艺”，弘扬儒家“仁政”“德”“和”等核心概

念，坚守“义利”之辨，崇尚“忠孝”“礼乐教化”，提倡选贤任能，等等。

在创新方面，董仲舒在继承、吸纳、融合先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做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大一统”理论体系，构建了“五主体”（“天”、“道”、“君”、“臣”、“民”）关系模型，并延伸出“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德刑并重以德为主’”等治国方略。

“五主体”关系模型中，“天”是宇宙的主宰，是善的，因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道”是治理国家的准则、规律，“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和“君主”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仁义礼乐皆道之具，王道通过礼乐的力量可以持续发挥作用，佑护新的君主，君主不遵守“道”则国家衰弱，君主发奋遵守“道”则国家将复兴。如果君不遵守道，天降对君主进行提醒警戒。君与臣之间，要符合纲常，君为臣纲，君主选贤任能，臣子效忠君主。臣是君与民之间的中介，受君的委托统治人民，臣与民要各遵其位，臣子不能恃强凌弱，兼并民的土地和财富。民有家，也要遵守“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通过构建和谐的关系，达到天下太平、天下大治的目标。

五主体关系模型是认识董仲舒思想的参照系，在这一参照系下，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董仲舒通过整合的力量，把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四、作品赏析

### 原文

#### 《天人三策（节选）》<sup>[1]</sup>

… …

道者，所繇<sup>[2]</sup>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sup>[3]</sup>，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sup>[4]</sup>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sup>[5]</sup>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sup>[6]</sup>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諄谬<sup>[7]</sup>失其统<sup>[8]</sup>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sup>[9]</sup>，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sup>[10]</sup>。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sup>[11]</sup>，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sup>[12]</sup>。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sup>[13]</sup>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sup>[14]</sup>，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sup>[15]</sup>。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sup>[16]</sup>。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sup>[17]</sup>。《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

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sup>[18]</sup>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sup>[19]</sup>。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sup>[20]</sup>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sup>[21]</sup>。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sup>[22]</sup>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颡为自恣苟简之治<sup>[23]</sup>，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sup>[24]</sup>。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sup>[25]</sup>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祿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祿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祿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sup>[26]</sup>，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 注释

[1] 《天人三策》是一本汉武帝征问，董仲舒作答所出的策略，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主要建议：1.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2.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 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4. 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2] 繇，读音 yáo，动词，由，遵循。

[3] 没[，读音 mò，离世、去世。

[4] 夫虞氏，即舜帝。

[5] 莫，没有。

[6]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取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人能够把道发扬光大，不是道能把人发扬光大。”

[7] 諄谬，荒谬，不合道理。諄 bèi，古同“悖”。

[8] 统，即好的传统。

[9] 臣听说收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王 wàng，古代指统治者谓以仁义取得天下。

[10] 《尚书》中说：“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裏，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

[11] 不中，读音 bù zhòng，意思是不适当。

[12] 怨恨憎恶就会在上层社会中积累蔓延。

[13] 缪盩，失调。缪，荒谬；盩，lì，乖戾。

[14] 端，发端、开端、顶端。

[15] 出自《隐公元年：论大一统》，王正月”三字是西周春秋时期常用的一种时间表达方式，其中“王”字一般指当政的周王。根据传统，传解读经。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字较少，为了解读《春秋》，出现解释《春秋》的作品，最权威的经典著作有三部，即《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相传为战国时子夏学生齐人公羊高所著。公羊学最初只有口头流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玄孙寿与学生齐人胡毋子都著录成书，专为解释《春秋》而写，主要通过诠释《春秋》的字义、名物、礼仪、制度来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

《公羊传》认为“王”指周文王，“王正月”表达了“大一统”之义，这就是阐发公羊学家自己的政治主张。

[16]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

[17] 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

[18] 出自《论语·子罕第九》，孔子说：“凤鸟不来了，黄河中也不出现八卦图了。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

[19] 谊主，知礼的君。

[20] 太学：中国古代最高学府，相传先秦地方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国家的大学称为学，即太学。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建议兴学养士，被汉武帝采纳。

[21]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继，承继。

[22] 恶：厌恶。

[23] 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颛[zhuān]，同“专”。

[24] 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25] 出自《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

[26]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谊：通“义”。知：通“智”。五常：五种永恒不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

## 赏析

秦朝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西汉王朝承担起完善封建制度，促进国家统一、安定、繁荣的使命和责任。

西汉初期延续了秦朝的制度，在思想方面崇尚黄老思想，通过修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面对新的形势，以往的统治策略、方针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刚刚掌握实权、年轻的汉武帝，迫切想对以往的统治政策进行调整。发布了诏书，向天下贤良之士征求治国安邦的策略。

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通过《天人三策》，汉朝及其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最终建立了起来。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武帝问：“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何分善恶；当务之急，“何修何饬”？董仲舒答：“国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就是说，国家政治有失，天就现灾害来谴责它；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学说。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董仲舒说，灾异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就是说，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尧舜行德政北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百姓的善恶关键在“上”的引导和表率作用。

当务之急是什么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四策。“法天”就是效法天道，天道是什么呢？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就是说，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人以德政为生。“正始”就是正本、正元，即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正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在君主，天下正与不正，关键在君心。“教化”主要是指教化民众。董仲舒认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他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更化”是讲革除积弊。秦始皇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所以秦朝 14 年就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百姓好勇斗狠，欺上悯下，各级官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

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汉武帝“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于是第二次书面询问。

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问题。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文王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答:那是由于“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而时下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可是周代却注重文饰;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这不是矛盾吗?董仲舒答:制度文章,是用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则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俭朴是美德,可俭朴过分也不是恰当的。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一般的玉不雕琢,就不美观了。

三是任德与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答复说: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不用刑罚的局面,这是长期教化的作用。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不行文德教化,百姓以贪狠好战为俗,加之任用酷吏,残害民众,所以“刑虽重而奸不息”

四是关于现实政治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可谓夙兴夜寐,绞尽脑汁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其原因何在?董仲舒答:其因有三,一是“王心未加”,二是“士索不励”,三是“长吏不明”。“王心”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虽然圣上兢兢业业,但却未从仁义出发,所以百姓就没有感受到圣上的恩泽。“士索不励”讲的是教育和选举问题。董仲舒说,圣上登基以来一一心求贤,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儿去求贤呢?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长令不明”讲的是吏治问题。董仲舒说,郡守和县令应该是民众的师长表率,但现在有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化作用,甚至不奉行圣上法令,暴虐百姓,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

官制: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任子和“货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恩荫子弟为官;货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选官形式都没有考虑到官员的两大前提条件:才能和品行。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浆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

第三策是武帝对董仲舒的第二策不甚满意,认为“文彩未极”、“条贯未尽”,欲言又止,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甚至责问他难道对“王听”有所疑虑吗?要求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治乱之端”,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于是,董仲舒才把自己数十年来形成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向汉武帝和盘托出。关于“天人之应”,董仲舒进一步申明了“天人感应”学说,并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天不变,道亦不变”。值得注意的是,看似董仲舒是在讲“不变”,实则是在强调“变”、强调“更化”。这里关键在如何理解“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董仲舒的道也有常与非常之别,有天道”有“人道”之别。天道是有常的,不变的;人道是非常的,可变的。“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就是非常道,讲究适时之变关于“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董仲舒说:“道者万世无,弊者道之失也。”道是不会有过失的,“失道”(不按道办事儿)社会才会丧乱;社会的一切罪恶根源是贫富不均,他警告说:“民不乐生,则不避死,安能避罪!“天亦有所分予,予其爪牙者不予其角抵之利,予其羽翼者唯予其只足”,官吏食朝廷之禄,还要“与民争利”,就是贪得无厌,就是不合天道!

对策最后,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大一统”之说,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但是现在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而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终于把汉武帝关心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或者说思想道路问题讲了出来。汉武帝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

《天人三策》的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扭转了汉初以来“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掀起崇尚儒学礼乐文章的风气,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二是为选贤任能和完善考核制度提供了重要方案,成为后世重要的参考,也为大批中下层人才拓宽了进步的渠道。三是确立了儒家独霸的地位,儒家思想

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 译文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裏，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夭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裏，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裏，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臣仔细考察《春秋》裏“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只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裏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只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

古人证过：“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

《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参考文献：

[1] 梁国楹等. 德州历史名人[M]. 北京:线装书局, 2010:35-40.

[2] 魏文华. 董仲舒珍闻[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39, 110-112.

[3] 海城前湖董氏守增公宗亲会. 《汉书·董仲舒传》原文及翻译. <https://mp.weixin.qq.com/s/6e5cLGeVLZKeh5uNGJVqFA>.

[4] 三年不窥

园. <https://baike.sogou.com/v57357886.htm?fromTitle=%E4%B8%89%E5%B9%B4%E4%B8%8D%E7%AA%A5%E5%9B%AD>.

# 东方朔

## 一、生平简介

东方朔（约前 161 年—前 93 年？），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汉武帝时期历任郎、常侍郎中、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善于辞赋，博学机敏，屡屡向汉武帝讽谏国政，曾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虽不得重用，但对汉武帝产生一定影响。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辞赋家。

对于东方朔的籍里，曾有过争议，但以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多方证据证明，东方朔系今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晋·夏侯湛在《汉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中这样写道：“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当时夏侯湛父亲为乐陵郡太守，夏侯湛到乐陵省亲，顺便由乐陵到厌次瞻仰东方朔祠庙，他说“我来自东，言适兹邑”，可见厌次的位置在乐陵西面，即今天陵城区神头镇的位置。唐颜真卿在《碑阴记》中写道：“故厌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县东北二十二里。”安德县即今陵城区，陵城东北二十二里，就是陵城区神头镇的位置。除以上文献记载还有考古资料证据，神头镇北东西 5 华里、南北 2 华里的地面上有七十多个古墓（现存 38 座），经专业人士鉴定，该墓群为汉墓群，富平侯家族墓群，《后汉书》记载“厌次本富平”，此地西汉时称富平侯国，东汉时称厌次县。颜真卿所作《东方先生画赞碑》现存于陵城区文博苑中。2001 年 3 月，在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东街北邻，出土唐代咸亨三年（672）古墓一座，墓中出土墓志一方，有墓志铭：“公讳合，德州安德人也，汉大夫倩之二十八代孙。滑稽穷于炙輠，博辩轶于疏属，故得匡衡圣主、佐辅明时，垂裕后昆，流芳来世。”志文言墓主始祖为“汉大夫倩”，符合东方朔人物特点。

汉代的选官办法有两种：一是征辟，二是察举。征辟制度中“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察举制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确立，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的一种制度。汉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察举”方式，那就是自荐。

东方朔就是靠自荐，远离故土西往长安的，他年幼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成

人，家境虽然贫寒，但自小聪慧灵敏、刻苦好学，爱好儒家经术，广泛阅览诸子百家之书。汉武帝即位初年（建元元年，前 140 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更是写了三千片竹简的内容上书，这些竹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而武帝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东汉班固所著《汉书》中，有东方朔自荐书记载，上书曰：“我总共背诵了四十四万字。还经常熟习子路的言论。我今年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眼睛像挂着的珍珠那样明亮，牙齿如同编成串的贝壳整齐洁白，勇猛像孟贲，敏捷如庆忌，廉洁似鲍叔，守信同尾生。像这样的人，可以做天子的大臣了，臣东方朔冒死再拜向皇上禀奏。”为了引起汉武帝的注意，东方朔极尽夸耀之能事，他用常人所没有的自信和勇气，描述自己饱读诗书、智勇双全，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这种待遇俸禄微薄，没有被提拔。

由于不被重用，后来，东方朔通过恐吓侏儒，获得了在金马门待诏的机会，这样他离汉武帝就更近一些了。《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故意吓唬给汉武帝养马的几个侏儒，说皇帝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听后大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知道原委后，召来东方朔责问，东方朔回答说：“我活也要说，死也要说。侏儒身长只有三尺多，俸禄是一袋粟，钱是二百四十。我身高九尺多，却也只拿到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侏儒饱得要死，我饿得要死。我的话如果可以被采用，希望您改变对待我的礼节；如果我的话不能采用，请让我回家，不要让我只是白吃长安米。”于是汉武帝令他在金马门待诏。

武帝曾经让一些擅长占卜的术士射覆，射覆是中国民间近于占卜术的猜物游戏。在瓿、盂等器具下覆盖某一物件，让人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东方朔每次都能猜中，皇宫里有个受宠幸的伶人郭舍人不服气，他说：“东方朔太狂了，不过是侥幸猜中罢了，并没有实在的术数。我希望让东方朔再猜，他猜中了，就打我一百鞭；猜不中，就赐给我帛。”郭舍人的谜语，东方朔每每能应声就答，即使变化奇巧，机锋迭出，也没有谜语能难住他，人们都非常惊奇。皇上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于是得到武帝的喜爱宠幸。

汉武帝喜好出游狩猎，一次出游需要好几天时间，路途休息不便，又会影响到沿途百姓的生产生活，建元三年（前 138 年），萌生了修建上林苑的想法。东方

朔向皇帝陈述了不能修建上林苑的三条理由，又列举了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大兴土木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最后献上《泰阶六符》希望汉武帝能够观察天象的变异而自省自己所做的事情。汉武帝因此拜东方朔为一千石太中大夫之官职，加给事中之衔，并赏赐黄金百斤。太中大夫是一种不定员的谏官，约略相当于后来的监察御史。“给事中”属于加官，给事殿中供皇上临时差遣的意思。

东方朔有一次喝醉了酒，进入殿中后在殿上小便，而此举被其他官员弹劾。因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将东方朔贬为庶人，让东方朔在宦者署待诏。后来，汉武帝的姐姐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因杀人被捕入狱，汉武帝又不想违逆法律的准则，让查处此案的法官依法判决，内心异常难过。东方朔这时却举杯向武帝祝寿，东方朔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讲述悲伤的情绪对身体寿命的影响，说酒是最好的消愁之物，故以酒祝寿显明陛下的刚正不阿，又可以为陛下解哀愁。于是汉武帝又任命东方朔为中郎之职，并赏赐布帛百匹。

后来，东方朔又举荐他的儿子做郎官，其子后升为谒者，经常奉汉武帝之命持节出使。东方朔临终前规劝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汉武帝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

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里的东方朔，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博学多才，下笔千言，出口成章，机智敏捷，滑稽诙谐，不拘小节。善于观颜察色逗人开心，但不卑不亢，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不阴谋害人。常在武帝面前直言纠正皇帝一些过失，并以辞赋谏武帝戒奢侈。

忧国忧民是东方朔做事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那样一个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幽默滑稽也许是他本身的性格，也许是他与皇帝相处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特殊方式。东方朔举重若轻的处事哲学是人生大智慧，非凡夫俗子所能驾驭。后人由于敬佩东方朔的人格，崇拜他渊博的学识，把他誉为“智圣”，捧为岁星、桃仙子、滑稽大师、知识之星，推崇他为笑话、相声、谜语、占卜、俗文学的祖师爷。

## 二、主要成就

### （一）政治贡献

东方朔从上书自荐，皇帝令他公车署中等待召见。到吓唬给汉武帝养马的几个侏儒，皇帝令他待诏金马门。再到被任命为常侍郎，终于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再到东方朔谏修上林苑，拜太中大夫。以致后来免职又复用中郎。东方朔最高职务为一千石的太中大夫，终其一生，东方朔未能立下青史书名的政治功绩，然其以近侍的身份与汉武帝君臣相伴多年，从报国起，到报国终，东方朔利用其接近汉武帝的机会，察言观色，一有机会便直言切谏，亦对汉武帝的行为举措做出了一定的影响。

### **1. 谏武帝戒奢恤民**

在汉武帝的允许下，寿王打算在阿城以南，盐厘以东，宜春宫以西地区置建上林苑，让它和终南山相连。武帝又诏令中尉、左右内史标划出属县的荒地，想以此抵偿给郭、杜二县的农民。东方朔认为修建上林苑不妥，他陈述了不能修建的三个理由：第一，现在将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断绝了池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财政费用的来源，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第二，破坏百姓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第三，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因此，他说务求苑囿广大，不恤农时，不是强国富民的办法。虽然汉武帝仍然按照寿王所奏报兴建了上林苑。但从汉武帝给东方朔加封汉中大夫一职，并赏黄金百斤来看，他对东方朔的谏言是十分认可的。

### **2. 谏武帝公正执法**

汉武帝的姐妹隆虑公主有个儿子叫昭平君，他娶了汉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这样一来，昭平君既是汉武帝的外甥，也是女婿，亲上加亲。昭平君是个惹是生非的主儿，母亲非常担心儿子将来会因为犯法而被判死刑。隆虑公主病危时，向朝廷进献了巨额钱财，请求预先为儿子昭平君赎一次死罪，汉武帝答应了她的请求。隆虑公主去世后，昭平君日益骄纵，竟在喝醉酒之后将公主的保姆杀死，被逮捕入狱。廷尉因昭平君是公主之子而请示武帝，汉武帝执法严厉，毫不容情，即便是外甥加女婿再加姐姐的感情也没有因私废公，于是批准了廷尉的请求，将昭平君处死。东方朔却上前给武帝祝寿说：“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执政，赏赐不避仇人，诛罚不选择是不是亲骨肉。《尚书》上说：‘不要袒护不要偏私，王道坦荡无碍无阻’，这两者为五帝所推崇，连三王也难以做到。陛下这样做了，因此四

海之内广大人民各得其所，天下大幸！臣东方朔举杯敬酒，冒死再拜，祝皇上万岁。”

### 3. 谏武帝教化人民

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逐渐增强，当时天下崇尚奢侈靡丽，争相从事工商业，农民纷纷离开农田。汉武帝问有什么办法来教化民众，东方朔说：“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他身着黑色粗布衣服，脚穿生皮制成的鞋，用没有饰物的牛皮带挂着剑，铺着莞蒲编的草席，兵器像木制的没有利刃，冬衣没有文采，裹面装的是乱絮。收集装奏章的青布袋缝成宫殿帷幕。文帝以道德崇高为美，以仁义为准绳。于是天下入都仰望他的风范，形成淳厚的时俗，显明昭著地教化了民众。而陛下嫌长安城内地方小，在城外筑起建章宫，左有凤阙观，右有神明台，号称千门万户；宫内土木铺裹着锦绣丝绸，狗马披着五彩毛毯；宫人头簪玳瑁，身佩珠玑；设置玩耍车，倡导驰逐游猎之乐，追求装饰的文采绚丽，聚积奇珍异物；撞响万石重的巨钟，敲击声如雷霆的大鼓，倡优作耍，郑女起舞。皇上像这样淫侈无度，却想让老百姓不奢侈，不弃农经商，这是难以做到的事。陛下果真能采纳臣东方朔的建议，除下众多华丽的帷帐，在四通八连的大街上焚毁，退弃那些善于奔驰的良马表示再不骑用，那么，就只有尧舜盛世可以和陛下的治绩相媲美了。”

### 4. 谏武帝矫枉风化

汉武帝的姑姑窦太主，在景帝时期和武帝初期权势熏天。她的丈夫去世后，太主寡居，五十多岁了，亲近、宠幸一个年轻人董偃。董偃十三岁，随母亲出入窦太主家，他俊美机灵，窦太主要求其母亲将他留在自己府中教养，令他读书识字，学习才艺，充当自己的贴身随从。董偃到十八岁时行了冠礼，窦太主出门他驾车，太主回府他在身边侍奉。董偃为讨好皇帝，说服窦太主把她的长门园献给皇帝，汉武帝非常高兴，到姑姑家喝酒时高呼董偃为“主人翁”。东方朔向皇帝谏言，说董偃有三条罪状，第一，董偃以臣子的身份侍奉公主。第二，败坏男女风化，扰乱婚姻礼度，损害圣王制度。第三，陛下年轻，正在努力学习《六经》等儒学典籍，董偃不遵循经书教诲劝勉学习，反而崇尚豪华追求奢侈，尽情地享受斗狗赛马的欢乐，极力满足感官欲望，他是国家的大贼，君主的大害。

## （二）文学成就

东方朔滑稽多智、言词敏捷，他一生著述甚丰，擅长辞赋，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璧》、《试子诗》、《屏风》、《皇太子生谋》、《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从公孙弘借车》等，后人汇为《东方大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汉书》“艺文志”说他有文二十篇，但多已失传。亦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文，如《东方朔占》、《东方朔岁占》、《海内十洲记》、《皇帝朔书》、《东方朔书》、《感应经》、《射覆经》等。

东方朔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观点，“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因性格滑稽，常在武帝面前谈笑，始终不得重用。于是东方朔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抒发不满。这两篇文章是东方朔的代表作，其赋体散文代表作《答客难》开创了赋体文学的新文体，其形式是一问一答，被称为“难体”。杨雄的《解嘲》和班固的《答客戏》，都是由《答客难》的形式发展来的。东方朔作品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他确实曾是当时多产而且知名的作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辨骚》、《诠赋》、《祝盟》、《杂文》、《论说》、《诏策》、《书记》等篇中，论及东方朔的作品近十种，对其部分作品作了较高的评价，并指出了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东方朔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汉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三、“德能”思想

#### （一）忠君爱国思想

东方朔兼融儒、道、法等家思想的特点，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文化。他在给汉武帝上书的自荐书中写道：“臣东方朔从小失去父母，由哥哥嫂子养大。十三岁开始读书，三年学会了文书和记事。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习《经》、《尚书》，背诵了二十二万字。”自荐书虽然只是列举了《诗》《书》，应该还包括《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汉武帝时代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方朔乃齐人，齐鲁乃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儒家文化造诣最高的代名词。东方朔始终位卑未敢忘国忧，自从在皇帝身边，就以“诙谐取容”的方式，以达到“正谏明节”的目的，经常就国事激浊扬清、匡正时弊。

在《谏起上林苑疏》中，东方朔指出不能修建上林苑的理由之一，那就是修建上林苑减少了国家财政费用的来源，虽未被采纳，上林苑如期修建，但汉武帝对东方朔表现出的胆识和忠诚十分欣赏，给予加官赏金。

在谏武帝公正执法事件中，汉武帝公正执法，下令杀了自己的外甥，同时他也是自己的女婿，在汉武帝无比悲伤痛苦之际，东方朔敢此时此刻给皇帝敬酒并祝贺，不是心中忧国忧民，是没有冒然上谏此言之勇气的。

谏武帝矫枉风化事件中，皇姑馆陶公主有一次热情接待汉武帝，亲自下厨，并设法引见了董偃。这一来，董偃的影响越来越大，有时还可以陪同皇帝在北宫游戏，或到外面骑马、观看斗鸡等，竭尽阿谀之能事，为了答谢皇姑的盛意，汉武帝还在宣室设宴款待馆陶公主。宣室是未央宫的正室，是大臣们朝见皇上的地方，汉武帝还派人想把董偃也召来。东方朔历数董偃之罪状，严肃地指出董偃以一介平民私侍公主，搞乱了婚姻关系，败坏了伦理道德，谏武帝止董偃入宣室。

东方朔还谏武帝教化人民，陈“农战强国”之计，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帮助汉武帝清除了乱政的后宫势力，打击了分裂的诸侯，决定了交好西域的方针，改变了和亲的政策，以至做出抵御匈奴的重大决定。东方朔多次直谏汉武帝，直到临死一息，仍上谏言。武帝感慨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 （二）爱民恤民思想

从汉初开始，亡秦一直是汉代人的一面镜子，总结亡秦经验一直没有停止过。西汉贾山的《至言》，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刘向的《谏营昌陵书》等，都深刻认识到了无止境的追求享受带来的严重后果。两汉思想界倡俭之风极盛，节俭之君备受赞扬。东方朔出身于平民家庭，更加了解下层百姓的疾苦，更具有节俭爱民思想。

在《谏起上林苑疏》中，东方朔陈述的三条不能修建上林苑的理由中，有两个是从危害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其一，占用土地则危害农业。其二，从百姓的风俗思想上出发，占用土地不能让百姓在精神层面安居乐业。东方朔谏武帝教化人民，举文帝道德崇高为美，以仁义为准绳。以德化统治国家、崇尚节俭、反对骄奢淫逸。可以看出，在东方朔看来，要想使国强民富就必须以“民利”为核心，不要逞一己之私欲，疲天下之民力，骄奢淫逸，奢靡无度。东方朔一心出仕，为的是“民”之利益。他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君主的行为必须符合民心，这种儒家的仁义观中已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

东方朔这个历史人物，其独到之处在于他的“高风亮节，忧国忧民”。一方面，他的知识渊博；另一方面，滑稽幽默是他才华的一种表现手段，是手段不是

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忧国忧民，为皇帝献计劝谏。东方朔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言极谏以阻止歪风的人物。

### （三）辞赋大家的写作才能

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是一个多产的文学家，他的辞赋艺术特色鲜明，文体具有多样性，文章句式、内容及文风方面有继承和创新，文中经常运用历史典故、正反对比、虚拟及譬喻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幽默诙谐，东方朔及其辞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方朔是中国俗文化的鼻祖。文学评论界的开山鼻祖刘勰，对东方朔的文章评价说：“不仅有志气磐桓，各含珠采可与司马迁的名著《报任少卿书》相媲美的高雅文章，他还著有大量的通俗易懂的文章。汉辞赋由韵变散是东方朔首开的先河！他的文章通俗易懂、诙谐有趣、雅俗共赏。”《汉书·东方朔传》中载道：“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

东方朔除了高超的辞赋写作才能，还具有高超的应用文写作技能。汉武帝征召天下贤士，东方朔不畏自己一介平民，出身卑微，怀着极大的自信心，上书自荐，他的自荐书，简短明了，字字珠玑，思路清晰，目的明确，也不乏文采。在自荐书中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年龄，身高，容貌，讲述了自己的学识、才能和竞选的职位。上书求官是历来文人仕途发达的一条重要途径。言辞甚是讲究，过谦则无以明志，过骄则盛气凌人。分寸火候的把握足见一个人的练达和成熟。他用平静沉稳、豪迈旷达、理直气壮、不亢不卑的口吻叙述自己，自荐书潜台词丰富，这样一个饱读诗书，智勇双全的人，是不是人才非他莫属呢，读后有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之势，东方朔就是凭着这样一份自荐信，成功胜出。他的毛遂自荐的自信精神，非常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学习。

### （四）滑稽幽默的雄辩才能

武帝诏令赏肉给侍从官员。大官丞到天晚还不来分肉，东方朔独自拔剑割肉，随即把肉包好怀揣着离去。大官丞将此事上奏皇帝。东方朔入宫，皇上说：“先生站起来自己责备自己吧。”东方朔说：“东方朔呀！东方朔呀！接受赏赐不等韶令下达，多么无礼呀！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呀！割肉不多，又是多么廉洁呀！回家送肉给妻子吃，又是多么仁爱呀！”皇上笑着说：“让先生自责，竟反过来

称赞自己！”又赐给他一石酒、一百斤肉，让他回家送给妻子。本来应该谢罪的一件事情，东方朔却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给自己脸上贴金，反倒得到皇帝的赏赐。

汉武帝因为东方朔说话谐谑言辞敏捷，喜欢故意提些问题问东方朔。武帝曾经问东方朔说：“先生看朕是什么样的君主呢？”东方朔回答说：“从唐、虞盛世，到周成王、周康王时代，足以比喻当世。臣看陛下功德，可以排在五帝三王之上。”武帝听罢大笑起来，汉武帝自知功德不能和五帝三王相媲美，更何谈之上，东方朔把汉武帝抬举得越高，更能引起皇帝的自我反省，这是一种反话正说的语言才能。皇上又问东方朔对朝廷上大量的能人怎么看，比如今公孙弘丞相、倪宽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类，东方朔以嬉笑的方式进言回答：“臣东方朔虽然不怎么样，但还是兼有这些人的长处。”他身上具有当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少有的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他的思想与品质与当时社会封建主流意识相抵触，从而使人们觉得他的行为怪异，被视为异物，尤其是他的故事在民间流转，民众盲目而接受并大肆窜改渲染，以至把人格有血有肉的人说成虚无缥缈、长生不老的仙人。东方朔同时因其滑稽多智被尊为相声业的祖师爷。现代相声大师马三立在表演节目时，背后的大扇面上就写着：“汉宫东方朔，是中国笑话、相声的祖师爷。”

### （五）智慧的处世才能

东方朔的一生，出则直谏，入则朝隐。

批评他人是件困难的事，古人以批评君父为“谏”。批评金口玉言的皇帝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事。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但谏诤批评是抨击邪恶，匡正君父，匡正社会风气的重要武器，自古仁人志士无不针对君上的错误进谏。东方朔对直言切谏重要性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他在其《非有先生论》中说：“从前关龙逢的谏言切中夏王桀的要害，王叔比干对殷王纣直言不讳。这两个人，想的完全是如何尽忠，忧虑着君王的德泽不流布下方，而造成百姓骚动，所以直截了当地谈君王的过失，恳切的指出君王的错误，拿这一点想增添君王的荣誉，除去君王身边的祸害。”“凡有志之士，有仁义之心的人，很郑重地表现出一种端庄严肃的形象，坦率地进谏一些重大的本质问题，对皇上来说纠正君王的过错，对

下而言要除去有害于百姓的东西。”东方朔深感直言切谏之难，在这篇文章中，先后多次用“谈何容易”来表述直言切谏之难。

当东方朔一生的奋斗目标不能实现时，他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开始倾向于道家，东方朔所选择的隐的方式不是完全照搬古人的隐居于山林、田园之间，而寻找一种适应时代主流特有的方式“朝隐”，即他所谓的“避世金马门”。在史记中东方朔被列入滑稽列传，皇上身边的侍臣有半数称他为“疯子”。武帝听到了说：“假如东方朔当官行事没有这些荒唐行为，你们哪能比得上他呢？”东方朔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在朝廷里隐居的人。古时候的人，都是隐居在深山里。”朝隐是文人墨客选择自保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趋避朝廷政治上的迫害。东方朔时常坐在酒席中，酒喝得畅快时，就趴在地上唱道：“隐居在世俗中，避世在金马门。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茅舍里面。”金马门，就是宦者衙署的门，大门旁边有铜马，所以叫做“金马门”。李白也有诗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晋代夏侯湛在《东方朔画赞》中称朔：“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是隐于朝廷之上。《诫子诗》中写道：“看来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清高，却显得固执，拙于处世；而柳下惠正直敬事，（不论治世乱世都不改常态，）是最高明巧妙的人。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事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悠然的生活，虽不迎合时势，却也不会遭到祸害。”在朝廷这个“伴君如伴虎”的地方，勾心斗角无处不在，如果能在朝野中不随波逐流，就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人对东方朔的评价就是“人皆以先生为狂”。表面看上去，东方朔的这个做法诙谐搞笑，但是这么做背后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东方朔能于皇帝和众臣间相处的游刃有余，足可见他的智慧超乎寻常。

#### （六）对未解科学的认知才能

西汉时期，科学尚不发达，神秘文化就有立足之地，东方朔擅占卜，占卜（卜筮活动）不仅出现于军事上，在生活琐事上也时常用到，是对未来吉凶的一种预测手段。

射覆是近于占卜术的一种猜物游戏。武帝曾经让一些擅长占卜的术士射覆，把壁虎盖在盆子下面，让他们猜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猜中。东方朔自我介绍说：“臣曾学《易》，请允许我猜猜是什么。”于是他将蓍草排成各种卦象，回答说：

“我认为是龙又没有角，说它是蛇又有足，肢肢而行脉脉而视，善于爬墙，这东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皇上说：“猜得对。”赐给他十匹帛。又让他猜别的东西，连着都猜对了，每次都赐给他帛。皇宫里有个受宠幸的伶人郭舍人，认为东方朔猜中是侥幸，又让他再猜，郭舍人问的谜语，东方朔应声就答，变化奇巧机锋迭出，没有谜语能难住他，在场的人都非常惊奇。皇上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于是得到武帝的喜爱宠幸。射覆是古代研“易”高手常做的一种研“易”应用实践活动。一种难度极高的实践性活动。可见东方朔是一个真正的“易”学高手。

历史上相传张良凭“十二灵棋”占卜术，帮助刘邦行军打仗，对于吉凶如何等可谓预测神准，从没有失手过。此占卜术先用于兵事上，后来渐渐流行于民间，等传至东方朔之时，该法已经相当出名，此时东方朔也将此法用于占卜老百姓的生活琐事，灵验的很，如此也让东方朔在民间的神秘感更加的强盛，使百姓对其推崇更加的神话，最终东方朔也成了那个能偷王母蟠桃的神仙。后来人们推崇东方朔为盲人算命祖师爷。

神秘文化反映出古代科学不发达，百姓迷茫、无奈，透露出人们在与大自然相处中艰难摸索前进的信息。寄寓着人们趋避吉凶，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占卜预测只是人生中的调味品。今天我们要以一种正确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面对这些。我们要积极探索科学，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 四、作品赏析

### 作品一原文

#### 答客难<sup>[1]</sup>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sup>[2]</sup>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sup>[3]</sup>。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

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廩，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sup>[4]</sup>，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鹳鸣，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sup>[5]</sup>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sup>[6]</sup>，下察接舆<sup>[7]</sup>；计同范蠡<sup>[8]</sup>，忠合子胥<sup>[9]</sup>；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大燕之用乐毅<sup>[10]</sup>，秦之任李斯<sup>[11]</sup>，酈食其<sup>[12]</sup>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鬻鬻<sup>[13]</sup>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 注释

[1]本文出自《汉书·艺文志》。

[2]苏秦、张仪：战国纵横家。苏秦主合纵，张仪主连横。

- [3]执戟：指执戟侍从的官。
- [4]圣人：指孔子。前所引诸语皆孔子所云。见《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
- [5]黼纁 tǒu kuàng：黄色丝绵，悬于冕之两边。
- [6]许由：尧时隐士。尧让天下，不受，隐于颍水之滨。
- [7]接舆：孔子时隐士。曾狂歌讥孔子，称楚狂。
- [8]范蠡：越王谋臣，助勾践灭吴后，退隐五湖。
- [9]子胥：伍子胥，吴王夫差忠臣，被杀。
- [10]乐毅：燕昭王战将，曾破齐，称雄一时。
- [11]李斯：秦始皇时为丞相。
- [12]酈食其：汉高祖刘邦谋臣。曾劝说齐王田广以七十余城归顺。
- [13]鼯鼠 jīng qú：地老鼠。

## 赏析

汉初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抒情散文，以书信的形式最多，也包括一些自我辩解、自我嘲弄的文章。这些作品常常触及个人与环境及社会统治力量的冲突，作品往往具有感人的力量。《答客难》是西汉最早的抒情散文，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难是东方朔首创的一种古文体，他从二十岁负才自荐，于皇帝左右近四十年间，东方朔忧国忧民，常向皇帝言政治得失，也曾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得重用，因此内心幽愤难以平衡，遂作此篇，发泄牢骚，自慰表志。本篇以辞赋惯用的问答形式展开，是主客问答的形式，文中假设有客难东方朔，讥讽他官微位卑，而务修圣人之道不止，他进行答辩。

《答客难》的主要内容为自己鸣不平，文章开篇即虚构出一位“客”以不解之辞问难东方朔：“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继而反话正说，极辛辣地讽刺汉武帝刚愎昏暗、贤愚不分，甚至还不如战国诸侯明白“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用人之道。尤其是当他嘲弄了“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的所谓盛世之后，顺势揭露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凭个人好恶，对人才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现状。最后对自己的困境，表示要以务修身，完善道德来求得解脱，自慰之中，又流溢出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内心

的无奈与悲哀。

《答客难》的艺术特色鲜明，它不像司马相如的散体赋《子虚赋》那样对统治者表示规谏。也不像贾谊的骚体赋《吊屈原赋》那样抒发遭世不遇。《答客难》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客难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难皇帝。《答客难》没有了骚体赋的辛辣尖刻，更多呈现出沉郁悲慨的特点。此文既保持主客答难的赋的结构，又用比较整饰而不拘对偶的古文语言，语言疏朗，议论酣畅，这种文体实质便是文赋。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里说“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都是模仿东方朔的作品。

## 作品二原文

### 七谏·谬谏<sup>[1]</sup>

怨灵修之浩荡兮，夫何执操之不固<sup>[2]</sup>？

悲太山之为隍兮<sup>[3]</sup>，孰江河之可涸？

愿承闲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讳<sup>[4]</sup>。

卒抚情以寂寞兮，然怊怅而自悲<sup>[5]</sup>。

玉与石其同匮兮，贯鱼眼与珠玑<sup>[6]</sup>。

骛骏杂而不分兮，服罢牛而骖骥<sup>[7]</sup>。

年滔滔而自远兮，寿冉冉而愈衰。

心怵憚而烦冤兮，蹇超摇而无冀<sup>[8]</sup>。

固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错<sup>[9]</sup>。

郤骐驎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sup>[10]</sup>。

当世岂无骐驎兮，诚无王良之善驭<sup>[11]</sup>。

见执轡者非其人兮，故驹跳而远去。

不量凿而正枘兮，恐矩矱之不同<sup>[12]</sup>。

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sup>[13]</sup>。

弧弓弛而不张兮，孰云知其所至<sup>[14]</sup>？

无倾危之患难兮，焉知贤士之所死<sup>[15]</sup>？

俗推佞而进富兮，节行张而不著<sup>[16]</sup>。

贤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党誉<sup>[17]</sup>。  
邪说饰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sup>[18]</sup>。  
直士隐而避匿兮，谗谀登乎明堂<sup>[19]</sup>。  
弃彭咸之娱乐兮，灭巧倖之绳墨<sup>[20]</sup>。  
菑露杂于麤蒸兮，机蓬矢以射革<sup>[21]</sup>。  
驾蹇驴而无策兮，又何路之能极<sup>[22]</sup>？  
以直针而为钓兮，又何鱼之能得？  
伯牙之绝弦兮，无钟子期而听之<sup>[23]</sup>。  
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sup>[24]</sup>？

同音者相和兮<sup>[25]</sup>，同类者相似。

飞鸟号其群兮，鹿鸣求其友。

故叩宫而宫应兮，弹角而角动<sup>[26]</sup>。

虎啸而谷风至兮，龙举而景云往<sup>[27]</sup>。

音声之相和兮，言物类之相感也<sup>[28]</sup>。

夫方圜之异形兮，势不可以相错<sup>[29]</sup>。

列子隐身而穷处兮，世莫可以寄托<sup>[30]</sup>。

众鸟皆有行列兮，凤独翔翔而无所薄<sup>[31]</sup>。

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自讬。

欲阖口而无言兮，尝被君之厚德。

独便愒而怀毒兮，愁郁郁之焉极<sup>[32]</sup>？

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

不及君而骋说兮，世孰可为明之？

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沉抑而不扬<sup>[33]</sup>。

众人莫可与论道兮，悲精神之不通。

乱曰<sup>[34]</sup>：

鸾皇孔凤日以远兮，畜鳧驾鹅<sup>[35]</sup>。

鸡鹜满堂坛兮，鼃龟游乎华池<sup>[36]</sup>。

要褻奔亡兮，腾驾橐驼<sup>[37]</sup>。

铅刀进御兮，遥弃太阿<sup>[38]</sup>。

拔搴玄芝兮，列树芋荷<sup>[39]</sup>。

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

甗瓿登于明堂兮，周鼎潜潜乎深渊。

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 注释

[1]本诗出处《楚辞》，骚体诗。谬谏：狂者之妄言叫谬。谬谏是对作者自己向君王上谏言的谦虚说法。

[2]灵修，楚方言，神灵。这里借用屈原的用法，指楚王。浩荡，水壮阔貌。引申无常不定。犹荒唐。操：节操。

[3]太：同“大”。隍：没有水的护城壕。这里泛指池塘，孰：犹何。

[4]承闲：秉承伦理道德的规范。犯忌：触犯上忌。干讳：违背众讳。

[5]卒：终。抚情：按抚情绪。怊 chāo 怅：悲伤不如意的样子。

[6]匱：古同“柜”。鱼眼：质地次的珠子。玃：不圆的珠子。

[7]駑：劣马。服，驾辕。骖：边马。骥：千里马，良驹。

[8]怵憚 tú tán:忧苦悲伤。蹇：楚方言，文言助词，其。超摇：心神不宁貌。

[9]工巧：偷工取巧。改错：更改错位。

[10]骐骥：良马，千里马。駑：走不快的马。骀：疲顿之马。

[11]诚：诚然，真正。王良：人名，春秋时之善御者。

[12]凿：凿孔。正：纠正。杙 ruì:樨头，即插入凿孔的木栓。矩矱 jǔ huò:木工的规矩与尺度。引申为法度。

[13]论世：研究时世，认识观察世道。高举：高其行，行为超出凡俗。操行，操守与行动。调：调和。谐调。

[14]弧弓：泛指强弓。所至：其力所至。

[15]倾危：倾覆；倾侧危险。患难：忧患灾难。所死：所死为何。

[16]推佞：推崇奸佞。进富：进荐富者。节行：节操与行为。张：扩张，推广。著：显著。张而不著，意为彰而不显。

[17]不群：不愿为伍也。朋曹：朋党同类。党誉：朋党间互相袒护称赞。

[18]饰：矫饰。多曲：多曲解。弧：弧曲。变形也。

[19]避匿：躲避，隐匿，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

[20]彭咸之娱乐：谓以伏节死直为乐。巧倕：传说中的巧匠。

[21]篔簹：竹名。细而长，无节，可为矢。麋 zōu 蒸：麻秸。古时用作燃料或照明。机：用弩机发射。蓬矢：用蓬蒿做的箭。革：没毛兽皮。这里指犀皮做的盾。

[22]蹇驴：跛蹇驾弱的驴子。极：尽头。

[23]伯牙：春秋时精于琴艺的人。钟子期：春秋时楚人。伯牙鼓琴的知音。

[24]和：和氏，卞和。曾献和氏璧给楚王。璞：璞玉。良工：技艺高超的工匠。剖：剖解。

[25]和：应和歌唱。

[26]宫：指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角：五音之一。

[27]景云：端云，祥云。

[28]音声：音乐声音。简单的发音叫做“声，声的组合，成为音乐节奏的，叫做“音”。相感：互相感应。

[29]势：情势。相错：互相错杂失位。

[30]列子：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

[31]薄：迫近。

[32]便愠 yuān：忿恨。忿闷。怀毒：居心恶毒。怀着强烈的怨恨。焉极：怎能有尽头。

[33]寝疾：卧病，沉抑：低沉压抑。不扬：不得扬达。

[34]乱：尾声。

[35]驾鹅：用鹅驾车。《补注》：“郭璞云，驾鹅，野鹅也。”

[36]堂坛：大堂高台。鼃 wā mǐng：青蛙。

[37]要褭：腰褭，古之骏马，腾驾：奔腾驾车，橐 tuó 驼：骆驼。橐，口袋，指驼峰。

[38]进御：为君王所御幸，犹进呈。遥弃：遥远地抛弃。太阿：太阿剑。

[39]拔搴：全部拔除也。玄芝：黑芝，灵芝的一种。芋荷：即芋艿，俗称“芋头”。因叶酷似荷叶，故名芋荷。

## 赏析

《七谏》，出自《楚辞》篇目。由《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首短诗组成。《七谏》表现了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无辜放逐、最终投江的悲剧一生，也表达东方朔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境，反映了封建时代正直之士普遍的遭遇和典型的心态。本诗选自第七首《谬谏》。

《谬谏》通过描写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积极用事的强烈愿望，东方朔以此自喻，表达自己求谏汉武帝的希望，以及抑郁失志的悲凉。本诗首先说明屈原谬谏的原因和进谏的矛盾心情，接着揭露社会黑暗不堪，暗示屈原将义无反顾沉江，指责君王亲小人，远君子，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接着写屈原坚持自己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最后写黑白颠倒自古如此，我又何必怨恨当今世风。

### 参考文献：

[1]季桂起. 德州地域文化概论[M]. 北京：线装书局，2010. 06：100 页，135 页，178 页.

[2]梁国榘. 德州历代名人. [M]. 北京：线装书局，2010. 06:44 页.

[3]刘凤海. 东方朔全传. [M]. 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01.

[4]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窦建德

## 一、生平简介

窦建德（公元 573 年—621 年 8 月 2 日），字建德，贝州漳南（隋开皇十八年改东阳县置漳南县，治河北省故城县东北故城镇，属贝州；唐武德七年徙治山东省武城县东北漳南镇，今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鲁权屯镇漳南镇村）人，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史称夏王。

窦建德出身扶风窦氏，东汉大司空窦融后代，辽东宣王窦拓玄孙。

自言汉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

### 早年经历

窦建德年轻时就“重然许，喜侠节”。

有一次，一位邻居的父亲去世，但是家境贫寒，没有钱安葬。当时窦建德正在田间耕地，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便长叹不已，希望能帮助那个人。他自己身边也没有余财，便卖掉了自家的耕牛，换取钱财，帮助乡亲举行了葬礼。

还有一次，有几个盗贼在晚上去窦建德家抢劫，窦建德站在门边，待盗贼进屋后，先后打死三人，其余的盗贼吓得不敢再进。只好请求将三人的尸首要回，窦建德说：“可投绳系取之”（《新唐书·窦建德列传》）。盗贼于是将绳投进屋里，窦建德将绳系在盗贼尸体上，然后让盗贼曳出，随即跃起持刀，再杀数人。

此后，窦建德当上了里长，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以回家。

窦建德父亲死的时候，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一概不收。

### 举兵反隋

隋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隋帝杨广征兵攻打高丽，窦建德应召入伍，被选为二百人长。

当时，山东发大水，与窦建德同县的孙安祖家被大水淹没，妻儿饿死。县令见孙安祖骁勇过人，也将他选入军中。孙安祖向县令陈述自己家中贫困，不愿入伍。县令大怒，处以鞭刑。孙安祖气极，杀死县令，投奔了窦建德。

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

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县城西南，旧为漳水所汇）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

孙安祖依计而行。

随后，窦建德帮助孙安祖聚集贫困农民和拒绝东征的士兵数百人，占据漳南县东境方圆数百里的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举兵抗隋，孙安祖自称将军，号“摸羊公”。

当时，清河郟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纠集百余人，渤海蓓县(今北景县)人高士达率千余人在清河一带起义，往来漳南一带，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唯独不去骚扰窦建德所在的村落。郡县怀疑窦建德与他们私通，逮捕并杀害了他全家。

窦建德率麾下二百人投奔高士达义军，正式起义。

### 众望所归

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后孙安祖被张金称杀害，其部数千人尽归窦建德。从此，势力渐盛，壮大到近万人，仍然往来于高鸡泊中。

窦建德倾身接物、与兵士同甘共苦，所以士兵甘愿为其效死力。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二月，隋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高士达认为自己智略不及窦建德，便以窦建德为军司马，让其指挥作战。

窦建德掌管兵权后，便提议由高士达留下看守辎重，自率精兵七千人前去抵抗郭绚。

窦建德设计，大破郭绚军，杀死俘获数千人，得到战马一千多匹，并将逃跑的郭绚斩首。

自此，窦建德所率义军兵威大振。

郭绚兵败后，隋炀帝又派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余前来围剿起义军。

杨义臣于清河先歼灭了张金称的部队，由于杨义臣将所俘义军全部杀死，以至无人愿降，一些溃散在草泽中的残部相继投奔窦建德。

杨义臣又乘胜至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准备进入高鸡泊讨伐高士达

部。

高士达不听窦建德之言，招致兵败身亡。

窦建德率百余人突围而去，到了饶阳县（今河北衡水市饶阳），见没有防备，就攻占了城池，安抚城里的士民百姓，很多人愿意跟随他，又有了三千多人马。

杨义臣见高士达已死，领兵而回。

窦建德遂得以回到平原，收拾跟随高士达战死者的遗体，都掩埋好，还为高士达举行葬礼，全军穿起白色的丧服。又招集逃散的士卒，得到数千人，军队又重新振奋起来，窦建德开始自称将军。

起初，义军见到隋官及士人一律杀掉，唯有窦建德尽力争取并善待这些一般官吏和士人，所以隋郡县的许多官员都主动归附。窦建德军很快发展到 10 余万人。

### 称王建国

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正月，窦建德在河间郡乐寿（今河北献县）筑坛，自立为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分治郡县。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冬至那天，窦建德在金城宫聚会文武官员，有五只大鸟降落在乐寿城，几万只鸟雀跟着飞来，整整过了一天才飞走，因此改取年号为五凤。有一个宗城人进献一枚玄王圭（黑色玉），景城丞孔德绍说：“古时夏禹亲受符命，上天赐给玄王圭。现在吉兆跟夏禹一样，应当称为夏国。”窦建德听从了这个建议，正式建立夏国。

立国之初，窦建德先后突袭盘踞在深泽县、拥兵十万人马的魏刀儿，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同年七月，大败隋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领 3 万幽、蓟精兵于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又收河间郡丞王琮。

此后，河北郡县争相归附于窦建德。

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擒杀宇文文化及于山东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选用隋朝官员，裴矩被任命为右仆射，定朝仪、制律令、兴文教。八月，迁都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建立天子朝度，仍称夏王。

### 命陨虎牢

武德三年七月（公元 620 年），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郑王

王世充。

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二月，窦建德率部击败三万精兵、攻克周桥城、俘获孟海公，采纳中书舍人刘斌：“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谏言，答应王世充求援，亲率 10 余万大军，号称 30 万西援洛阳，行至虎牢关，被李世民设计生擒。

窦建德被俘后，其夫人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率数百骑逃回洺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窦建德部下欲立建德养子为主，齐善行说：“夏王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岂非天命有所归也？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人”(《旧唐书·窦建德列传》)。遂将府库财物分给士卒，让其各自散去。然后齐善行与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部属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等八玺降唐。窦建德所建夏国，也就此灭亡。

武德三年七月十一日(公元 621 年 8 月 2 日)，窦建德于长安遇害，时年 49 岁。

## 二、主要成就

### (一) 侠义民风，永播乡里

窦建德虽然出身名门，但是传至建德之际，天灾人祸等种种因缘，已使其沦为贫苦农民，但身贫不忘乡亲，在闻知乡邻有难之时，能尽其所有，卖掉农民视之为生命的耕牛，帮助乡亲安葬家人，这种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侠士之举。在有意无意之中，让乡亲们感知并铭记中华传统道德的美好。

窦建德一身是胆，智勇双全，斗杀盗贼的义举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窦建德父亲去世的时候，乡亲们赠送的财礼一概不收，美名广播于乡里，永世流传。

### (二) 高举义旗，重创隋军

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窦建德因全家被官府屠杀，率领他手下的两百人投靠了高士达。被任命为司兵。他常常拿出身上的所有财物接济别人，跟士卒一样吃苦耐劳，因此能激发人们舍命相随。

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 年)，涿州通守郭绚率领一万多人马到高鸡泊讨伐高士达。高士达提升窦建德为军司马，把军权全部交给了他。窦建德统领兵众，用计大败郭绚，杀死俘获数千人，得到战马一千多匹，斩杀隋将郭绚。

紧接着，窦建德在隋朝廷派太仆卿杨义臣率领一万多人攻打义军之际，率百余勇士突围，据饶阳，安抚城里的士民百姓，有三千多人久闻窦建德侠义之美名而加入义军。

窦建德又乘杨义臣不备返回平原县，收拾跟随高士达战死者的遗体，都掩埋好，还为高士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全军穿起白色的丧服。招集逃散的士卒数千人，军威重新振奋。

窦建德始称将军，以礼相待归降的隋朝官吏和当地士绅，如据饶阳之时，善待长官宋正本，跟他商讨大计方针。

此后隋朝郡县的长官纷纷献出城池归附于他，军队气势更加兴旺，精兵强将多达十余万人，成为反抗暴隋的主力军之一。

### （三）不忘初衷，护佑一方

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正月，窦建德称长乐王，七月，大败隋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领三万人马于七里井。义收河间郡丞王琮，任命王琮为瀛州刺史。开始以乐寿为都城，取名叫金城宫，从此攻占了很多郡县。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 建立夏国。大败贼军魏刀儿数万人马，收上谷郡、深泽县等地" 。

窦建德每当攻陷城镇打败对手，所得到的财物，一起分发奖赏给各位将领，自己一样东西都不要。又不食肉，日常吃的只是蔬菜、脱皮粟米饭。他的妻子曹氏不穿丝织衣裳，生活简朴。

窦建德在所立夏国境内广施德政、劝课农桑、疏水入柳沟，与永济合流。得益于他的治理，营造出了一种“境内无盗，商旅野宿”的平静祥和的社会。

### （四）精神不死，光耀千秋

李渊因惧窦建德仁义之盛名，将其斩首示众后，一纸命令便要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王小胡等窦建德部将强征到长安，让这些将领惊惧不已。他们既痛感“吾属皆为夏王所厚，今不为之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之士！”(《资治通鉴·唐纪五》)又唯恐进入长安后遭遇不测，遂决定重新起兵造反。

当年七月，窦建德一干将领找到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闥，请他为主，正式举兵举起义旗。

凭借窦建德仁义大旗的号召力，仅用半年时间，刘黑闥就“尽复建德旧境”。史书记载，刘黑闥“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资治通鉴·唐纪六》）一个比窦建德更难对付的河北政权出现在李唐王朝面前，从而开启了李唐王朝三百年之乱局。

窦建德自起兵至败亡，虽然只有短短的6年，期间“义伏乡间，盗据河朔，抚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沈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至亡灭，鲜克有终矣”（《旧唐书·窦建德列传》）。《旧唐书·窦建德列传》指出窦建德的失败关键在于“悞谏”，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但以窦建德为首的起义军、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坚持反隋斗争，是推翻隋炀帝暴政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窦建德虽因缺乏政治远见等原因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

窦建德身虽已死，但其精神不死、光耀千秋！

全国有多处窦建德墓和窦王庙。

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西官庄村，东临卸甲河的窦建德墓。为隋代墓葬。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泰安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1957年泰安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应保护的文物古迹。1996年6月泰安市郊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洛阳百姓流传，窦建德死后葬在偃师县缙氏镇孙坡村。该墓曾有过被盗经历，种种原因，至今未被完全挖掘，应该说是尚为完好。

位于河南省太康县常营镇后刘行政村西窦建德墓。墓冢东距大广高速约1公里，西面有一大坑，东侧近处为后刘村村民住宅。墓冢高2.6米左右，直径10米。据当地人讲其冢，祖辈相传就是窦建德墓。窦建德在长安被杀后，部属敛其尸葬在自己家乡。解放前，墓前立有石碑坊，后来被毁。现后刘村北还称窦岭（陵）。据明嘉靖三年的《太康县志》记载“窦陵，县西五十里窦建德葬。”墓冢所在位置与县志记载相符。

河北省大名县建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大和三年（公元829年），魏州（治今河南安阳）书佐殷侗有感于其事，特在庙中立了一块纪念碑，至今犹存。

山东省临沭县叠翠峪深处的窦王庙，相传当地人为纪念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而建庙于此。该庙是苏鲁地区极有影响的古寺名刹。庙西侧的石壁上有记载七品芝麻官徐九经当年游山题诗：“远看一座叠翠山，近看一座叠翠山，山前山后转着看，真是一座叠翠山”等摩崖石刻，成为著名的纪念性人文景观。

### 三、“德能”思想

#### （一）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农民英雄

隋帝杨广即位以后，荒淫无道、好大喜功、广施暴政，致使中央政治崩坏，对于地方政府的统治乏力，全国各地涌现出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军。在宇文化及弑杀杨广之后，隋朝中央政府正式宣告灭亡，各地方政府军群龙无首，中国的国内局势变得更加混乱。

在当时的反隋大军中，有的是之前隋朝的重臣如李渊父子、还有的是啸聚山林的强盗如魏刀儿等，在这个乱世之中，他们大多醉心于争权夺利，将道义抛诸脑后，不过在将领中，却有一位以高尚的品行为世人所称道，那就是被迫举兵反隋，后来成长为起义军领袖并建立夏国的农民英雄-----窦建德。

窦建德虽然是名门之后，但至此一代，已沦落为以亲自耕种为生的农民，然而，他却从未降低自己对于崇高道德标准的要求，无论是对于困境乡邻的相助，还是对于忠臣良将的宽容，在当时都是十分罕见的。哪怕在其行将败亡之际，他还是为了对当时的邻国许下的承诺而失去了扩大势力的机会，这样的重信守诺之人，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可贵的。或许，这是他才能和智慧不足，不知变通的错误决定；或许遑论对错，只因他遇到的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李世民。这也是后世史官会对其败亡给出“天命有归，人谋不及”，在那个成王败寇的时代却少有对其诋毁的重要原因。就连当时的敌人秦王李世民都对其人品给予高度的认可。

#### （二）侠肝义胆、智勇双全、仁爱乡亲

窦建德与其他隋末起义军领袖有所不同，他在隋朝时无权无势，年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有着很高的道德素养，是知名的仁义之士，这也是他日后能够成为起义领袖的重要原因。

窦建德年轻的时候，就以重信义而闻名于乡里，而且他智勇双全、行侠仗义、仁爱乡亲的美好品德让他受到了乡亲们的敬重。

窦建德身虽贫、却德不孤，闻知乡邻父亲去世，因家境贫寒，没有钱安葬。

当时窦建德正在田间耕地，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便长叹不已，希望能帮助那个人。不过当时的百姓都生活在隋朝政府的高压之下，他自己身边也没有余财，之后下定决心忍痛卖掉了自己的耕牛，换取了足够的钱财，帮助乡亲举行了葬礼，其古道热肠、侠肝义胆之人品高尚，从这件事情中可见一斑。

窦建德智斗盗贼的故事，展现了他临危不惧，智勇双全的英雄本色。

窦建德在其父亲去世，附近的乡亲们听说之后都前来送葬，并打算给予他一些礼物以示尊敬时，体谅众乡亲生活困苦不易，分文不取。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重义轻利、仁爱乡亲的美好品行，这一点在其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在《旧唐书》记载曰：“尝有乡人丧亲，家贫无以葬，时建德耕于田中，闻而叹息，遽辍耕牛，往给丧事，由是大为乡党所称。初，为里长，犯法亡去，会赦得归。父卒，送葬者千余人，凡有所赠，皆让而不受。”

有言曰：“穷生奸计，富长良心”，但是，窦建德的乡亲们分明看到了一位身虽贫穷，心却高贵的美好青年人。

### （三）志存高远、匡扶天下、倾身接物

窦建德因美名广播于乡里，所以被选为二百人长，在同乡孙安祖义杀县令，投奔自己之时，说了一番话：“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县城西南，旧为漳水所汇）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旧唐书·窦建德列传》）。从此番言语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位志存高远、匡扶天下的有识之士。

窦建德是一位品德高尚，躬耕于乡野之间，以种田为生的普通农民，本无起义反隋之心，他只是希望让乡亲们不必参与沉重的徭役，而且在隋朝政府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希望能够为安定天下做出一定的贡献。可是当地政府却认为他与强盗都是一伙儿，便杀害了其家人，这反而坚定了其反隋的决心，毅然投奔起义军高士达部。

窦建德率兵加入起义军之后，能倾身接物、善待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身

先士卒、作战勇敢，赢得了士兵的爱戴，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在他的带领下屡挫隋军。为以后建立根据地、护佑一方打下了基础。

从窦建德的人生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李渊、王世充等反隋首领不同，他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那时的他还梦想着成为匡扶天下的忠臣义士，只不过后面的阴差阳错、风云际会将他推上了起义军领袖的位置，而且在其年轻的时候和参加起义军之后，能够在残酷的战争中，依然坚持高道德标准做人行事，成了他振臂一呼、应者如云，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因素。

#### （四）礼贤下士、宽以待人、德被冀鲁

窦建德开始加入义军的时候，只是高士达手下的一员将官，但是他身上所具有的人格魅力，让他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所以，高士达被隋将杨义臣杀害之后，他便成为了这支义军的领袖，雄踞于山东、河北地区。

当时在全国各地的反隋军首领们，每逢攻陷城池，就会杀死当地的隋朝官员与士人，这种行为反映了人们对当时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只有窦建德在捉住隋朝臣子之后，会对他们以礼相待，于是附近的隋朝官员们多举城来降，这让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窦建德率领起义军进攻河间期间，郡丞王琮据城死守，但是闻知隋帝杨广被宇文化及弑杀之后，王琮便率人发丧，然后向窦建德请降了。在王琮被押解到建德面前后，建德亲自为其松绑，两人谈到江都政变的时候都泪如雨下。

其时，有士兵要求杀死王琮来祭奠攻城中战死的士兵，但是他认为王琮是难得的义士，当时的王琮是在尽一个臣子的本分，如果杀了他，那么自己就是不忠不孝之人。他还下令，凡是有人再提杀王琮的事情，就夷灭其三族，士兵们才逐渐安静了下来。

窦建德更是在击败了宇文化及的叛军后，对裴矩等隋朝重臣也都礼敬有加。他第一时间拜见了萧皇后，此事在《旧唐书》中有如下记载：“即日引兵讨化及，连战，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纵撞车抛石，机巧绝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悉收弑炀帝元谋者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对而斩之，梟首辕门之外。”

当时盘踞在洛阳附近的王世充也是诸侯之一，当时他拥立隋文帝杨坚的孙子、杨勇的儿子杨侗为新帝，于是窦建德便将其视为隋朝政府的延续，听从其调

遣，但是在王世充杀死杨侗之后，他便与其断绝了联系。

窦建德率大军进攻相州，又攻克黎阳，一举俘虏李唐王朝的淮安王李神通、皇妹同安长公主以及日后赫赫威名的大将李世勣。过后，李世勣弃父逃跑，窦建德非常仁义大度，说“李世勣本是唐臣，不忘其主，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能把李世勣父亲李盖放还。不久，又把好酒好肉安置于大宅子的李神通和同安长公主送归唐朝。

以唐朝为正朔的封建史家皆以窦建德为“贼”，但对他的称赞叹扬之辞，通篇连牍。

“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所使婢妾才十数人。至此，得宫人以千数，并有容色，应时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骠果尚且一万，亦放散，听其所去。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群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关中及东都者亦恣听之，仍给其衣粮，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旧唐书·窦建德传》）

凡此种种，窦建德礼贤下士、宽以待人之品行可见一端。

特别是在窦建德称王建国后，在所立夏国境内劝课农桑、疏水入柳沟与永济合流，薄赋轻徭，与民休养，军纪严明，深受百姓拥戴。

永年县关于窦建德的传说多矣，且无一例外均为正面传颂！

有一天他到城北菊花庄微服私访，看到老百姓一家老小人力拉犁，当即将战马借于农夫耕田，菊花庄因此更名为借马庄，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永年县最古老的村庄之一。

永年县境内还有几村村名来历与夏王有关。如府城西北 30 里处方头固冢，相传为窦建德与秦王李世民对垒时的“疑粮冢”，也有说为窦建德所筑点将台，又叫夏王台，旁边村庄叫方头固村。距方头固冢 5 里有村名洞头，相传为窦建德“藏兵洞”西头，故名洞头，另一头在府城西关。三合村原来也不叫三合村，相传该村同胞弟兄三人，因分家闹得不可开交，官司告到夏王府，窦建德略施巧计，三兄弟和好如初，村名因此改为三合村。

窦建德在永年亲民故事很多，与他有关的遗址遗存数不胜数。

得益于他的治理，营造出了一种“境内无盗，商旅野宿”的平静祥和的社会。

这也是在其遇害后，冀鲁人民怀念他，并为其建庙祭祀至今的原因所在，窦建德可谓德被冀鲁。

### （五）守信重诺 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

窦建德因王世充弑帝自立，不仅不再与其往来，而且将其视为乱臣贼子。但是与此同时，李世民的唐军已经基本平定了关中的各路势力，开始进军中原，并且围困了洛阳。王世充看出自己无力抵挡唐军的进攻，于是向窦建德寻求援助，他本来不同意，但其手下的谋士向其陈述现在的郑、夏二国已经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于是他决定出兵救援洛阳，一如年轻时，当邻居有难、出手相助，当年失去的是一头农民视同生命的耕牛，这一次却将有生命之忧。

当此之际，其麾下谋士凌敬向其提出：此时可以进攻防守空虚的关中地区，逼迫唐军回援，然后再占据河东之地，那么将在之后的战争中拥有不小的优势。他的夫人曹氏也劝他采纳凌敬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方式来替洛阳解围。其妻曹氏与他的对话在《旧唐书》上有如下记载：“其妻曹氏又言于建德曰：‘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溢口之道，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于是悉众进逼武牢，官军按甲挫其锐。”

窦建德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其理由是不能违背救援已悬命朝暮之郑国的诺言而失信于天下。

结果，窦建德率军行至虎牢关，被秦王李世民设计大败，他也在战斗中负伤，被唐军将领杨武威生擒。

窦建德被俘之后，其养子在听说其他人要拥立自己为王的时候，却选择以山东之地向唐王投降，因为不忍看到生灵涂炭，只想着尽快平定国内的叛乱，给百姓们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从他的身上更能体现出窦建德的人性光辉对周围人潜移默化影响，而这也是后人对其人品赞赏有加的重要原因吧。

最后，李渊因惧建德人格品行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危及自己的统治，杀害建德于长安。

观窦建德一生，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以仁爱侠义闻名于乡里，这为他积累了可

观的名望。在其举兵之后，以德聚众、抗击暴隋，与士兵同甘共苦，不贪图钱财，深得士兵敬爱。对于权力没有太大的野心，也许他只不过希望天下安定而已。在称王建国后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因而“境内无盗，商旅野宿”（《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八》），护佑一方百姓安居乐业。虽因才能和智慧不及李世民而遭擒遇害、功败垂成，但是，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德被冀鲁的事迹百代流传，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是家乡人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 四、作品赏析

##### 窦建德碑<sup>[1]</sup>

（唐）殷侗<sup>[2]</sup>

云雷方屯<sup>[3]</sup>，龙战伊始<sup>[4]</sup>，有天命焉，有豪杰焉，不得受命，而名归圣人，于是元黄<sup>[5]</sup>之祸成，而霸图<sup>[6]</sup>之业废矣。

隋大业末，主昏时乱，四海之内，兵革<sup>[7]</sup>成起。夏王<sup>[8]</sup>建德以耕氓崛起，河北山东，皆所奄<sup>[9]</sup>有，筑宫金城<sup>[10]</sup>，立国布号，岳峙虎踞，赫赫乎当时之雄也。是时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sup>[11]</sup>秦，然视其荆<sup>[12]</sup>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sup>[13]</sup>。唯夏氏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与夫世充、铣、密等甚不同矣。行军有律，而身兼勇武，听谏有道，而人无拒拂，斯盖豪杰所以勃兴而定霸一朝，拓疆千里者哉！或以建德方项羽在前世，窃谓不然，羽暴而嗜杀，建德宽容御众，得其归附，语不可同日，迹<sup>[14]</sup>其英分雄分<sup>[15]</sup>，指盼备显，庶几孙长沙<sup>[16]</sup>流亚<sup>[17]</sup>乎！唯天有所勿属，唯命有所独归，故使失计于救邻，致败于临敌，云散雨覆，亡也忽然。嗟夫，此亦莫之为而为者欤！向令运未有统，时仍割分，则太宗龙行乎中原，建德虎视于河北，相持相支，胜负岂须臾辨哉！

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圣唐大和三年，魏州书佐殷侗过其庙下，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感豪杰之兴奋，吊<sup>[18]</sup>经营<sup>[19]</sup>之勿终，始知天命之莫干，惜霸略之旋陨，激于其文，遂碑。

#### 注释

[1] 窦建德碑：唐朝建立两百多年后，唐文宗在位期间的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距窦建德去世208年），一个叫做殷侗的魏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与夏王窦建德登基坐殿的洺州相距150里）书吏，下乡办事，路过一个村庄，村旁的热闹场面引起了他的瞩目。只见百姓们三五成群络绎不绝，来到一座大庙前，举行盛大的祭拜仪式，“父老群祭，骏奔有仪”，仪式庄严隆重。殷侗好奇之心大起，走进庙中详细探询才得知，庙中供奉的，正是隋末唐朝初年的起义军领袖夏王窦建德。殷侗有感而发，奋笔撰写了《窦建德碑》，赞颂农民起义英雄窦建德的功德，显示了非凡的史识和胆略。

[2] 殷侗（móu），晚唐文人，生卒年、字号、里籍及事迹均不详。约唐文宗大和年间在世，曾任魏州（今河北大名）书佐（主办文书的佐吏）。

[3] 屯：聚集，积蓄。

[4] 龙战：指群雄割据争雄。班固《答宾戏》：“于是七雄虓阚（xiāo kàn），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

[5] 元黄：即玄黄，指血。《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6] 霸图：指争霸的雄图。

[7] 兵革：这里指战争。兵，戈、矛、刀、箭等兵器；革，甲冑。

[8] 夏王：《新唐书·窦建德传》：“（大业）十四年（618）五月，更号夏王。”

[9] 奄：完全。

[10] 金城：《旧唐书·窦建德传》：“始都乐寿，号曰金城宫。”

[11] 擅：据有。

[12] 刱（chuàng）：同“创”，“创”的本字，开始。

[13] “是时”四句：李密、王世充、萧铣、薛举，皆隋末起义军首领。萧铣“武德元年（615），迁都江陵”，江陵系楚地，故称“王楚”（《旧唐书·萧铣传》）。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故云“擅秦”（《旧唐书·薛举传》）。

[14] 迹：推究。

[15] 英分雄分：这里意为智勇双全。分，素质，犹天分。三国魏刘邵《人物志·英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

[16]孙长沙：即孙坚。《三国志·孙坚传》：“乃以坚为长沙太守。”

[17]流亚：指同一流人物。

[18]吊：亦作“凭吊”。谓对着遗迹遗物感慨往古的人或事。

[19]经营：规划创业。《诗经·小雅·北山》：“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 译文

乌云滚滚、雷声隆隆，争夺天下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有天命的因素，也有豪杰自身的原因，窦建德最终没能赢到天下，而让本朝圣祖得到了。于是窦建德遭受血光之灾，其霸业也随之结束。

隋朝末年，皇帝昏庸，时局混乱，四海之内，农民起义蜂拥而起。夏王窦建德以农民身份起义成功，黄河以北，崤山以东，都被他占有，建造宫殿，修筑城墙，建立国家，颁布号令，像山岳一样屹立，像老虎一样盘踞，声势显赫，是当时的英雄人物。这时李密坐拥黎阳，王世充占据东都，萧铣在楚地称王，薛举据有秦地，但是看看他们割据一方的势力，地盘规模的大小，都比不上窦建德。只有夏王窦建德治理国家，知礼明义而崇尚仁爱，看重忠诚又爱惜贤才，对待百姓不残暴，对待自己不放纵，所以兵所到之处无不取胜，号令所到之处无不令人叹服，与王世充、萧铣、李密很不相同。军纪严明，而自身勇猛，善于听取他人意见，而没有人拂逆他，这就是这位豪杰勃勃兴起称雄一方，拓疆千里的原因啊！有人认为窦建德是当今的项羽，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项羽残暴喜欢杀人，窦建德以宽容统治百姓，使百姓都归附他，项羽和他不可相提并论。探求他的英雄天分，大概不在孙坚之下。只是上天不眷顾他，命运不垂青他，所以使他在救助别人时，面临敌人的强大攻势，最终失败，势力倾颓，很快灭亡。哎，这也是不想有这种结果却有这种结果。假使时局仍是四分五裂，太宗盘踞于中原，窦建德坐拥河北之地，相互对峙，胜负哪是顷刻之间可辨的呢？

自从窦建德去世，到现在已经很久远了，山东河北之人，有的还喜欢谈起他的故事，并且还为他祭祀，由此可知他的名声不可磨灭，就好像他的人还活着一样。圣唐大和三年，魏州书佐殷侗探访他的庙宇，看见父老乡亲成群结队来祭拜他，仪式讲究，连连直呼夏王，就像窦建德在时一样。感慨豪杰让人振奋，哀悼他图谋创业却未能到最后，才知道天命不能自己主宰，惋惜他争霸天下的谋略很快失败，激动地写下这篇碑文。

## 赏析

这篇碑文开始一段阐述作者“天命归于圣人”的观点。“云雷方屯，龙战伊始”，碑文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场震撼宇宙的大血战开始了，乌云翻滚，雷声隆隆，一幅“黑云压城”的悲壮图景。可惜“天命”并没有归属窦建德，因而他遭到了国灭身亡的厄运，“元黄之祸成，霸图之业废矣”。这开篇八句，叙议结合，以议为主，如一短序，引入正题。

中间一段是碑文主体，称颂窦建德彪炳显赫的历史功德。首先简述了窦建德起义成功，在众多义军中，无论是割据一方的势力，还是规模的大小，都比不上窦建德。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是当时一支最强大的劲旅，相当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接着叙述了窦建德的人品，知礼明义而崇尚仁爱，看重忠诚又爱惜贤才，对待百姓不残暴，对待自己不放纵。”新、旧唐书《窦建德传》保留了这方面的一些记载。当时，窦建德虽然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夏王，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他还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这与当时其他的农民起义军很不相同。在攻城略地、行军作战方面，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他常常拿出身上的所有财物待人，跟士卒一起辛苦劳作，所以能使人为他效死力。因此形成了称雄一方，拓疆千里的政治局面。作者不仅讴歌了窦建德高尚的人品，而且还从多侧面加以评论。针对当时有人认为窦建德是当今的项羽的谬误论点，作者举出项羽残暴喜欢杀人，窦建德以宽容统治百姓，使百姓都归附他，项羽和他不可相提并论的事实来驳斥。作者认为他的英雄天分，只有威震华夏、割据称霸的三国时代的孙坚才能与之相比，因而，他的败亡纯属“天命”。作者还认为他去援救王世充是大失策，如果他不援救，或援救时不骄傲，则很可能形成与李唐双雄并峙的局面，即“太宗龙行乎中原，建德虎视于河北”；据《隋唐史话》记载：“夏王的政策最初和隋朝有显著区别，他们给农民减轻负担、劝课农桑。在清河一带修枯下渠入柳沟，与永济渠合流，促进了生产发展。”窦建德败亡二百多年后，山东、河北之地的百姓，经常谈起窦建德的事迹并祭祀之。作者悟出一个道理，窦建德为民做了好事，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最后一段，叙述了夏王庙香火盛况以及作者写碑文的原因。作者观看了夏王庙前父老乡亲成群结队来祭拜他，仪式讲究，连连直呼夏王这一热闹非凡的场面，同情窦建德的败亡，惋惜他争霸天下的谋略很快失败，激动地写下这篇碑文。收

笔言简意赅，引人回味。

窦建德遇害身亡距今已经快一千四百年了，由于他为民造福，老百姓永远怀念他。近年来，广府古城群众开展多种形式，自发纪念夏王窦建德。如 2014 年正月十二举办“窦建德拜城隍”活动，群众演员扮成夏王窦建德，在众多文臣武将的簇拥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浩浩荡荡前往古城西门附近广平府城隍，窦建德叩拜城隍爷，祈祷国运昌盛，风调雨顺，人民富足！据悉，永年县广府管委会筹建的广平府府衙是一座城内城，就是在夏王窦建德“万春宫”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已成为广府八大景观之一。

### 参考文献：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之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 王世充 窦建德.（史书典籍）. 诗词名句网. 后晋开运二年（945 年）。
2. 北宋·欧阳修 宋祁等.《新唐书》之列传第十 王窦.（史书典籍）. 诗词名句网.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
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唐纪四、五、六.（国学·史部）. 历史春秋网.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
4. 吴廷玉.《隋唐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 年：第 20 至 23 页。
5. 陈振鹏 章培恒等.《古文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年：第 1067 页至 1070 页。
6. 兴安书馆.《浅释〈百家性〉——窦》.（文史类）360 个人图书馆. 2013 年。
7. 荷叶 3638.《窦建德大败薛世雄：彻底打垮了隋军最后一支主力》. 2015 年。
8. 尚宫女史.《李世民为何在〈秦王破阵乐〉中丑化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文史类）. 360 个人图书馆. 2020 年。

# 颜真卿



## 一、生平简介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人称颜鲁公。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唐朝杰出的书法家、政治家。他的书法禀承家学，精妙雄秀，擅长行、楷。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行书气势遒劲，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柳骨”。是中唐时期的书法创新代表人物，对后世影响很大。同时，又因家学渊源，善诗文，著有《韵海镜源》《礼乐集》《吴兴集》《庐陵集》《临川集》（均佚），后宋人辑有《颜鲁公集》。

公元709年（唐中宗景龙三年），颜真卿生于京兆府万年县敦化坊（颜氏家族本籍琅琊临沂，自颜之推起，已徙居京兆长安）。他家学渊源，五世祖颜之推曾写下著名的《颜氏家训》，曾祖辈的颜师古、颜勤礼，也都是文史留香的名师硕儒。伯父颜元孙、父亲颜惟贞都擅长书法。彼时的颜真卿三岁丧父，721年（开元九年七月），随母南下苏州，寄居外祖父家，于京师长安的福山寺就读。舅父博学正直，对他关怀备至，教导有加。姑母颜真定、二兄颜允南也是博通经史、书法的学者。颜真卿就是在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日渐成长起来的。

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颜真卿到吏部应试。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二月），26岁的颜真卿于京兆府参加府试，被举选参加科试并一举以甲科举进士第。

公元736年（开元二十四年）颜真卿再赴吏部接受栓选，又被选为甲等，提拔萃科，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

公元 738 年（开元二十六年）任职两年后，母病逝，颜真卿辞职赴洛阳丁忧三年。公元 742 年（天宝元年），颜真卿丁忧期满，回到长安，逢科举，参加“博学文词秀逸科”（制举考试的一种）的科制举考试，仍以甲等登科。同年十月，被任命为醴泉县尉，746 年（天宝五年），三月，迁长安县尉。此时，颜真卿结识著名书法家张旭，并师从于他。之后颜真卿又曾任临川内史。据《云溪友议》所载：此期间“浇风莫竞，文政大行”颇受赞誉。再后来，又经两次提升，任监察御史，奉命巡查河东、陇州。颜真卿在巡视过程中平反了“五原冤狱”，受到百姓交口称赞；巡查河东时，“劾罢不孝的朔方县令郑延祚”，使其被朝廷下诏终身禁止录用。

公元 749 年（天宝八年），颜真卿升任殿中侍御史，因与宰相杨国忠“不睦”，遭其厌恶，被外调为东都采访判官。第二年，再任殿中侍御史（“调醴泉尉，再迁监察御史”《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公元 752 年（天宝十一年），44 岁的颜真卿调任武部员外郎，同年他创作了《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与此同时，杨国忠把持朝政的野心急剧膨胀，被视为异己之患的颜真卿再次被贬出朝廷，于公元 753 年被调离京师，出任平原太守。

公元 755 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逆流千里的危机关头，早有准备的颜真卿独以一郡之力高举平叛大旗，堂兄颜杲卿立即奋起响应！颜杲卿时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杀了叛军将领李钦凑等人，清除了土门的敌人，十七个郡同一天自动归顺朝廷，推举颜真卿为盟主，有二十万兵力，截断了燕、赵的交通联络，赢得了战事的主动。安禄山见河北有失，急令史思明率领万余精兵围攻常山。颜杲卿率全城军兵与叛军激战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叛军纵兵屠城，颜氏一门死难 30 余口。噩耗传来，颜真卿悲痛万分。“安史之乱”给国家也给颜真卿个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极度悲愤中，颜真卿凝刻心魄，收摄血泪，写下了被公认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季明文稿》。在这篇草书手稿中，颜真卿把抑制不住的感情，倾泄在磅礴迅疾的笔墨中，由于不遑笔墨而一气呵成，枯笔极多，愈至后段愈加纵逸，不仅传达出书者的激烈情感，也记录了这场家国惨痛的历史悲剧。

公元 759 年（乾元二年），颜真卿任浙西节度使，后招致李辅国的厌恶，被

降为蓬州长史。

公元 762 年（宝应元年），太子李豫即位，起用颜真卿为吏部侍郎。又授尚书右丞。

公元 764 年（广德二年正月），颜真卿留京主持尚书省事务，改封鲁郡公。之后，颜真卿掌管太庙事务，说祭器没有整治，元载认为他诽谤朝廷，将其贬为峡州别驾，后改任吉州司马。

公元 768 年（大历三年四月），颜真卿改任抚州刺史。后任湖州刺史。

公元 777 年（大历十二年），元载被杀，经宰相杨绾、常袞举荐，颜真卿获召入朝，担任刑部尚书，随后升任吏部尚书。

颜真卿为人一身正气，因而得罪权贵，屡遭弹劾，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唐肃宗至德二年，颜真卿被任为刑部尚书，迁御史大夫。公元 779 年（大历十四年），李豫驾崩，颜真卿重任礼仪使。宰相杨炎不喜欢生性耿直的颜真卿，被改为太子少师，仍兼礼仪使实为削弱他的实权。奸相卢杞掌权后，改授他为太子太师，罢免其礼仪使一职。之后千方百计想把颜真卿挤出朝廷。

公元 783 年（建中四年），安禄山残部勾结成德、淄清、魏郡等地节度使，相继叛乱。宰相卢杞用计陷害颜真卿，进言德宗，派颜真卿用重臣元老的身份去说服李希烈，致使 76 岁高龄的颜真卿身陷叛逆，李希烈以死相逼，要颜真卿做伪宰相，遭到颜真卿的怒斥。李希烈攻占汴州，在大梁做了伪楚皇帝，颜真卿又被囚禁了一年多，至死不肯屈节于叛臣。在兴元元年八月三日被李希烈派人害死在汝州。颜真卿最终被奸臣陷害，逆臣谋杀。公元 784 年（兴元元年），李希烈攻陷汴州，自称大楚皇帝，派人向颜真卿请教即位仪式。颜真卿说：“老夫髦矣，曾掌一国礼”所记者诸侯朝勤（朝见天子）礼耳”。李希烈恼羞成怒，派人将颜真卿缢杀于龙兴寺，76 岁卒。颜真卿遇害后，嗣曹王李皋及三军将士“皆为之痛哭”。德宗皇帝令将其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莹”，并亲颁痛诏废朝八日，举国悼念。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是以“义烈名于时”，追赠司徒，谥号“文忠”。

## 二、主要成就

出身于儒学世家的颜真卿，尽管幼年丧父，但母亲殷氏“躬加训导”，更兼

姑母、伯父的亲自教诲，学业并未荒废。

### （一）境界铸书魂

颜真卿作为书法巨擘的身份，可谓人尽皆知。“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所以，颜真卿少年时就以博学多才、善写文章、书法工整而知名。在书法成就上，他独创了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颜体”楷书。颜体是中国楷书五大形式之一，与柳公权书法并称“颜筋柳骨”，一直以来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们孜孜不倦地学习与临摹。

颜真卿家学渊博，生为琅琊氏后裔，孔门弟子“复圣”颜回为其远祖，学富五车的颜之推（著有广为流传的《颜氏家训》）为其五世祖。可以说，这样的家族底蕴为他日后的为学、立身、处世奠定了基础。颜真卿对书法有着极大的兴趣，这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可见一斑，他曾向张旭请教书法技巧，从二人的问答中可以看出，颜真卿对书法进行了极深入的研究和练习，有着极高的感悟，对所谓的“折钗股”“屋漏痕”等技法都了然于胸。后来他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彻底摆脱了初唐的风范，创造了划时代书风，完成了“结体宽博，笔力遒劲，骨力洞达，气势恢宏”的“颜氏书法”。

颜真卿在书法一途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是不是身陷其中仅仅为书法而书法呢？

事实并非如此。“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辅篆籀为当代所称”“真草书迹，微须留意”（《草篆帖》）。这说明颜真卿祖上多有擅长书法者，但也有祖训告诫儿孙不要过多练习书法，没有必要过于精通。只是颜真卿并没有拘泥于祖训，对书法是作过精深研究的，但他对祖训也并没有置之不理。在他看来，书法仅仅是一门“杂艺”，可以作为记功立言的工具，而不是其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他来说，当遇到内心有所感需抒内心感受，或者需要传记铭文时，他便随手拈来，作为劝谕他人的箴言。而从没有为创作而创作。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又是随手拈来，他的书法才呈现一种自然天成大朴无华又活泼可爱的魅力。而颜真卿本人又常怀一颗忧国忧民的中庸之心，并把这种理想贯彻在他的书写中，因而他的书法作品透出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磅礴之气。可以说，颜真卿是把书法作为他中庸治国理想的锦上添花，为其文治武功的远大理想服务！书法与人格交相辉映，成为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影响深远的“颜体”楷书特点：点画浑朴，笔势雄壮；结构宽博，外紧内松；布白紧密，空间有章法。书风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气象。如《多宝塔感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不仅楷书，他的行草书突破王羲之“手札”书法的规范，在王派之后为行草书别开一生面。这种字体他充分运用了“折钗股”“屋漏痕”等技法，也采用了与其整体效果非常一致、和谐的结构样式，用笔丰富，兼取方圆，使汉字的造型遒劲郁勃、结构沉着、点画飞扬、真情自然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代表作如《祭侄文稿》、《争座位帖》，还有他晚年的得意之作《颜氏家庙碑》。

## （二）礼制有厘正

颜真卿“久任礼仪使，参定礼仪，虽屡遭权臣刁难，但对唐朝的礼仪制度确有厘正”。

安史之乱后，唐典章法令多有废弛，颜真卿虽博古通今，但因他的建议多被权臣阻扰，难以实施。长安收复，情况有所好转，李亨派左司郎中李选祭宗庙，在祝词上署名“嗣皇帝”，颜真卿对礼仪使崔器说：“太上皇还在川蜀，这样行吗？”崔器立即报告李亨更改，李亨因此赞赏颜真卿的才识。颜真卿又建议在长安郊野筑坛，由李亨向着东方哭祭，然后再派出礼仪使，李亨未采用此建议。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李豫驾崩，颜真卿重任礼仪使，关于庙享，当时亦争论不休。他上奏说前几朝皇帝追加谥号的礼节繁复，请按初定的礼节为准。颜真卿的意见遭排斥。公元782年（建中三年），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被采用。

## （三）文学亦大咖

颜真卿一生文化建树颇丰：“其作品涉及《韵海镜源》、《礼乐集》、《吴兴集》、《庐陵集》、《临川集》等，均佚。幸有后人辑其诗文为《颜鲁公文集》15卷。《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及《全唐文》亦收录有其作品”。

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颜鲁公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唐颜真卿撰。真卿事迹具唐本传，其集见于艺文志者，有《吴兴集十卷》，又《庐州（陵）集十卷》《临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佚。嘉佑中（1060年），宋敏求编本亦十五卷（见馆阁书目）。后得残本，经拾遗补阙，分为十五卷。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辑诗一卷，联句诗十九首编入御定《全唐诗》。同年，增

编为《文忠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录入。

### 三、颜真卿之“德”“能”思想

“您也许知道，颜真卿这个名字标志着的是一代书法巨擘大师，是风骨健劲的颜体的开山祖，却可曾知道，颜真卿笔下的一竖一横，皆出自一个忧国忧民、壮怀激烈的伟大灵魂；一撇一捺，皆熔铸着对中华河山、对庶民百姓的深深热爱之情？可曾知道，颜真卿这个名字，因为一串虽然古老却令人心神悸动、热血沸腾的故事而更加流光溢彩！”（《颜真卿》（权海帆所著的历史人物传记））

#### （一）忠孝立家国

据史书记载：“颜公官四十有五，而居中（指在朝廷）者才十载，六遭贬斥竟至杀身”。

我们先来看看颜真卿一生的仕途轨迹：玄宗时期，不容于奸相杨国忠，因而，由殿中持御史被贬黜到平原（今山东）任太守，也因此有了“颜平原”之称；肃宗时期，曾授刑部尚书，迁御史大夫。然而又因为“太庙筑坛”一事，招致宰相所忌，被黜为同州（今山西）刺史。乾元二年拜升州（今南京）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兼江宁军使，因平刘展谋反有功，被召入朝为刑部尚书。同年四月，肃宗改元，宰相李辅国矫诏，迁元宗居西宫，“颜公率百僚上表请问起居，为宰相恶之”，贬至蓬州（今四川蓬安）长史；宝应元年，代宗即位，任元载为相，拜公利州（今广元市）刺史，翌年公改吏部尚书右丞，十月吐蕃犯京畿，公扈从至陕州，返京时，公主张“先谒五陵九庙，而后还宫”，宰相曰：“不合时宜”。颜公怒：“朝廷之事，岂堪相公再破坏耶！”于是元载对颜公怀恨在心，后借机奏颜真卿“诽谤”，是年，贬公至硤州别驾，而后吉州、抚州、至湖州刺史。大历七年，及元载伏诛，公才回京复任刑部尚书；建中三年颜公 74 岁，当是时，宰相卢杞擅权。卢杞此人阴险奸诈，忌能妒贤，先陷害杨炎等人，但忌颜公。后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攻陷汝州，于是卢杞乘机上奏德宗：“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糊涂的唐德宗竟然同意了卢杞的提议，众朝臣皆惊讶“失色”，知道这是卢杞携私报复，颜真卿此去必将一去不复返。但是，颜真卿以社稷为重，不顾年老体弱，义无反顾地奔赴淮西。李希烈用尽各种方式，威逼利诱，颜真卿终不为动。后被缢杀，享年七十六岁（一作七十七岁）。

话说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颜鲁公因其个性导致仕途上的“六上六下”之境

遇，比之我们当代伟人邓小平“三下三上”的遭遇犹过之。窃以为，颜真卿仕途的曲折经历足可见其一颗“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正义在胸，不阿于权贵，不屈意媚上”的赤子之心。颜公以一颗赤子之心立身于朝廷。他主张“君主要掌握赏罚二柄，此为事在必行”“无功受赏，为善不劝；有罪不罚，为罔辨”“应使天下知道有必行之法，有必赏之令”（《文忠集·让宪部尚书表》）。总之，做为朝臣，他总结唐立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建言德宗要广开言路，一度令天下大治（《新唐书·颜真卿传》）。

此外，颜真卿认为人之德行有三，孝悌为最（“孝悌称其至”），善事父母谓孝，和睦兄友谓悌。孝悌为仁之本。品行上他精通儒学并身体力行“忠孝”之举，被后世儒者奉为修身楷模（“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尤崇忠孝”）。26岁的颜真卿考中进士，踏上仕途，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一直与其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开元二十六年）。颜真卿非常孝顺这位在逆境中悉心教导自己的伟大母亲，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处于上升期的事业，回家为母亲守孝3年，以尽人子之孝道。

如此可见，立于朝，颜真卿坎坷的政治境遇足以显示他纯厚的秉性、铮铮的铁骨。更难得他遭遇不公也不以去国为忧，依然忠君爱民，勤于政务，特别是同安禄山、李希烈等叛乱势力展开殊死斗争，至死方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拳拳之心可昭日月！立于家，他侍母至孝，践行儒学之旨，身体力行，终不负其“忠孝仁义”之品性。

## （二）文亦彰品性

颜真卿一生在任地方地方官时，文化上很有建树。特别是他广罗文化精英，编著完成巨著《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中国古文字形声之义）的事迹。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十二年（796年）十一月，刑部尚书颜真卿以所著《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上于朝。据黄本骥《颜鲁公著韵海镜源始末考》：颜鲁公于平原刺史

任上（约成书前 20 年），便着手著《韵海镜源》，彼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始创条目，后遇禄山叛乱，遂寝而不修。大历七年，广罗文化精英十余人，笔削旧章，核搜群籍，撰定为三百六十卷。据法言切韵次其字，按经史及诸子语、据音韵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类编；又按仓雅及说文玉篇等其义，各注其下，谓之字脚。韵海者，以牢笼经史之语，依韵次之其多如海；镜源者，八体之本，究形声之义，故曰镜源。绵亘数载，其功乃毕，奏表上之，有司诏所司藏之于书府。大抵求经史撰集篇，赋利于後学焉。”据黄本骥《颜鲁公著韵海镜源始末考》，颜真卿在任典校时，即考其五代祖隋外史府君与法言所定切韵，引说文苍雅观诸字书，穷其训解，次以经史、子集中两字以上成句者，广而编之，故曰韵海；以其镜照原本无所不见，故曰镜源。

其它如宋人编辑的集颜真卿主要作品的《颜真卿文集》，是颜公文学才华的集中呈现。观文集中所撰作品，文字实用，辞藻率真慷慨，意直气壮，生动感人，对唐代古文运动起到促进作用。

集大成者苏轼评：“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东坡题跋》）。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论书》）”。

还有为后世所称颂的《论百官论事疏》、《与郭仆射书》等，宏词沉郁，忠节之言，如见其人，蕴含了颜真卿忠烈刚直的品节。

南宋学者晁公武评：“颜真卿‘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高棅亦评道：“鲁公情欣所遇，悉综古调，颇尚格气，不事弥文。虽有一二近体，不过游戏之作，非所以系幽惊也。今集中所载不及百篇，大都守吴兴时，与皎僧、陆处士之流结思岩林，相忘外道者也，然旷世之情，优入三昧，殊非守平原时色相。（《唐诗品汇》）”；犹见其“懿文硕学，为百氏之宗”（李亨）；“公之功名事业已绝于人，而文学之妙亦不可及”（马存《颜鲁公祠堂记》）；而那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

方悔读书迟。”更是妙不可言，流传至今成为父母用以勉励孩子勤学的箴言。

### （三）成就显才能

颜真卿书法上独创“颜体”楷书，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们孜孜不倦地学习与临摹，可谓影响深远，缔造了书法界传奇；其文学之成就亦人不可及！但，就在这样的文坛大咖身份之外，颜公还有两段名气略逊、但更值得尊崇的经历：他以一个文官的身世背景，参与平定安禄山与李希烈的两场叛乱。这样的经历在彰显他品性的同时，也成为他人人生中在政治上的最大贡献。

《新唐书》记载：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夏，颜真卿被杨国忠以加强地方吏治为名，排斥出京都，出任平原郡太守。此时的唐王朝正面临着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大角斗。颜公凭多年的从政经验和种种迹象觉察到，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反意甚明。当时，安禄山的驻地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距平原郡仅600里。于是，颜真卿就以防淫雨为名，不动声色地修浚城池，招募壮丁，储备粮草，训练人马，积极备战。为了迷惑安禄山，备战同时他又天天和一些名流游览名胜古迹，泛舟马颊河，饮酒赋诗，行觞咏之乐。狡猾的安禄山也曾派遣幕僚以正当名义巡视平原郡，刺探防务情况。颜公则将计就计，陪同来使游览郡内名胜厌次故城（今陵县神头镇）遗址和东方朔庙、东方朔墓以及汉代72疑冢等古迹。当看到东方朔庙中陈列的《东方先生画赞碑》时，颜真卿借口韩的刻碑太小，字迹不清晰，当场重写了《东方先生画赞碑》及自己撰文的《碑阴记》。智慧的颜真卿通过这些举动，给对方一个“书呆子”的形象，成功蒙骗了安禄山的使者，使安禄山“果以为书生不虞也”，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第二年，安禄山果然于范阳起兵，由于唐王朝升平日久，毫无准备，黄河以北郡县大部很快失陷，独平原郡城高池深，兵多粮足，守备森严，稳如泰山。当时，为防御安禄山的骑兵，颜真卿还用烧砖的方法烧制一种特殊的兵器——“绊马石（民间俗称）”，绊马石形状不一，大小不同，铺设在敌兵必经之路，马踏上使人仰马翻，守城时也可作砸击之物。彼时颜公一边严阵以待，一方面派人飞马赴京急奏，唐玄宗正为河北尽陷而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时，听闻此奏报，无限感慨地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如何，所为得如此！”对颜真卿大加赞赏，令其固守平原，伺机反攻，收复失地。后颜真卿联络从兄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响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迫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从而挽救了唐王朝的覆亡，让后唐得以

中兴。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趁机“借刀杀人”陷害颜公。公知其阴谋，但他忠贞为国，置生死于不顾，只身赴难，李希烈使尽手段威逼利诱，皆不能为颜公所屈，李慑于颜公的忠义大节，不敢下手，以“人质”羁押岁余，因此，官军在军事上争得了时间。后来，希烈之弟希倩在朱泚党中伏诛，希烈闻之怒，遂缢杀颜公。最后，叛将李希烈被部下所杀，叛乱平定。至此颜真卿灵柩得以归京，德宗“辍朝五日，举国悼念”并“诏录其功，赠司徒，谥文忠”。追念颜公一生：“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公“以义烈名于时”。颜真卿最终以宝贵的生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成为忠臣烈士的典范。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写下一首情感浓烈的诗，盛赞颜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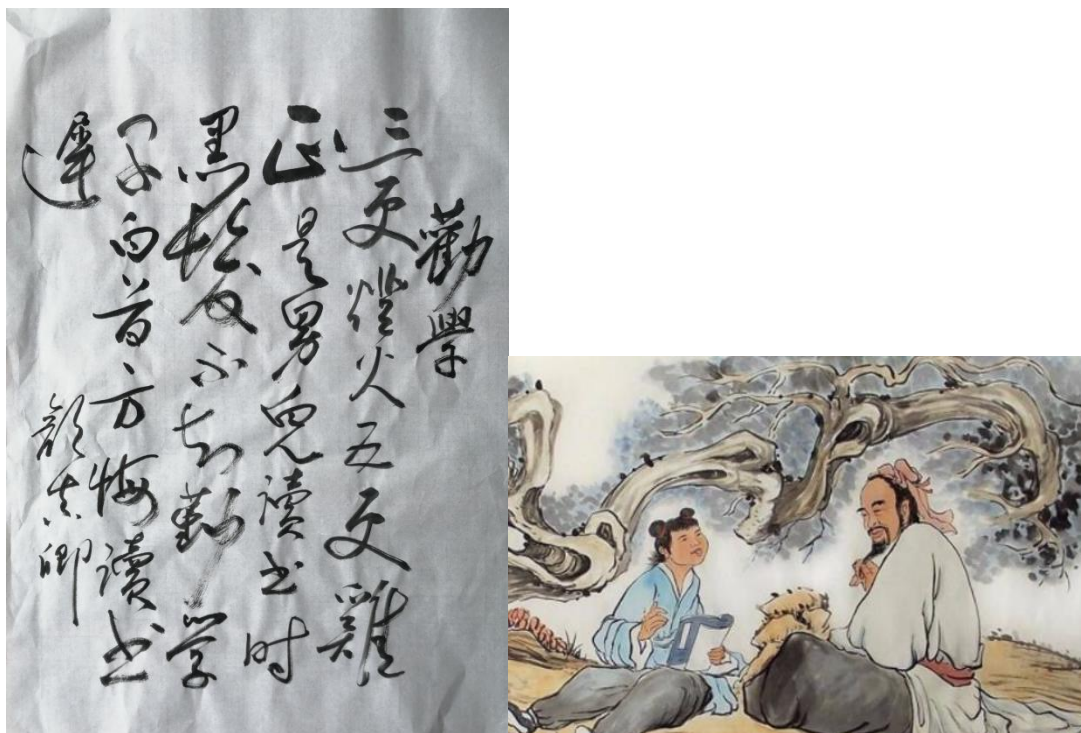
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河以北无坚城。  
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夏盟。  
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京。  
明皇父子将西狩，由是灵武起义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论牵制公威灵。  
哀哉常山惨钩舌，心归朝廷气不慑。  
崎岖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节。  
当年幸脱安禄山，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杀公，宰相卢杞欺日月。  
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  
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纵观颜真卿一生：他以方块字的风格为官为将，正色立朝，忠贞为国，刚直不阿（“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他的品性与才能皆为后世传颂。以德州子民的角度看，颜公在德州区域历代为官者中亦为佼佼者。他不仅将他著名的颜体书法（现存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的《东方画赞碑》、《东方先生墓碑》是颜真卿中年书法成熟时的杰作）永远地留在了这片热土上，还在这里演绎了一曲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祖国分裂的千古绝唱（他的旷世书法和巍巍的平原郡城墙遗址及至今仍随处可见的众多“绊马石”都是颜真卿抗击安禄山叛乱，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

正因如此的功业，他也因此成为对德州地域人文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之一，甚至成为世代德州人耳熟能详的人物！可以说，千百年来，颜真卿的爱国精神在德州这片大地上一直散发着熠熠光辉！他那方正平稳、雄浑矫健的颜体书法也是人们争相临摹的标本！这样的颜真卿，值得被千秋万代所尊崇！

#### 四、作品赏析

##### （一）文学作品



##### 《劝学》

三更灯火五更鸡<sup>[1]</sup>，  
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sup>[2]</sup>不知勤学早，  
白首<sup>[3]</sup>方<sup>[4]</sup>悔读书迟。

##### 注释：

[1]更：古时夜间计算时间的单位，一夜分五更，每更为两小时。午夜 11 点到 1 点为三更。五更鸡：天快亮时，鸡啼叫。

[2]黑发：年少时期，指少年。

[3]白首：头发白了，这里指老年。

[4]方：才。

## 赏析：

此古诗中的“劝”统领全篇，释为“勉励”的意思。这篇以《劝学》为目的的诗歌中，作者以短短的 28 个字便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达到了催人奋进的效果：诗作劝勉青少年要珍惜少壮年华，坚持勤奋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增长知识，发展才能，培养高尚的品德，长大以后才能有所作为。否则，老了将一事无成，后悔晚矣。其目的是让孩子初步理解人生短暂，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三更灯火五更鸡”是指勤奋的人三更半夜时还在工作、学习。三更时灯还亮着，熄灯躺下稍稍歇息不久，五更的鸡就叫了，这些勤劳的人又得起床忙碌。第一句用客观现象写时间早，引出第二句学习要勤奋，要早起。第二句为第一句作补充，表达了年少学习时应该不分昼夜学习，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报家报国，建功立业。第三、四句写的是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到了年纪大了，在想要学习也晚了。句子中“黑发”，“白首”是采用借代的修辞方法，借指青年和老年。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读书学习要趁早，不要到了老了后悔了才去学习。从结构上看，三、四句为对偶句，“黑发”与“白首”前后呼应，互相映衬，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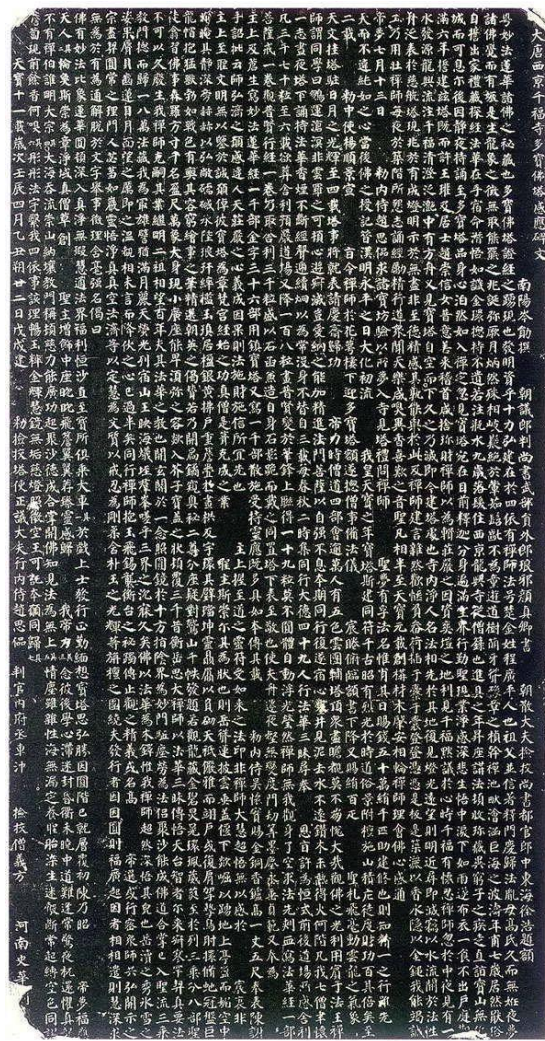
整首诗核心是“黑发早勤学，白首读书迟”，诗作深入浅出，自然流畅，富含哲理。诗歌告诉我们：作为有志气的人，要注意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修身养性。最好的读书时间是在三更五更，晨读不息；而且只有年年月月刻苦坚持，才能真正学到报国兴家立业的本领。诗作从学习的时间这一角度立意，劝勉年轻人不要虚度光阴，要及早努力学习，免得将来后悔。

总之，诗人从学习的意义，作用和学习应持的态度方法等角度立意，希望人们重视后天学习，以加强自身的行为修养。我们再联系颜真卿自身的经历来看，他 3 岁丧父，家道中落，母亲殷氏对他寄予厚望，实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亲自督学。最难得的是他自己也格外勤奋好学，每日苦读。可以想见，颜真卿为了勉励后人写下这首诗的同时，又何尝不是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呢？

## （二）书法作品

### 颜体楷书境界第一重：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

#### 1. 《多宝塔碑》（整体及局部）



### 赏析：

从行文中可以看出：这幅碑文主要风格是用笔稳健、雄厚；入笔坚实，行文刚劲，笔墨浓厚；字的结构整密、端庄、深稳，将文字由瘦长型变为正方形，写得天圆地方，字里行间不乏清晰、深远之特色；布白上减少字间行间的空白而趋茂密。可以说，此碑文达到了雄浑与妖娆相结合的境界：“点画皆有筋骨”，“点画净媚”，“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

《多宝塔碑》是颜真卿早期的得意之作，它的全称是《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是他早年继承传统书法风格的代表作，这个时期也是“颜体”的初步形成阶段。从这阶段的典型作品的分析来看，颜真卿的第一境界，从初唐开始，又脱出初唐之轨辙，自立一家。而这种境界的历练受张旭的影响颇深。

### 2. 《东方朔画像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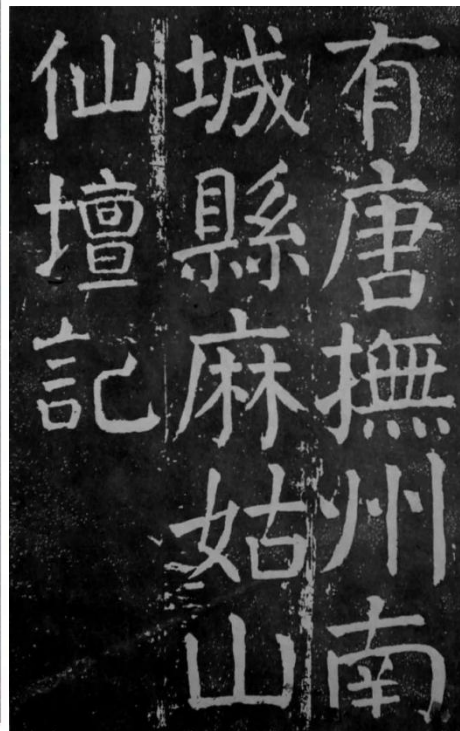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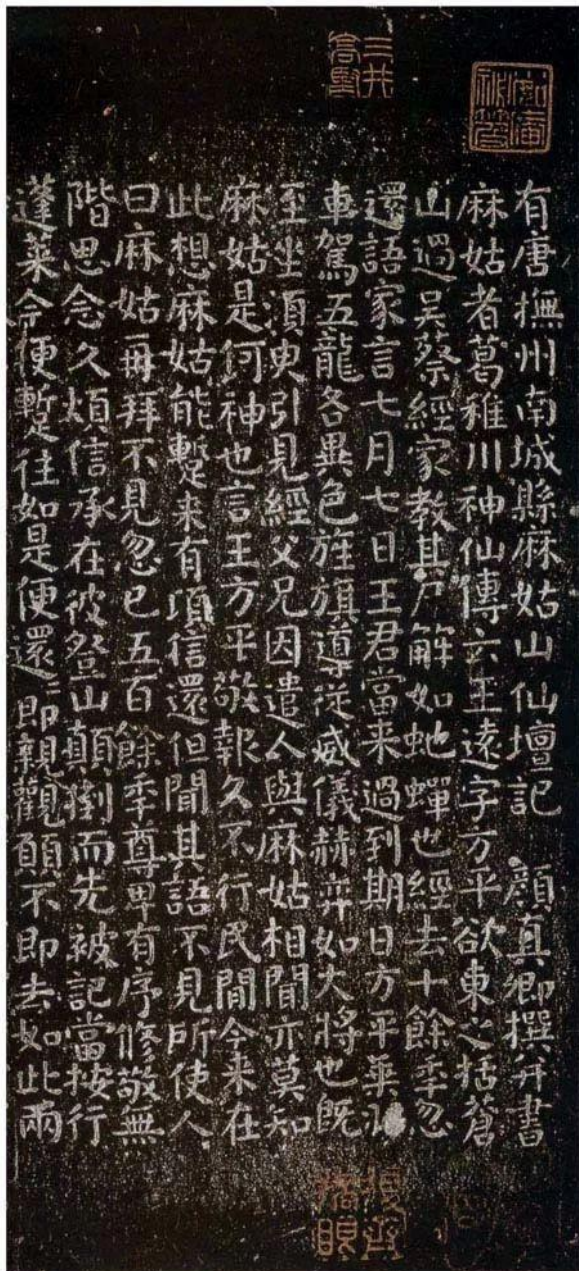


### 赏析：

《东方朔画赞碑》，俗称《颜子碑》，至今保留在山东德州陵城区。碑四面刻字，碑阳碑阴各 15 行，左右侧各 3 行，行 30 字；碑阳碑阴均为大字正书，阳额篆书，阴额隶书；碑文字大 6 厘米，碑额字大 10 厘米；全碑共 1073 字。碑文字体平整峻峭，点画雄健，结构丰伟，奋笔求张，是“颜体”极为难得的代表体。当是时，可能是兴致所致，颜真卿在楷书正文之后，笔酣墨畅，意犹未尽。于是又篆书碑阳额“汉太中大夫东方朔先生画赞碑”，隶书碑阴额“有汉东方先生画赞碑阴之记”，篆书格调古雅，隶书气势雄浑。一碑集楷、篆、隶三体于一身，加上刀工细腻，体现出颜体字之神韵，确属难得的上乘书法珍品。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亦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甚至宝晋斋本《东方画赞》条，认为其是王羲之小楷。颜真卿变小字为大字，易清朗俊秀为刚劲雄强，应说是师古而不泥古。假如说比此碑早两年的《多宝塔感应碑》还比较清秀，与后来的颜书面貌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东方先生画赞碑》已初具后来颜书的规模，确为颜碑中的精品，千多年来，世人争相拓摹，推崇备至。此碑在研究颜书的发展上有重要意义。

## 颜体楷书境界第二重：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

### 3. 《麻姑仙坛记》（整体与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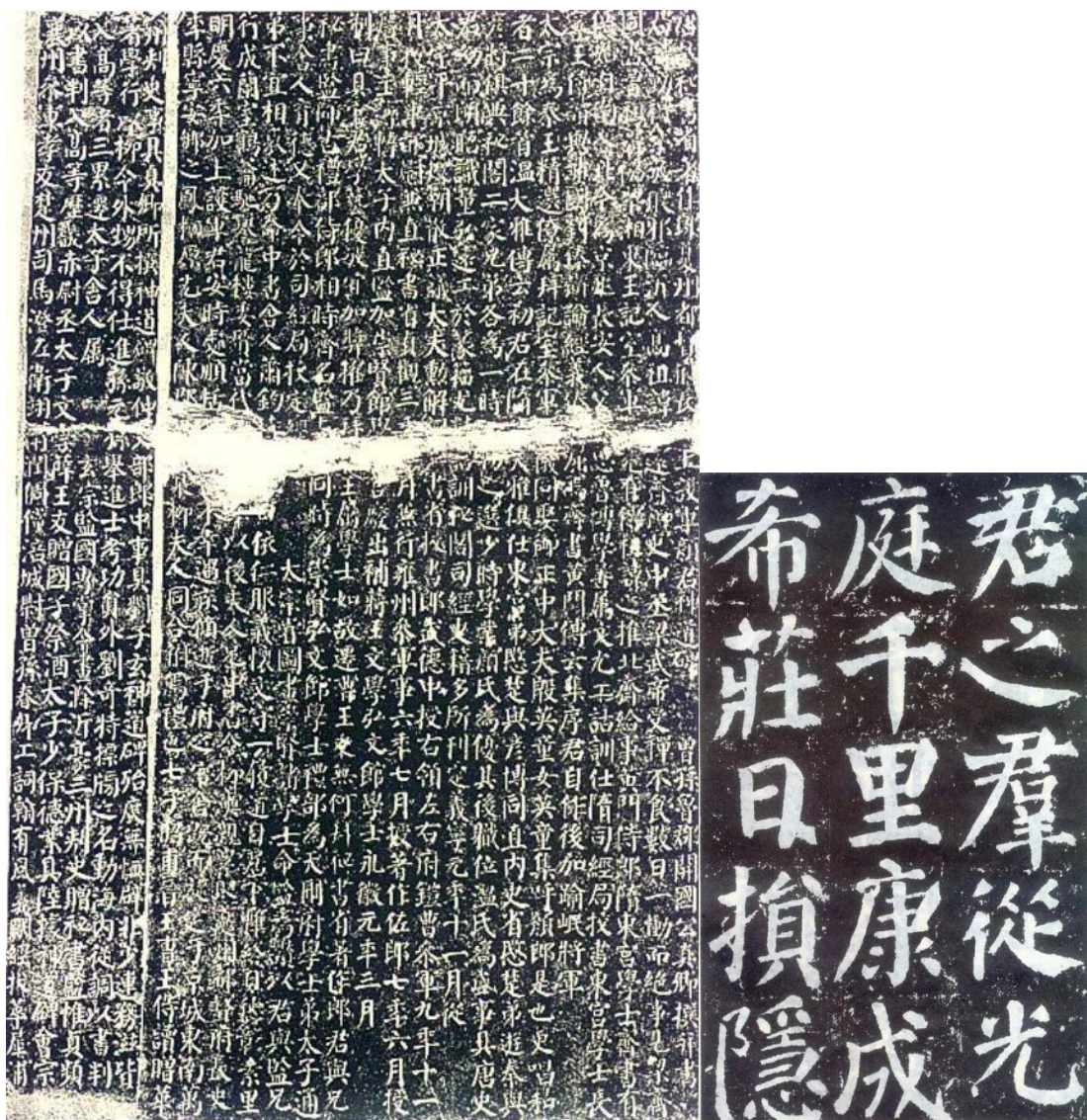
#### 赏析：

此碑有“天下第一楷书”之称，是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又一力作。史书记载：颜真卿游览南城县麻姑山一座古坛时，在土壤里中发现螺蚌壳化石，于是有感而发，以作《抚州南城麻姑山仙坛记》（一为记叙，一为当时心情之写照）。碑文行文庄重严厉、雄浑娟秀，深受历代书法家的推崇。欧阳修评曰：“碑文俊秀雄浑，运笔精悍，笔画强劲有力”从碑文可以看到：中锋运行，圆转藏锋，犹如印泥版

字体：直画成蓄势弓弩之形，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方法，形成蚕头燕尾；钩末、捺末则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直钩、平钩、斜钩，加强了腕力，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捺笔则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折笔以“折钗股”拟之，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结体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布白上则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逸。总之，颜公在这个时期（50岁后至65岁）创作的“颜体”形神兼具且走向成熟。这个阶段，他在接二连三的经历了人生况味之后，拓展了心灵的空间，并将所有情感寄托于书法，终有成就。表现在作品上则是走出之前的楷书窠臼：变法出新意，雄魂妖娆铸“颜体”！

### 颜体楷书境界第三重：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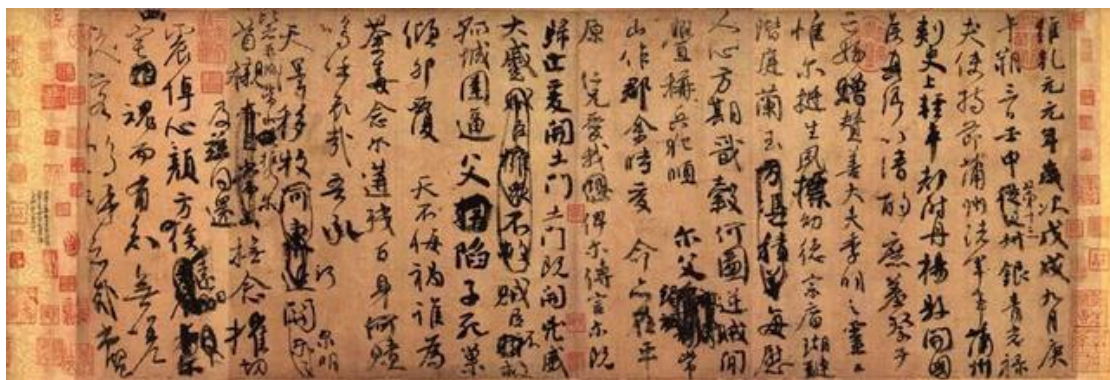
#### 4. 《颜勤礼碑》（整体与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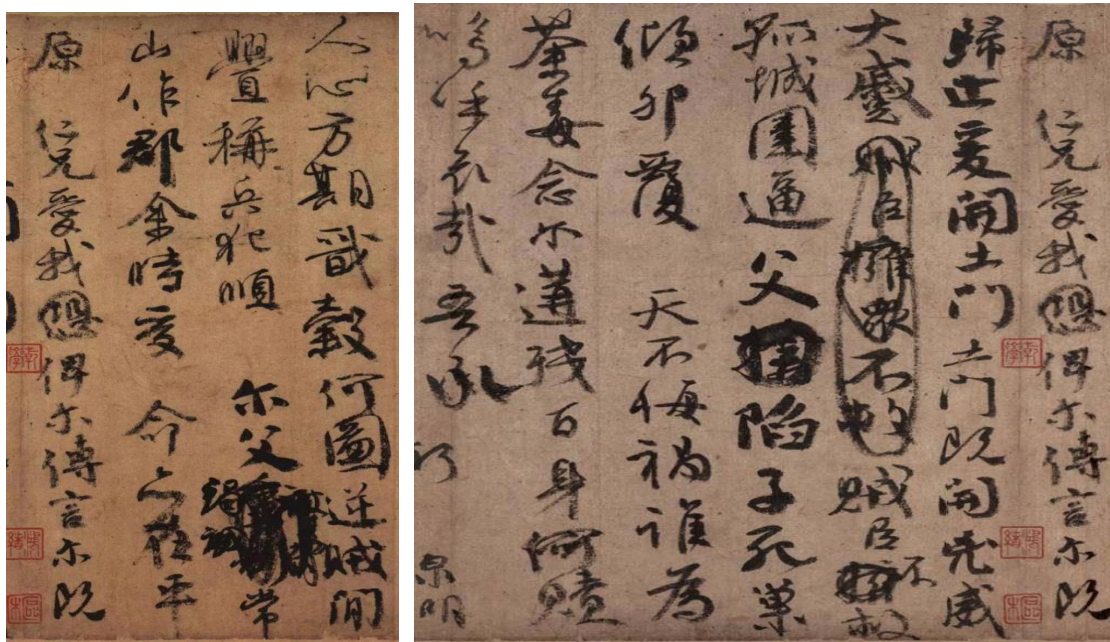


## 赏析：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在 73 岁时为他的曾祖父颜勤礼所作的神道碑（即墓碑），全称为《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护军颜君神道碑》。碑文内容主要是记录颜氏祖辈们所做的生前功德及颜家后世子孙的丰功伟绩，这副碑文现在已被定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此碑文用笔以“逆入平出”的圆笔法为主，注重园转；笔划则以筋力取胜：点画力度很强，犹如坠石；横画、起笔、收笔较重，中间运笔略轻，但很劲健；竖画颇有待发之感，粗壮有力，左右竖的处理左细右粗略呈外拱的弧状；撇画，力到锋尖；捺画形似弯刀，中部下弧；钩画状似“鹅头”；折画颇似隶法，多用转法，有的换笔分开。结构或豁达端庄，正面示人；或宽博大方，雍容华茂；或以拙为巧，平中求变，多呈外拓式特征。整体看，气势磅礴，雄迈清整，富有“雄”“健”“秀”的特征，颇具大唐帝国繁荣时期的强盛气势，称得上颜体楷书的代表作。颜真卿晚年的书学境界，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他在对生命与书艺的反省中得到悟彻，其作品犹如老栢枯林，却含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枝争发之感。其他如《颜家庙碑》《李玄靖》等碑刻亦然：老辣中蕴新鲜活泼之生机，疏淡中显质朴茂密之风韵，笔锋得意处彰功力之炉火纯青，圆润丰腴中露气度之豪迈恢宏！

### 5. 行书——《祭侄文稿》（整体与局部）





### 赏析：

楷书巨匠颜真卿在行书方面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以这篇《祭侄文稿》为例：整体看，通篇字形飞动，透奇特灵秀；墨色变化，展万端风情。用笔以中锋为主，兼用侧锋（突出表现是在撇和捺时侧以取妍，控制恰当）。行书线条浑厚又遒韧，造型奇崛又飘逸，可以说如流金泻地，别开新境。其最妙处却是字的点画密聚，草成一个块面之处，而其枯笔又连擦写数字之处。两种现象交相映衬，却成就了虚实、轻重、黑白之间的节奏变化，加之草稿特有的用笔“不拘小节”和结体的偏于松散（应为情绪愤激所至），恰恰形成了颜体稿书独特的风格。

此稿是颜真卿行草书的代表作。当时的颜公年值半百，他目睹正值青春的颜季明为了大唐江山英勇赴难，一时痛不欲生，和着血和泪，写就此文稿。草稿前六行，结体端正，运笔较慢，说明此时虽激动，但理智尚存；第七行至十三行，回顾侄儿年幼品性和反安史之乱初期情形，感情渐激，字形显随便，运笔速度加快，已不计工拙；十四行至二十五行更是结体潦草，笔画极为随便，竟至最后仅五行四十来个字就有六七处涂改，这是作者悲痛至深思路不连贯的情感通过笔画所显示的痕迹！这是忠义之情和优美的书法因熟练的笔墨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的见证！此帖也因而被后世书法界赞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成为高山仰止的存在。

## 参考资料：

- [1] 南北朝 颜之推《颜氏家训》桑楚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9
- [2] 清 郑元庆撰《石柱记笺释》卷一、卷二、卷三（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3] 《颜真卿》（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籍）
- [4] 《颜真卿》（权海帆所著的历史人物传记）
- [5]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第 1565 页。1995 年 6 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 [6] 黄本骥《颜鲁公著韵海镜源始末考》，见《颜真卿集》卷五、卷十六、卷十九。清《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据三长物斋丛书本校刊。
- [7] 唐姚思廉撰《陈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三十，第 494—496 页。中华书局 1972 年出版发行。
- [8] 《乾坤正气集》——潘氏袁江节署（古籍影印社）
- [9] 颜真卿疏《论百官论事疏》，见《颜真卿集》卷二第十一页。清《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据三长物斋丛书本校刊。
- [10] 黄勤堂．哲理诗选析：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年：42
- [11] 宋厚泽．唐诗三百首 精读·故事 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328
- [12] 王福．唐诗三百首 彩图注音版：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 年：140-141
- [13] 严杰．颜真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5 年：321-
- [14] 杨道诚，韩清显．中国诗词名篇类编赏析：修身养德：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 年：11
- [15] 百度资料：
  - 百度百科-颜真卿
  - 德州市历史文化名人（19）——颜真卿
  - 隋唐时期的德州名人——颜真卿——梁国楹 《德州历代名人》摘录
  - 平原郡太守（德州市历史文化名人（19）——颜真卿）
  - 文化名人与德州：德州名宦颜真卿

# 李之仪

## 一、生平简介

李之仪(1048~1127)北宋词人。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汉族，祖籍沧州无棣（今山东庆云县）。他是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李之仪早年师从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官至原州(今属甘肃)通判。他一生官职并不显赫，但他与苏轼的文缘友情却流传至今。著有《姑溪词》一卷、《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和《姑溪题跋》二卷。其《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一首为后世称道并广为传诵。

### 年少意气风发

北宋时期，宋太祖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以避免唐末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于是便着力改善科举制度，以吸引士人热衷科举功名，在文人阶层中掀起了读书进取的狂热之风。李之仪出身自小官吏家庭，在这种大背景下，自然也受到影响，怀揣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

庆历八年（1048），李之仪出生在楚州山阳，十岁就被送入学宫读书。少年李之仪聪颖过人，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稍长，他拜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为师，深得范纯仁的厚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其为人处世也受到范纯仁的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勤学苦读，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李之仪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四岁，可谓少年得志。从他十岁入“学宫”到进士及第这段时间，他一直抱有积极用世的心态。在《回贺新及第》中，他写道：“才当数面，笔扫千军。早岁飞声，头角已竦于同队；青春射策，文章果中于甲科”（卷十三）虽是赞美对方的才气，但亦可看作是李之仪的“夫子自道”，意气风发之态跃然纸上。

李之仪登第后游宦四方，积极寻求用世。他先后在四明做僚属，在开封、万全做县令。元丰四年（1081），他主动请缨从军鄜延，入折可适幕府，“元丰中，之仪在鄜延幕下，亲睹诏旨，观先帝所以规画必取之意，可谓深矣”（《折可适墓志铭》，《后集》卷二十）。在折可适幕下，李之仪主管驻军文字事宜，颇受知遇。随军三年，与折可适出生入死，结为生死之交。后来，李之仪也多次提及在鄜延的生活。正是这段“铁马冰河”的从军经历为他赢得了一次出使机会。元丰六年

(1083),高丽王卒,杨景略为祭奠使,辟李之仪为书状官,出使高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一载:“元丰六年十二月,上批:祭奠高丽国使杨景略等奏辟李之仪书状官,闻之仪虽谙达吏方,随器可使,然文章之称,不著士论。缘高丽俗喜文,中夏词格乃彼所视效,宜得问学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称兹选。可诏赴中书试拟用书状进呈,吊慰潘辟官准此。”从中可以看出,他“谙达吏方”,很有政治头脑。出使途中,路过山东长清县孝堂山汉石祠时,李之仪曾题字于石祠的石柱上,大字楷书,共五行,现刻字尚存,这是他在山东留下的仅有的遗迹。元祐二年(1087)李之仪被从边疆调回京城暂任翰林学士带知制诰。此后担任枢密院编修官近十年。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李之仪始终怀着一颗用世之心,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职,也曾得到上司和统治者的一些肯定,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 中年仕途坎坷

当时的北宋政坛,“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之后,与高度封建集权相伴而生的政治腐败、军事无力和财政困难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造成了士大夫阶层无休止的党争,且愈演愈烈。熙宁九年王安石二度罢相之后,新旧党争完全演变成了一种恶劣的权力之争、门户之斗,如苏轼所遭受的“乌台诗案”正是如此。这一切让李之仪灰心丧气,能给他带来心灵慰藉的就是与友人的交游唱和了。这一时期,早已与苏轼互通书问,已经踏进“苏门”的李之仪,越来越被文艺所吸引,也越来越多地将心思用在文艺上,醉心于诗文创作,开始追求儒家所说的“立言”之不朽了。

元祐八年(1093),苏轼帅中山(今河北定州),李之仪经苏轼引荐随其赴定州辅佐,那一年他四十六岁。在定州的日子可以说是李之仪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了,他与苏轼在处理政务之余,流连诗酒,击节起舞,作画题咏,尽情酬唱,更多地醉心于文艺之中,而有“苏李同时”之称。

好景不长,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被贬岭南。五月,李之仪从定州回到京师,继续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绍圣四年(1097),他被任命为原州(今宁夏固原)通判,虽仅为从八品,但“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第3947页),可见职位还是很重要的。此时李之仪

已年届半百，少年时的满腔豪气早已荡然无存了，心态开始转向思考、探索人生的意义。在这种心态下，他在原州的日子百无聊赖。

这样闲散的生活维持了不久，命运便再一次把他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绍圣四年（1097）九月，李之仪任上入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一记载：“绍圣四年九月，刑部言……勘官通判朝请郎李之仪，根勘鹵莽，李之仪特差替。”此案是由折可适擅自派人追敌（当时规定追敌不能超过一百里），致使伤亡一百三十三人引起的，折可适与有关将领被降职。而作为勘官的李之仪，因“根勘鹵莽”也连坐。李之仪这样做并不是因折可适是昔日的上司而询私，而是因为他比较了解此案的前因后果。原来，折可适派先锋追敌前，曾征得统制官王文振的同意和许可，但待追兵入坑谷迷失道路而有伤亡后，王文振为保全自己而先发制人，弹劾折可适，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诿得一干二净（此事详见《折公墓志铭》，《姑溪居士文集·后集》卷二十）。李之仪见其中有冤情，于公于私都是要仗理直言的，便没有按照朝廷的意旨去审讯，因而被认为是“根勘鹵莽”。

元符元年（1098），李之仪时年五十二岁，从原州又回到了京城，任“监内香药库”，是去年九月出狱之后，即所谓“诏特差替”者。但随后的第二年，朝廷加大了对元佑党人的打压力度，苏轼及其门人都在劫难逃，李之仪也受到了株连。六月，因苏轼出守定州时，曾荐辟李之仪辅佐，李之仪以“为奸臣心腹之党”的罪名被放罢。这是李之仪第一次被贬，不过，他并没有被外放，只是被罢官。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徽宗想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被下放岭南的元祐大臣们陆续被赦北归，范纯仁及苏轼兄弟亦在其内。此时李之仪在颖昌（今河南许昌）为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之仪被召入京，除被任命为提举河东常平外，又兼任了“转漕河东”。经历了仕途挫折和生活磨难的考验之后，李之仪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时，范纯仁病重，自知不久于世，就把弟子李之仪叫到病榻前，由自己口授仪表（官员上奏朝廷的最后政治遗言），让李之仪笔录。就在这一年，范纯仁去世。李之仪怀着敬重之情，整理范纯仁遗表，又起草了行状（传记），详细介绍了范纯仁生前行迹及其功德，这也为日后再度被贬埋下了祸根。也是在这一年的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轼因病逝世，这对李之仪又是一个沉重打击。李之仪与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结交以后，便书信往来不绝。自

定州别后，李之仪一直渴望能再与苏轼相聚，谁知等到的确是苏轼离世的噩耗，悲痛之情可想而知。

崇宁元年（1102年），形势急转而下，打着新法幌子起家的奸臣蔡京擢升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主持朝政，极欲挟私报复元祐党人。这年六月，李之仪接到了要他回京的诏书，便匆匆赶往京师。谁知一入京门，便被逮进了御史狱，皆因他为范纯仁整理的仪表和行状所致。奸臣蔡京发现遗表中有“惟宣仁（指高太后）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顾。臣所惜者陛下上圣之姿，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业”等反对新法之语，十分恼怒，加之平素与范纯仁的儿子知谏院范正平多有仇隙，便趁机想借这个由头加罪于范正平。率性耿直的李之仪挺身而出，承认表文是自己代写的，与范正平无关，于是被下狱，遭到酷刑拷打，面临杀头灭顶之灾。幸亏李之仪的妻子胡文柔冒着生命危险，买通门卫，潜入范家，盗取范纯仁行状原稿，挺身上朝为李之仪申诉，李之仪才得以免除死罪，再加上家人的上下打点，李之仪被革职流放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这是他第二次被贬官。

就这样，李之仪举家来到了当涂，这一年黄庭坚领太平州事，亦至当涂。李、黄二人为旧相识，共师苏轼，此时他乡遇故知，是二人宦海风波浮沉中最值得欣慰的一件事。二人同在当涂花园石洞听歌伎杨姝弹《履霜操》，这也是李之仪与杨姝的初遇（后期续娶杨姝为妻）。相逢后不久黄庭坚就调离了太平州，李之仪倍感孤寂，却没想到更大的悲苦在等着他。在当涂的第三年，因水土不服，李之仪一家人染病，爱妻，儿女，相继离世，李之仪痛不欲生。人到中年，丧妻丧子，癯瘠遍体，心死身病，李之仪就这样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命运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灰意冷，因其家临姑熟溪，便自号“姑溪居士”，埋首书卷，醉心禅学，一心一意做个方外之士。他还置办田产，亲自耕种，“踪迹出入，多在邻邑，或在田亩间”（《与龚平国手简》，卷二十三），希望用努力的劳作来抚平心灵创伤。

### 晚年生活凄苦

正当李之仪安心做“姑溪老农”时，朝廷却又给了他一线从政的希望。崇宁五年（1106，五十九岁），李之仪复了官，并娶当涂歌伎杨姝为妻，育有儿女三人，其长子李尧光也得到荫封，李之仪准备安享晚年。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隔不久，李之仪因一句无心之语，惹恼了心胸狭窄的文友郭祥正。郭祥正素知李之仪与蔡京有过节，为了报复，便指使他人上京城

告状，说李之仪假冒得子以骗取荫封。在宋代，士大夫是不能与歌伎结婚的。也就是说，李之仪与杨姝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那么这个孩子是谁的，就说不清了。蔡京正愁找不到李之仪的把柄，这下好了，于是李之仪长子的荫封被取消，“令随母”，李之仪的家庭被活活拆散了。这还不算，李之仪因此事被再次除名，杨姝也被施以杖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九载：“（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管勾成都府玉局观李之仪除名勒停”。此事给了李之仪很大的冲击，如果说前两次贬官仅是让他对仕途绝望的话，那么这次就让他对人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对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怀疑。

李之仪有才华有抱负，可险恶的政治风浪使他仕途坎坷、屡遭贬谪，饱尝了比苏门其他文人更多的世态炎凉和人生忧患。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李之仪病卒，杨姝遵其遗愿，将其安葬在当涂藏云山脚，与前妻胡淑修葬在一起。自此，李之仪在当涂度过了他颇为凄苦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晚年。

## 二、主要成就

李之仪是北宋末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也是苏门文士之一。他既善诗词又能属文，更善工尺，在当时小有名气。著有《姑溪居士文集》七十卷传世，词存集中，单行本称《姑溪词》。《姑溪词》在当时及后代都广为流传，尤其是那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至今仍脍炙人口。他的诗文也颇为人们所推崇，如苏轼读其诗后称赞道“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sup>1</sup>其尺牍亦被苏轼称为“入刀笔三昧”<sup>2</sup>，明毛晋曾编《姑溪题跋》单行；清王士禛也说“其题跋自是胜场”<sup>3</sup>；《四库全书总目·姑溪居士文集提要》称“今观集中诸诗，虽魄力雄厚不足敌轼，然大抵轩豁磊落，实无郊、岛钩棘艰苦之状。”<sup>4</sup>由此可见，李之仪在文学方面还是很有建树的。

### 词、文创作理论

李之仪擅长作词，前人称其“多次韵”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毛晋《姑溪词跋》）。《姑溪词》收录其词作 94 首。从题材上看，李之仪的词作主要

<sup>1</sup> 宋·苏轼：《苏轼诗集》卷三十《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616 页。

<sup>2</sup>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四四《李之纯传》附《李之仪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0941 页

<sup>3</sup>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6 页

<sup>4</sup>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五，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336 页。

集中在爱情方面。他的爱情词共 60 余首，约占全词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有一些节序、咏物、纪游之作。李之仪的词作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在清新、委婉之余含有豪旷之意，独具一格。

《姑溪词》的代表作是《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仪以尺牍擅名，而其词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蒨，殆不减秦观”。李之仪对诗、词、文创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虽出苏门，却在苏轼“词自是一家”的论调外，独立提出“(词)自有一种风格”的论断，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先声。

在李清照《词论》之前，李之仪已经提出相对成熟的词学理论。其在《跋吴思道小词》中提到的几个关键的词学理论有：“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言有尽而意无穷。开头一句“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打破了世俗认为词是俗作、余力游戏的看法。词的字数比诗歌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然而铺排过度，容易词不达意和音律不协。李之仪介绍了词的发展，因声填词，词很讲究音律和谐，为了避免郑卫之风，用字求雅，忌过分缠绵失了词格，恐表露过直，有失词境。即使是柳永，也不免落下“韵终不胜”的弊病。

李之仪提出词“自有一种风格”，重视词与诗歌的区别，强调词的独立性。在李之仪之前，苏轼曾经提出诗词“自是一家”的说法。词的发展与青楼乐坊、勾栏瓦舍密切相关，且前期的词作大多写缠绵闺情，艳俗露骨，为人诟病，很难在士大夫群体中得到认同。苏轼提出诗词“自是一家”，以此提高词的地位。而李之仪提出词“自有一种风格”，是为宋词求得独立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尔后，李清照在此基础上提出“别是一家”论。

宋词重视境界，李之仪所谓的“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关于语言与意境的关系，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有更为玄妙的解释：“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sup>5</sup>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皆无迹可寻，如同蕴含在诗词中的情意，意不会随笔止而断，情不会因字满而终。

除了词论，李之仪对如何作文章也有独到见解：文章要当先凌厉而后收敛，正如坐而后立，立而后走也。岂遂以得坐立间者，便期于行走。（《跋吴思道诗》）

<sup>5</sup> [宋]严羽著；张健校笺。沧浪诗话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7。

作字为文。初必谨严于时。造语须有所出，行笔须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辙迹，则为可喜。久之，语以不蹈袭为工，字则从横皆中程度。故能名家传世，自成标准。（《跋荆公所书药方后》，《前集》卷四十一）

李之仪认为作文如坐、立、走，有一定的过程。学写文章要踏实，不可一蹴而就。作文如做人，从凌厉到收敛，将毕露的锋芒转化为沉稳内敛。初学者可模仿前辈，学习的态度要严谨端正，但不能贪图近利，行抄袭之事。名家有自己的风格，别人学不来，因此要想名作传世，就需要造就自己的独特韵致。这些观点为文章创作提供了可参照的范式，对后人的创作具有启发性的指导意义。

此外，李之仪很讲究用字的来历：

（吴思道）其妙处略无斧凿，而字字皆有来历。（《跋吴思道诗》）

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跋吴思道小词》）

造语须有所出，行笔须有所自。（《跋荆公所书药方后》）

叙事有法度，殆无一字虚设。（《跋古帖》）

李之仪讲求“字字皆有来历”，与黄庭坚主张“无一字无来历”基本上是一致的。字字有来历，在诗、词、文的创作中表现为引经据典，用典是将俗词推向雅化的手段之一。

### 书法赏鉴

李之仪的行书造诣很高，其《汴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苏轼以“入刀笔三昧”评其书法，赞其“才高识明”。在《姑溪居士全集》中，有五卷题跋多论及书法，除此之外，其书法思想还散见于文集其他地方的杂记、论书诗中，可以说李之仪的书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北宋时期的书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李之仪题跋的书法评点很重视神遇心意、“骨肉”关系和精神法度。

谈书法免不了“形神之辩论”，但无论是“形神兼备”，或是“离形神似”，独不缺“神”。“神”不可言喻，汇聚于笔锋之下，造就别具一家之韵，而这种神韵可遇不可求。书法很讲究神遇，“神遇”大概是指在艺术表现形式之外，追求心神与笔墨相通，以表达精神层面的诉求。

李之仪认为“神遇”不能刻意为之，否则有斧凿气。如若有意为之，手为心所控，愈是求而不得。如赌注越大，内心的压力便越大。心压千斤石，笔有千斤

重，不得挥毫意气。只有“未尝经意”，继而“不以力致”，心手两忘，终得“神遇”。此外，在求“神遇”之前必须练好本领，如庖丁解牛，胸中有沟壑，唯熟练尔。优秀的书法家都经过刻苦的训练，没有天生就能执笔龙蛇，如王羲之练字的墨池，怀素书蕉等。

除了“神遇”，李之仪很重视“骨肉筋”的关系。

相传卫夫人所作的《笔阵图》中谈到“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sup>6</sup>书法要妙在骨与筋。古人认为优秀的书法作品必须包含筋、肉、骨、气，这是筋骨老健、风神洒落的关键。在此，“筋”，应指字的余韵，“笔绝而不断”；“肉”是字的结构和形态；“骨”是字的走势与力度；“气”是字的精气，亦是书法家的风格。

李之仪认为肉不胜骨，骨不胜筋。但并不是全然无肉为好，骨肉相称为“尽善”。当世之人不懂书法者谓王安石书瘦，李之仪评荆公“清劲”，评“怀素字颇肉多”。李之仪将书法的“骨肉”关系与书法的精神相联系，“书以精神为主……要知骨肉俱无，安可语精神邪。”（《跋怀素帖》）

李之仪的题跋不仅评字，还为后人练字提供了一定的法则：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发，然后为尽。（《跋麻姑坛记》）

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或谓作字正如习马，步骤驰骋，各有先后。一失其节，御者所愧。至其奔轶绝尘，则乃能见其材。（《跋储子椿藏书帖》）

学书主于行笔，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驰。虽规摹前人点画，不离法度。要亦气韵各有所在，略不系其工拙也。（《跋君谟荔枝》）

李之仪认为练字讲求循序渐进，有法度可寻。先学位置妥当，再练疏密得当，最后练精神。如果急功近利，失其法度，便会步入歪途，难成大器。学书可规摹前人笔画，但不可过于拘泥，以免陷蹈袭之弊，重在点铁成金，自成一家，以独特气韵名重当世。

### 三、“德能”思想

李之仪所处的年代，正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导致新旧党争严重的

---

<sup>6</sup> 于安澜。书学名著选[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

时期。就绍圣元年(1094)后，新党重新执政，苏轼遭到一贬再贬的厄运，那些曾经以结交苏轼为荣的文士大夫纷纷忙着洗刷与他的关系，正如赵鼎臣所说：“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卷二十）他们种种可耻行为，在李之仪眼里，正如“站在最高山上的人”，“笑看着戏台上生命里的一切真假悲剧”。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不过是封建皇权的附庸，面对越来越残酷的党争，李之仪发现，其用世之志能否实现绝非由其主观努力所能决定。既然最高统治者重用新党实行“绍述”，他惟有倒向新党，政治上才可能有所转机。然而，他能背弃道义、良心和师友的情谊吗？

先是从原州转官“监内香药库”，后又因是苏轼心腹而遭弹劾罢官，面对仕途上的明枪暗箭，李之仪越来越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感到新旧党争不可理喻！他写道：“使德裕不以前日为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书牛李事》卷十七）这表面上是在评论历史，实是对新旧党争的感叹。他在诗中无可奈何地说：“白首何堪堕牛李！”（《次韵王性之见寄佳句》，《后集》卷二）。当他因给范纯仁草遗表、行状并力图承担因之而起的所有罪责而差点送命时，他在狱中开始反复扪心自问：人生究竟有何意义？

经过一番深刻而痛苦的思考，他最终决定坚守的人生意义有两个：一个是“名节不朽”，也因此令他产生了克服谪居生活中种种磨难的无穷力量；另一个是“文字不朽”，这成就了他大量的优秀诗词和一系列独具慧眼的诗词评论，而且通过这种文化活动，不断为其多难的心灵注入源头活水，使其充满生的希望。

### 操守高洁 坚守“名节不朽”

李之仪坚守“名节不朽”乃是儒家追求的“三立”之“立德”。他与宋代士风有关，“宋代士人有鉴于五代士风之萎顿，又适逢宋代君主极重文教之国策，于是一反五代之风，大力倡导自尊自贵，自我砥砺的人格精神。”<sup>7</sup>其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他作为苏轼、范纯仁的门生，长期受到其师伟大人格的濡染，自然拥有了这种重名节，重人格的精神追求。这种人生态度更是他在苦难中自觉选择的结果，因此产生了无穷力量。它首先表现在始终追随苏轼，永不背弃“苏门”的行为上。

李之仪与苏轼兄弟交从甚厚。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文采盖世，为官清

<sup>7</sup> 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

廉有节，文朋宦友比比皆是。李之仪与苏轼早有文字交，可谓文人惺惺相惜。

苏轼年长之仪一岁。嘉佑六年（1061年）经欧阳修推荐，应中制科第三等，被任命为大理平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还朝任职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他强调改革吏治，反对骤变，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因意见未被采纳，又受排挤，遂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1071年）起，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处，查民情，修水利，建书院，惩奸吏，多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苏轼诗句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使其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狱。5个月后被贬黄州为团练副使。李之仪为苏轼的遭遇鸣不平，他联络一些宦官和知名人士在朝中活动，以图苏轼早返京师。苏轼为此心情十分激动，写了《答李端叔书》，直抒胸臆，对李之仪为人为文非常感佩。

1093年，宋哲宗亲政，苏轼出任定州。他奏请朝廷让李之仪作为自己的助手，担任定州签判。当时，满朝文武怕受牵连，都不敢跟随苏轼，李之仪却不加顾虑，欣然从命。到定州任上，李之仪协助苏轼整顿军纪，申饬法度，明令规制。经过半年的治理，定州军政焕然一新，民众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元符二年（1099年），李之仪回京，调任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说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职京官。皇帝听信谗言，遂下诏停职。虽受苏轼牵连，官运多舛，但李之仪心胸坦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相反，他对亦师亦友的苏轼非常想念，常常作词赋诗，以解心中之苦闷。

我们举其政和元年（1116）近70岁时所做《再领玉局。昔东坡翰林作诗送戴蒙，有“玉局他年第几人”之句，后自岭外归，遂领玉局。予复官，亦得之。坡今亡矣，怅然有怀》为证：“东坡因地夙相亲，玉局终为继戴人。禄仕岂知承末轨，恩光又许袭前程。青蝇附骥元非援，白玉无瑕晚更真。泉下有灵应首肯，不随凡劣易缙磷。”<sup>8</sup>（卷四）此时苏轼已逝世十五年，而长长的诗题所包涵的感情正流露出他的无限缅怀。整首诗都在表达对苏轼的敬爱，表明自己操守不变，晚节白玉无瑕。再结合同时稍晚的赵鼎臣“始终不负公者，盖不过三数人。”<sup>9</sup>（《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卷二十）的评价和南宋人孙绍远、折中古对他尊敬的态度，我们可以断定他对苏轼的确是忠贞不渝的。苏轼早就成了他的精神偶像，背

<sup>8</sup> 引自《姑溪居士全集》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sup>9</sup>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叛苏轼，其人生将变得毫无意义。

李之仪坚守“名节不朽”还表现在克服编管当涂的种种苦难上。其《与祝提举无党》写道：“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丧子妇，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脱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继见舍。第四年初，则癖疮被体，已而寒疾为苦。……于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间不容发，”<sup>10</sup>（卷二十一）面对这样残酷的政治迫害，尽管他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炼狱，但他依旧直面人生。他在《与萧季文知录》中说：“比承当路，成不相容，不敢仰叩自此者。遂知朝论，取直公理，终不能屈。果有是证，君子不苟避。”（卷十九）这种“不苟避”的心态正是一种直面人生、追求高尚的心境。其《与孙肖之》云：“目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间。不能排遣，则追咏早日与前辈从容时，资以自浣，况真得前辈之风轨邪。”（卷二十九）“寒灰枯木”的谪居生活的确难以排遣，因为“穷荒衰陋，无闻见，无商榷、无图籍可考”（《与赵仲强兄弟》卷二十五），而他追求的是“前辈之风轨”，即崇高的人格。因此，他自信地说：“冰雪不渝，更期晚节”（《与吴禹功主簿》卷三十）。他在《与何给事》中自我评价道：“虽粗领风味，独未得于利害之途。盘旋多事之际，心固疑之。……盖德度之接，无不至于至诚。”（卷十九）“至诚”正是其心境的内核。

### 坚守“文字不朽”

李之仪坚守“文字不朽”主要体现在此期他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章。他对人生的悲观感一天天增强着，唯一能给予他快乐，让他感到人生有意义的便是艺术创造。艺术创造给予他那颗受着巨大煎熬的心以最大慰藉。他在人生中后期悲观心态主导下经历的崇高体验、孤独体验和超越体验，化迹为诗词文章，从而形成其现存文学作品的主体。

## 五、作品赏析

###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sup>[1]</sup>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sup>[2]</sup>，此恨何时已<sup>[3]</sup>。只愿君心似我心，定<sup>[4]</sup>不负相思<sup>[5]</sup>意。

<sup>10</sup> 本页文中所引李之仪诗、词、文只注篇名、卷次，均引自《姑溪居士全集》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后

## 注释

[1]选自《姑溪词》

[2]休：停止。

[3]已：完结。停止。

[4]定：此处为衬字。

[5]思：想念，思念。

## 译文

我居住在长江上游，你居住在长江下游。天天想念你却见不到你，共同喝着长江的水。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只希望你的心思像我的意念一样，就一定不会辜负这互相思念的心意。

## 创作背景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仕途不顺的李之仪被贬到太平州。祸不单行，女儿、儿子及与他相濡以沫四十年的夫人胡淑修相继去世。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家人连遭不幸，李之仪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这时一位年轻貌美的奇女子出现了，就是当地绝色歌伎杨姝。杨姝是个很有正义感的歌伎。早年，黄庭坚被贬到当涂做太守，杨姝只有十三岁，就为黄庭坚的遭遇抱不平，她弹了一首古曲《履霜操》。

《履霜操》的本意是伯奇被后母所谗而被逐，最后投河而死。杨姝与李之仪偶遇，又弹起这首《履霜操》，正触动李之仪心中的痛处，李之仪对杨姝一见倾心，把她当知音，接连写下几首听她弹琴的诗词。这年秋天，李之仪携杨姝来到长江边，面对知冷知热的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 赏析

李之仪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话，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净化了的通俗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开头两句，“我”“君”相对，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可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寓着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阁中翘首

思念的形象在江山万里的悠广背景下跃然显现。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联起来吟诵，便觉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它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仍紧扣长江水，承上“思君不见”进一步抒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祈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销歇之时。此词以祈望恨之能已反透恨之不能已，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我心”是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相通。这样一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为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心灵上便得到了永久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江头江尾的遥隔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在的感受。

作者用江水之悠悠不断，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己之钟情期望对方，真挚恋情，倾口而出。全词以长江水为抒情线索，语言明白如话，句式复叠回环，感情深沉真挚，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体现出灵秀隽永的风神。

#### 参考文献:

1.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2.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3.唐圭璋：《宋词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4.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5.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版。
- 6.曾枣庄：《李之仪年谱》，《宋代文化研究》第四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7.孙超.《李之仪心灵世界探微》.《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 8.史月梅：《李之仪生平与诗文研究》，郑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 邢侗

## 一、生平简介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自号啖面生、方山道民，晚号来禽济源山主，世人尊称来禽夫子。山东省临邑县万柳村(今临邑镇邢柳行村)人，明代诗文家、书法家，明万历二年进士，官至陕西太仆寺少卿。他一生为官清廉，为民兴利除害，深为百姓所爱戴；他在诗文、绘画、书法方面皆有造诣，尤工书法。辞官回乡后，他乐善好施，苦练书法，造诣颇深，与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合称“晚明四大家”，有“南董北邢”之誉。

### (一) 主要经历

邢侗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出生在临邑县万柳村(今临邑镇邢柳行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邢如约乐善好施，被当地老百姓尊称“邢佛”，被皇帝敕为“佛子”。邢如约四十岁得子，甚是高兴，实现了绵延子嗣的心意，给儿子取名邢侗，字子愿。

邢侗天资聪颖，自幼酷好书法，且勤奋刻苦。他七岁能写擘窠大书，字体龙飞凤舞、剑拔弩张、气势生动。后来，他又临摹研习各家作品，十三岁时作雅宜(王宠)楷书。他写的正楷疏拓秀媚，当时的济南府督学邹善看到邢侗的楷书，夸赞到：“此儿书法有前辈风，是天下才也!”。十四岁的邢侗已经读遍家中所有藏书。

十七岁，邢侗因其才华被济南府督学邹善召至济南泺源书院读书。而且这位邹督学还亲自为他举加冠礼仪式。这在当时传为齐中美谈。十八岁的邢侗又应诏进入北京太学院读书。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邢侗与自己的叔伯兄弟邢遵道一起赴京赶考，双双名落孙山。回到家乡后，更加刻苦读书。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邢侗再次与邢遵道进京赶考。这一次，邢遵道落榜，邢侗考中进士。在皇帝听政的大殿上面试时，他引用沈度、王宠、赵子昂的文章数千句，一字不错。主考官于慎行慨叹：“子天下才，徐淮以北固无此。”后来，于慎行将邢侗收为弟子，两人交好一生，于慎行去世后，邢侗亲自为他料理后事。

万历三年（公元 1575 年），邢侗任南宫（即河北省南宫县）知县。在任五年，邢侗积极作为，清廉勤政。他兴修学校，新建文昌阁，开辟玉带街。他还定期亲自为南宫读书人授课；采取相应的措施奖励仁行善举；废除陋习，提倡良好的风俗习惯；劝导百姓积极开荒，发展农业。在此期间，邢侗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被敬称为“邢父”。

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邢侗擢升监察御史。当邢侗离开南宫县时，南宫县人民挥泪送行，第二年自发集资为其修建“廉公祠”。

万历十一年（1583）奉旨巡察三吴（今苏州、常州、湖州一带），除掉张帮陵海盗团伙。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升任陕西太仆寺少卿，官至四品。同年 5 月辞官归乡，时年 36 岁。归乡后，邢侗筑“来禽馆”，置身其中，攻读习书二十六年。

邢侗归隐后，朝中按院和抚院数十次推荐他回朝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1612 年，因病辞世。

（“来禽馆”：1586 年（明万历十四年），三十六岁的邢侗回到故里，买下临邑城东南隅荒地，修了一个占地 12.6 亩地的园林，取名“泐园”。内设“泐亭、犁邱、来禽馆……”等 26 景，每景配诗记述。“泐园”是邢侗参考王世贞的“弇山园”而修建的，它因地造形，粗具木石，既简陋又别致，属于典型的苏州园林风格。由于邢侗醉心书法，仰慕王羲之草书《十七帖》，所以取《十七帖》中《来禽帖》的“来禽”两字，给自己读书处取名“来禽馆”。邢侗在馆内习书、著述、临帖三十余年，创修了《临邑县志》十六卷，著有《来禽馆集》、《邢子愿杂著》等。1600 年，他完成书法丛帖《来禽馆帖》，《来禽馆帖》显世以后，立刻名扬天下。1937 年，侵华日军占领临邑以后，占用“来禽馆”。“来禽馆”由此完全毁坏。1985 年临邑县委计划恢复“来禽馆”，1986 年正式动土修建，历经三年建成。席文天提出新建“来禽馆”与历史记载不相符，遂更名为“邢侗纪念馆”。现址在今临邑县城东北处，座落在邢侗公园正中。）

## （二）趣闻佳话

### 1. 邢公泉

明朝万历三年（1575），邢侗到南宫上任，一进南宫地界，邢侗就弃轿步行，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在路上，他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孙儿的搀扶下郁

郁前行。于是，邢侗上前问老人：在这农忙时节，为何不在家种田。老人告诉邢侗庄稼都快要干旱死了，老百姓却没有钱打井灌溉，而且当地也没有年轻的壮力打井，所以只能逃难。了解到这一民情后，邢侗赶到县衙，谢绝了当地豪绅为他准备的欢迎宴会。他让衙内所有人员早早下了班，他独自一人在县衙内苦苦思索，寻求解决干旱的办法。

上任伊始，邢侗一夜无眠。次日一早，他拟出一张告示，鼓励百姓打井抗旱，告示规定挖一眼土井者，免劳役一月；打砖井一眼者，免田赋一斗。书吏把告示抄写多份，衙役四乡张贴。为带动百姓打井，邢侗特许县衙内所有人员放假十天，回乡率先垂范，打井抗旱，不能完成任务者除名。这样一来，在百里南宫县境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井热潮。几年之间，南宫大地，水井星罗棋布，庄稼年年丰收，再无旱灾。百姓饮水思源，感激一心为民的知县邢侗，就把这些井并称为“邢公泉”。

## 2. 邢侗对对联

邢侗不但为官勤政清廉，做人也是实事求是、谦虚严谨。他辞官回乡后，有一次应邀去武定府修志。州府父母官设宴招待他，并请了几位文人学士、地方名流作陪。席间，为了活跃气氛，大家玩起了对对子的游戏。对不出的，罚酒三杯。其中有一个上联是：“三字同头左右友，三字同旁沽清酒；今日幸会左右友，聊表寸心沽清酒。”这上联的构思奇特，字句重复的自然合理，对起来确是很难。在场的人一个个被罚酒。轮到邢侗时，他对道：“三字同头骂咒哭，三字同旁狼狗狐；人间声声骂咒哭，只因道多狼狗狐。”在场的人齐声叫好，唯独一个叫马拯的年轻人坐在那里不置可否。州府大人问马拯：“子愿先生对得如何？”马拯躬身答道：“子愿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令人佩服。至于这对子嘛，不用我说，他自然心知肚明。”

邢侗微微一笑，拱手向马拯表示感谢，然后端起酒杯，诚恳地说：“我这下联，看似对的工整，其实不合章法。人家说‘三字同头’‘三字同旁’，我也完全照说，这哪叫对子，不过是又做了上联而已。”说罢，自己罚酒三杯。

邢侗的这种谦虚诚恳的态度，愈加得到众人的敬重，尤其令马拯敬佩。而这位不随波逐流的马拯，也得到了邢侗的赏识。后来经邢侗牵线，马拯与邢侗的妹妹邢慈静喜结连理。

## 二、主要成就

邢侗既是晚明的诗文学家、书法家，也是一位廉洁清正的政府官员，他一生无论在政界还是书画、诗文方面都颇有建树。

### 1. 政绩

邢侗在南宫县任知县期间，政绩显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他先后修建了学校、新建了文昌阁，开辟了玉带街，使南宫城貌焕然一新。他注重教育，亲自为当地的读书人授课。他除恶扬善，大张旗鼓地奖励有善举的人。他注重农业发展，一到任就带领当地老百姓打井灌溉，当地老百姓为了感激他，称这些井为“邢公泉”。经过五年的治理，南宫百姓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牛羊，还出了许多有名的孝子和贞洁烈妇。南宫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南宫人民为其修建“廉公祠”。

邢侗奉旨到河东（河南、山西、陕西一带）监察盐政期间，废除了为增加赋税而搜查缉拿盐贩子的做法，挽救了多人的性命。巡察三吴（苏州、湖州、常州）时，歼灭为患多年的海盗张帮陵。他监督漕运米粮，一路惩治腐败，开仓济赈，深得百姓爱戴，被皇帝誉为“梗骨之臣”。

### 2. 书法成就

邢侗在书法方面，极具天赋，7岁就能作擘窠大书，气势生动。后又遍临魏、唐、宋诸大家的作品，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临摹以钟、索、二王为主，尤其喜欢临摹王羲之的书法。他自己说：“与右军书坐卧几三十年，始克入化。”他对二王书法的临摹也是出神入化的。明周之士《游鹤堂墨藪》中记载：近代邢子愿的书法，精心研摹二王，他的笔法仿佛是《十七贴》的笔意；即便是他平时随意书写的，也多是临摹王羲之的帖，可以说是极意临摹二王的人。自宋、齐之后，书法开始衰落，邢侗是首领辟除陋习，追迹逸少的人，且不论他书法的精旨如何，仅就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则已超人一等了。

邢侗擅长行草、篆隶，以行草见长。辞官后，二十六年精心钻研书法，晚年尤精章草。他的书法在明朝名震天下，当时与董其昌并称“南董北邢”，又与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明朝四大书法家”。邢侗的书法和人品当时均被誉为第一。传世书迹有《临王羲之帖》、《论书册》、《古诗卷》、《临晋人帖》等。他的书法作品被珍藏在多国的博物馆。除北京故宫博物院外，英国、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皆存有邢侗的书迹。

### 3. 绘画成就

邢侗主要成就在书法，而非绘画。偶尔也画一些花草竹木。“偶作意写卷石、莎草、长松、修竹，游戏点缀，罗罗见其清淑，大抵仿叔明、元章笔意。”其传世作品有《仿王蒙拳石图》扇页，现藏故宫博物院；万历三十九年(1611)作《文石图》轴，绢本，水墨，纵139厘米，横52厘米，上有行书长篇题识，下署“邢侗题字七行”，现藏南京博物院(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有同样一幅，纵141厘米，横51.2厘米，似为摹本，待考)；《石菖蒲图》扇页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虽然邢侗画作不多，但是他对绘事的欣赏和理解却是独到深刻的。他为许多名画写过题跋。在这些题跋中充分体现了邢侗的绘画修养品味。如《题赵子昂墨竹》、《题沈石田画》、《题沈周花果》等。他在《题沈周花果》中写到：“画以三笔五笔得其神者佳。虽笔笔工整、敷彩浓丽，即得其妙，神亦难至。”明代的写意花鸟画，崇尚秀雅，强调“士气”、“书卷气”。“三笔五笔得其神”可以说是他在绘画上的一种独到的见解。

### 4. 诗文成就

除书画外，邢侗也兼善诗文，有大量诗文存世。他著有《来禽馆集》二十九卷，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入《四库全书》。其中诗五卷，五百余首；文二十四卷。他的五七言律诗以唐诗为宗，多学李白、杜甫、王维、岑森的风格。“高古典雅，每每工而拙用之”。而文则追汉魏风骨。邢侗的文风“沿袭六朝文风，精凿整洁，新奇充满，出入秦汉，但是无六朝人文风的‘强造不根，夸多伤烦’之病”。他晚年尤其喜好写作骈文，在当时风靡大江以北。邢侗任知南宫县令时，还主纂了《南宫县志》，万历十六年(1588)应聘纂修了《武定州志》十五卷，四册，约十万言，体例完备，论述精辟，成为名志。万历十九年(1591)，应临邑知县刘承忠聘，创修了《临邑县志》十六卷，四万字。

## 三、“德能”思想

邢侗因书法而闻名于世，因德行而备受敬重。他一生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乐善好施，他深受当时的老百姓爱戴，亦为后世所敬仰。他的这些美好的德行与其家庭教育密不可分。自其祖父邢溥起，邢氏家族就是临邑县有名的德才兼备的大户人家。其祖父、伯父以及父亲都有着美好的品格。明朝李维祯在

《邢子愿小集序》中评价：子愿世家，虽然有万贯家产，但是全家生活依然是见素抱朴。平时衣着朴素，粗茶淡饭，与邻里乡亲的生活一样。待人谦恭，极具爱心，对下人也能平等相待，不慕权贵。他的祖父邢溥两袖清风、乐善好施。邢溥任岢岚州知州时，权臣刘瑾派人搜刮民财，邢溥严词拒绝。自知惹怒刘瑾，邢溥宁肯在家静候朝廷惩罚，也不肯向老百姓摊派。当地老百姓得知后，连夜负粮送至州府而不留名。

尽管自己家境并不富裕，仍不忘救济当地的乡邻。冯时可在《犁邱邢庄惠先生祠堂碑记》中记载：先生所生活的地方，当地人没有不受其恩惠的。由于当地人民多年受到邢太公照顾，故自发筹资为邢太公修建祠堂。而他的伯父邢如默为官二十年，未存一点私房钱，他持盈以拙，保俭以勤。他看到临邑的学堂破败不堪，便带领弟弟及子侄们筹资修建学堂。当时的临邑县令感叹：“邢氏兄弟深明大义，拿出自己家的粮食为当地老百姓发放救济粮，协助我治理政事，自己出资修建学校，辅助我发展了我县的教育，临邑如果有几家像邢氏这样的家族，我就可以安心地躺在家里治理这个县了。”邢侗的二伯父邢如愚则贫者济粮、亡者济棺，无论当地人还是逃荒者，他一视同仁。嘉靖十八年，临邑发生严重涝灾，邢如愚一次捐助粮食一百斗，用于救济灾民。

邢侗的父亲邢如约也是乐善好施之人，自家田里的棉花一向只收七八成，其余的留给乡邻和外地的流民任意拾取。即便逮到盗取棉花者，他也装作不知道，把偷盗者暗暗放掉，甚至还赠送棉花，告诫对方不可再偷盗。同时，他也是深明大义的爱国人士。每逢遭遇欠收或灾年，有些乡人借故拖欠皇粮，邢如约都率先交粮，做出表率。《来禽馆集》第十八册记载邢如约对亲戚们说：“我们要把应该做的事情放在前面，交公粮是应该先做的事情，即使收成不好，交不出好的粮食，也应该先把公粮交上，这是理所应当的。每年两次交税，不应该拖欠。”在他的带动下，人们都会按期交粮，交不上的，他都会代缴。

邢如约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他历次告诫儿子，为官要清廉，不可见利忘义贪图财利。当邢侗到南宫县上任时，邢如约告诫儿子：“我们不需要你养活我们，不需要荣华富贵。我们收入足够生活，你不可为物质所累，而贪污钱财。”邢侗巡按三吴回家探亲时，济南府一个商人因有求于邢侗，携带大量珠宝到邢府拜访，但是却被邢如约严词拒绝。

正是祖父辈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得邢氏子孙也传承着这些美好的品德。邢侗无论为官还是为民，始终不忘家训。

### 1. 清廉勤政

作为晚明时期的大儒，邢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少年时，他就曾发誓“大丈夫不能致身青云，就是辱没了生养自己的双亲，我长大以后要是考不中，宁愿自己跳黄河去死。”邢侗长大以后，也自觉地在品行上奉行儒家的理想：士贵弘毅，吏尚廉平。后来邢侗为任十几年，所到之处必是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他的好友黄克缵在《邢子愿先生传》中写到：子愿治理一个县就像治理就像自己的家一样，自己的吃穿用度，都从自己家里出，从不麻烦当地百姓，不用公款。大小案件，一定都明察秋毫，公众判决。至于法无可贷者，即使有权贵说情、上官示意，也不徇私枉法。邢侗到南宫县任职时，为了调查民情，一进南宫县地界就下轿步行，微服私访。跟当地的老百姓聊天，获取真实的民情信息。他看到当地大旱，一上任就自己出资为当地农民打井抗旱。明朝李维祯在《邢子愿小集序》中评价邢侗：在南宫为县令5年，金矢之罚，锱铢不染，日常所用、酬往交际，悉取家囊。所以，深得老百姓爱戴。在南宫任县令期间，他重视教育，兴修学校等教育文化场所，使南宫县城貌焕然一新。他惩恶劝善，他在任期间奖励善行善举，提倡良好风俗，废除陋习。他处理案件雷厉风行、公正严明，诉讼双方都是心服口服。明朝冯时可在《邢公墓道碑铭》中记载：“为南宫令……民有讼，片言决断，两造皆服。”他到河东监察盐政时一路赈灾救荒，老百姓视他为再生父母。当时，为了感激邢侗，人们为邢侗送去礼物，但均被邢侗婉拒。巡按三吴时，他巧用计谋歼灭大强盗张帮陵。因为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而深受百姓爱戴，所以每到一处，离别时，百姓定是挥泪送别。南宫县人民还为邢侗修建了“廉公祠”，刻了“南宫令济南邢公去思碑记”。

邢侗的廉洁勤政既深受其祖父、伯父身教的影响，也离不开其父亲的谆谆教诲。为政以德、见得思义的君子教诲在这个书香世家代代相传。而他的清正廉洁不仅惠及当地百姓，也为自己积下福德。因为政绩显著，邢侗也深得皇帝欢心和朝廷重用。他从南宫县令一路提拔至陕西太仆寺少卿。他巡察三吴时“抗旨防贼”“私自开仓济赈”，被人弹劾。但是，因为万历皇帝深知邢侗清正廉洁，只给了他象征性的处罚。正是他的一向廉洁清正使他幸免于难。

## 2. 爱民如子

秉承孔子的“仁爱”思想，邢侗时时处处以仁爱为核心，博施与众。他在河东监察盐政时改革盐政，使许多盐商和兵卒幸免于难。当时地方官员为了增加赋税，搜查贩卖私盐的商人，逮不到盐商时就诬陷逮捕巡逻兵，然后再让其手下或家人出钱赎买。当手下或家人拿不出钱来赎买时，这些巡逻兵就被处死。官府这种荒唐的做法造成当地怨声载道。邢侗了解情况后不仅废除了这种做法，同时也允许盐贩子的家人出钱救赎已被逮捕的盐贩。这一措施挽救了数千人的性命。

邢侗巡察三吴时，消灭了大强盗张帮陵，解散了张帮陵的部众，其中有一个小头目按律当斩。邢侗念其有立功表现，而抗旨释放。此事被皇帝知道后，下旨“夺俸三月”邢侗非但没有后悔，反而高兴地说：“我以三个月的俸禄救了三个人的性命，非常值得。”“抗旨防贼”和“私自开仓济赈”都是抗旨的大罪，邢侗并非不知，但他仍然置个人的生死祸福于不顾，敢于为之，其根本原因是心中的博爱精神。这一精神跟其祖父甘于领刘瑾之罪而不肯肆意搜刮百姓钱财是一脉相承的。

邢侗在湖广任上督运漕粮时，邢侗体察民情，深知漕运之苦，所以他往返督运两年，不曾催科。

邢子愿即使不为官时，也心系民众。冯时可在《邢公墓道碑铭》中写到：“邑苦旱蝗，走白黄中丞，调谷济之邑。”这里记载的是万历三十七年，临邑县遭遇严重的灾害，先是大雪和暴雨导致小麦颗粒无收，秋天又遭遇虫灾。于是邢侗就写了《上黄抚台》书替临邑百姓求赈。邢侗的种种言行正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体现。

## 3. 乐善好施

李维祯《邢子愿小集序》写邢氏家族“子愿之门，四方贤愚贵贱，辐辏纒属，和颜接引，殷勤劳问”。即使到了邢侗家道中落，经济拮据的时候，有客人来，他们家人仍是热情好客，邢侗的夫人常常把首饰拿去当钱来招待客人。热情好客，乐善好施是邢氏家族的优良家风。祖父邢溥沐浴乡邻六十余年，被宿安乡邻爱戴而建祠堂纪念。伯父邢如默、邢如愚也都是古道热肠之人。他们放粮接济穷人，筹资修建学校。父亲邢如约更是被当地民众称为“邢大善人”。他冒死为被皇上杖责的御史大夫郭君弼疗伤；筹资修缮文庙；为在临邑境内饿死的二十多人出资

买棺材掩埋；抚养宿安街的孤女。

邢侗和他的兄弟们亦是如此。邢侗父亲去世后，邢家经济已经较为拮据，但是遇到生活困难之人，邢侗仍然要带回家吃住。“所谓‘来禽馆’者与众共之。不加管仑。济上湘花园亦然，丐者接迹，与金与粟，若饮河皆满其腹，田舍翁引上坐同桌食，途遇少年无赖避不见揖”。“来禽馆”从来不闭外户，任由流民乞丐出入。后来生活难以为继，其妻赵氏常常拿出自己的首饰当掉以贴补家用，甚至邢侗不得不以卖字画为生。即使如此，夫妻二人仍是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愿世家就是凭借着这种信念，代代施济于人，而被世人所敬仰。

#### 4. 孝亲敬师

百善孝为先，一个乐善好施，富有仁爱之心的家族一定是一个孝亲和睦的家族。邢如约兄弟三人即使到了儿孙满堂也没有分家单过，而是共同侍奉父母。邢如约被过继给四叔，四叔三十多岁去世后，邢如约一直赡养着他的婶母，并为其送终。而且，他还为婶母的两个女儿置办嫁妆，将田产分给婶母的姑爷。

子愿侍奉双亲，百倍耐心，无微不至，堪称孝子之模范，他三十六岁为侍奉父母辞官归家。《明陕西太仆寺少卿邢侗墓志铭》中记载：邢侗擢陕西行太仆少卿后，因为顾念父母双亲年老，于是称病辞官。再三辞请，得到皇上批准。当时只有三十多岁。邢侗就日夜侍奉父母左右，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经常买来各种美味，进献给父母。父亲生病，邢侗药必亲尝，日夜守护在父亲身旁。父亲唇燥则润之，息微则鼻通之，亲自处理大小便。忘食忘寐的照顾生病的父亲，邢侗疲惫至极以致于晕倒在地。还有一次，子愿到齐河去看望顾大女儿，邢母忽然生病，子愿闻说时天已近黄昏，但是他仍然策马急驰，日夜兼程，回到临邑。他自认为没有照顾好父母，又急又悔又愧。他长跪在母亲面前谢罪，又以头撞地，又向上天祈祷，又请来多位名医为母亲诊疗。子夏曾问孝于孔子，孔子告诉子夏：“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就算是孝子了。而邢侗不仅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而且无微不至的呵护，亲自为父母尝药，照料大小便，以至于把自己累得晕倒。

对他的恩师于慎行，邢侗也是敬爱有加。邢侗与于慎行既是师生关系，更是莫逆之交。两人常结伴出游，畅谈人生。万历三十五年，于慎行再次被朝廷起用，

赴京就任时，邢侗为其送行。后来，于慎行不幸卒于任上。邢侗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他不顾自己身患惧怕寒冷的风湿疾病，骑马前往潞河迎接恩师灵柩，并一直护送至东阿。回到东阿，他帮助料理恩师丧事，亲自为恩师写碑文，上书朝廷为恩师请谥号、请求抚恤。在恩师的葬礼上，邢侗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直到把恩师的丧事料理完之后，他才返回家。《明陕西太仆寺少卿邢侗墓志铭》中记载：“既相，子愿饯之境上，祝曰：‘天下人才何限，我师翁受敷施，无以小子示天下私’。甫入朝，遽卒。跋涉霜雪，迎丧都门以外。抵东阿酬酢吊宾，葬其冢嗣，内史纷请谥，请恤，请祀学宫，礼使臣之将命者，尝女季弟女因以字内史子元瑛，葬日执钁，泪如縻，众咸嗟异。”

## 四、作品赏析

### （一）书法作品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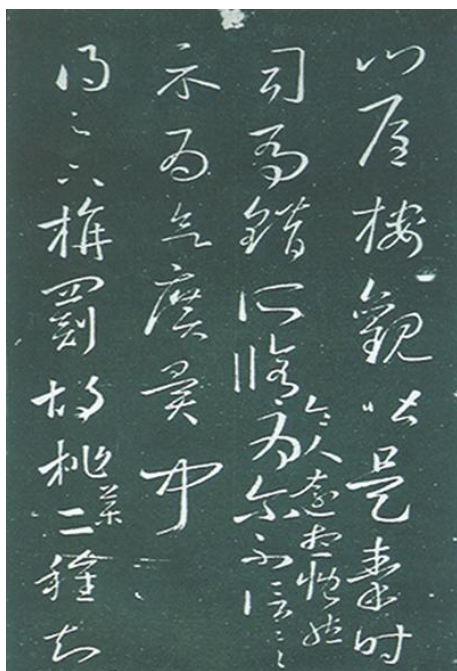
因为邢侗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故而对其书法研究者居多，评价也极高，皆认为邢侗书法诸体皆工。明史高先在《〈来禽馆集〉小引》中评价“（侗）书法工诸体，……规模肖像，咄咄逼人”。刘重庆《邑人王洽〈来禽真迹〉跋》也称赞邢侗书法“种种入妙”，“备极诸体”。黄克缵《邢子愿先生传》更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今世书法，类称邢、董。然董仅工方寸行书，其余诸体，不能及也……”，由此可见，大家一致认为在各体兼能这一点上，即使董其昌也不及邢侗。今天所见邢侗各体书作数量不一，以行草居多，但目前未见他的篆书和隶书作品。

邢侗的楷书用笔灵活精到，蕴藉有致，别有趣味。黄克缵评价邢侗小楷为“小楷临米，似拙而媚”。从后人附于《来禽馆帖》的《西园雅集图记》可见邢侗所临米芾的楷书，确实是精到有致。

子愿先生在行草方面的成就斐然，他的行草大多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作品。明人刘重庆在《邑人王洽〈来禽真迹〉跋》中说：先生书种种入妙，而小行草之妙颇足致。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纂》：“其临仿法帖，虽未尽合古人，但笔力矫健，圆而能转，时亦有得”，这是对邢侗行草书较为恰切的评价。

邢侗在巡查三吴时见到吴廷藏唐硬黄《十七帖》，于是亲自钩摹带回。1592年8月开始，他将钩摹回的《十七帖》刻在石头上，以“元”字编号，共八块，每块石头84×28公分左右不等。现原石存于临邑邢侗纪念馆。（下图为临邑问耕

堂藏《来禽馆帖·十七》清拓本)。邢侗自己评价他的十七帖是“若挹右军指腕，而对右军眉宇”，认为此帖“独骨肉匀亭，时露锋颖”。针对这一点，张忻在题《来禽手摹十七帖》中也说：“此十七帖全本，虽系中年，然不矜丽妍，不轶而豪，不束而严，每对硬黄十七，真所谓毫发惟肖。其萧散若春雨之霖，森疏如伴月之星，宛转若俚丝之茧，或足拟之”，又说“始知古人书法，过江临川，未可便以先后定其优劣”，足见《来禽馆十七帖》的价值所在。



《来禽馆帖·十七》清拓本

## 2. 诗歌赏析

邢侗的诗歌不似他的书法成就那么卓著，但也有所建树。他的诗歌以唐诗为宗，学习李白、杜甫、岑参等人的诗歌风格，在风骨上又追汉魏。他注重声律、炼字、神思、意境，“高古典雅，每每工而拙用之”是对他诗歌的一种评价。在500余首诗作中，他的五言律诗成就颇高。他的写景诗歌具有清新飘逸、含蓄内敛之灵美，而叙事抒情诗则不失慷慨激昂、荡气回肠之豪迈。李维祯在《来禽馆集序》中盛赞其诗文：“子愿诗文……统其凡而言之，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声律、丽辞、炼字，有至境矣；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有具美矣。”宋弼评价邢侗之诗：“《来禽馆集》诗五卷，去其应酬之作，大抵气体清逸，风神隐秀。渔洋山人云：‘来禽夫子本神清’非虚语也。”

## 原文 1

### 平倭<sup>[1]</sup>歌

飓风扬兮天地黑，妖气瘴兮海无色。

控扼塞兮保东国，岛夷平兮曜灵<sup>[2]</sup>出。赖我公兮振威德。

#### 注释：

[1]倭：古时对日本作战时称日本为倭，倭奴，倭寇。

[2]曜灵：指太阳。

#### 赏析：

这首诗写于明末抗倭时期，表达了作者抗倭的决心，写得慷慨激昂，荡气回肠，颇有“建安风骨”的意蕴。前两句把日本倭寇比作妖魔，极写其对倭寇的痛恨之情。当时倭寇频频侵犯我国边境，令我国边境人们难以安居。所以作者说他们搅得我边境天地黑，海无色。“天地黑”“海无色”运用夸张的手法形象地写出了倭寇侵扰我国边境人民，给我国边境人民生活带来的极大痛苦。“控扼塞兮保东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抗倭的决心。“岛夷平兮曜灵出”则表达了作者战胜敌人赶走倭寇，还海岛人民太平和安康的信心和决心。此时，戚继光正在抗击倭寇，作者邢侗作为一名有识之士，也有着一腔报国热情，也有着杀敌报国的决心。他先后向朝廷多次上书谋划抗击倭寇的策略。

## 原文 2

### 麦秋

绿满平畴<sup>[1]</sup>映碧空，渐黄如粟陇云同。

山妻<sup>[2]</sup>饷膳经前坂，田犬穿林吠晚风。

蚕子在眠行作茧，雉媒<sup>[3]</sup>群鸪<sup>[4]</sup>剧呼雄。

江南总属桑麻地，也自输余岁麦丰。

#### 注释：

[1]平畴：平坦的田野。

[2]山妻：隐士的妻子。晋·皇甫谧《高士传·陈仲子》：“楚相敦求，山妻了算，遂嫁云踪，锄丁自甯。”后多用为自称其妻的谦辞。

[3]雉媒：为猎人所驯养用以诱捕野雉的雉。

[4]鸛：(qú)，鸟类的一种，体小，尾巴长，嘴短而尖，羽毛美丽。

### 赏析：

此诗风格清新明丽，富有生活情趣。绿畴、碧空、黄麦色彩鲜艳明丽，清新自然，给人以视觉美。山妻饷睡、蚕子在眠展现出一派田园的祥和之美。田犬吠晚风、雉鸛剧呼雄，以动衬静，更突显了麦秋时节，田园的恬淡闲适的生活。这首诗大概是其“气体清逸，风神隐秀”风格诗作的典型代表。

### 参考文献：

1. 临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邢侗专辑》. 《临邑文史资料第九辑》. 编. 1997年。
2. 刘丽颖. 《邢侗书法研究》.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3. 党月异 孙建功. 《邢侗邢静慈研究》. 北京:线装书局. 2012年, 4-155, 357-406。

# 田 雯

## 一、生平简介

田雯（1635年7月7日——1704年3月28日），清初大臣，诗人。字紫纶，一字子纶，亦字纶霞，号漪亭，自号山姜子，晚号蒙斋。山东德州人，田绪宗之子。康熙三年（1664）殿试二甲第四名进士。授中书舍人，十九年（1680）提督江南学政，二十六年（1687）为江苏巡抚，三十八年（1699）奉旨督修淮安高安堰河工。以病辞职归里。诗与王士禛、施闰章同具盛名。著有《山姜诗选》、《古欢堂集》、《黔书》、《长河志籍考》等。

### （一）时代影响下积极入仕

田雯出生于明末，一生历经明清两代，主要活动在清代，顺康两朝。田雯出生在明崇祯八年乙亥 1635，出生时正是明末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农民起义，开始入陕。在田雯的整个少年、青年时代，农民起义，国内的统一战争一直在激烈进行，清除社会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斗争异常激烈。

德州在明末清初，虽然有幸平稳度过，没有遭到战火的严重摧残，但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再加上乱世之中，强盗恶人横行，天灾人祸不断。在《蒙斋年谱》中说的，田雯一生灾祸不断，多次被恶人强盗亲爱，无奈之下曾想要迁居道济南府去。

田雯生活的时期，处于新旧两朝更替之际，国家命运跌宕起伏，但是新王朝的建立，又是风云初变的时代，国家的动荡对于田雯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时代的特殊原因，使得田雯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事外，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国家命运起伏，积极的入世成为他的必要选择。于是通过科举考试积极走向仕途，心系百姓，又致使他为官清廉，所到之处皆有较好的政绩。而他从最底层走向高层的政治发展轨迹，使得他人人生经历丰富，生活是文学最好的老师，田雯的文学作品中很多都是离不开社会民生，因此，他的诗歌具有较为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密切联系生活，真实而内容丰富多彩，文以载道，是这个动荡的特殊时代的真实反应。有人评价田雯在文学创作方面，才雄笔大，就是因为他诗歌之中包含着时代性。

## （二）地域文化中的英才

山东素来是孔子的故乡，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博大的齐鲁文化，历史文化尤为灿烂。清初，德州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府，田雯的家乡是德州，也受到以孔孟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受到地域经济的影响，以山东西部古运河两岸为写作背景，诞生了两部著名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而古运河恰恰也流经德州，文化的繁荣，也深深地影响和推动了田雯的创作。曾经有人研究田雯和《桃花扇》之间的关系，戏剧研究的角度思考，田雯对《桃花扇》的创作和传播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对于清代戏剧的发展也贡献颇多。

文化的繁荣昌盛，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田雯在晚年曾经著有《长河志籍考》，对于德州的历史文物和景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包括现在较为熟知的董子读书台、董子祠、苏禄王坟等一大批人文景观，一个地区的文物标志着这个地区的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它是历史的再现。田雯多次将这些文物写入他的诗歌之中，例如，“亭是卢公吟杜地，家临董子读书台”，亭指的是杜亭，卢工公是指清代德州籍诗人卢世澹，酷爱杜诗，建此亭，自封为杜亭亭长。文化的兴盛，致使德州地区一批批文人考中了科举，走向了仕途之路，而田雯就属于这一批人中，在文学造诣和仕途发展较为突出的代表。

## （三）学识渊博，著述丰富

与王士禛并称“齐鲁二贤”田雯不仅仅是清初政坛上的名臣，而且勤于笔耕，著述颇丰。

由于他“天资高迈”、“才雄笔下”，文学造诣颇深，又足迹遍南北，理政多蛮荒，阅历广泛，洞察民情，所以著作宏富，诗词文论俱全，且士、农、工、商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情、掌故无不涉猎，连缀成清初社会多姿多彩的风情画。

康熙十六年，主盟诗坛的王士禛选田雯与曹贞吉、谢重辉等诗为《十子诗略》，编订印刻，史称“金台十子”。

康熙十八年，京师地震，田雯写下著名的《移居诗》，其中因“墙脚残立山姜花”的句子，被人们称为“田山姜”。如今，在运河岸畔的田雯纪念馆中，依然设有一间书屋，名为“山姜书屋”。

康熙中期，田雯以超迈的天资、博洽的学问、纵横捭阖之气，崇尚雄伟奇丽，

别辟门庭，与王士禛并称“齐鲁二贤”。现代学者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也说：“清初渔洋之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极遵宋诗而推山谷者，则田山姜是也。”

田雯一生勤于笔耕，主要著作有《古欢堂诗集》《古欢堂文集》《长河志籍考》等等，大多收入《四库全书》，是清代的重要文献。其中，《长河志籍考》是田雯晚年献给故乡桑梓的方志巨著，以优美多样的语言，举凡德州的人文历史、名胜古迹等，以表达对故乡德州的深情厚谊。

田雯用诗歌将德州描绘得美妙绝伦：  
鬲河之水流清渠，数间茅屋城西隅。  
桃花李花二月发，落英满地如毳毼。  
亭前老树缠风雨，上覆檐溜枝扶疏。  
故园景物颇清美，行歌被酒真吾庐。

## 二、主要成就

清朝德州地域发展中，在文化创造与试图征途两个方面都较为优秀的代表是田雯。

### （一）仕途卓越

清朝时期，德州地域文化兴盛，一批文人纷纷考中进士，田雯作为其中仕途较为卓越的，不仅官居二品，而且历任封疆。下面简单介绍几个事例。

田雯考中进士后，翌年坐船到达京城，皇帝未立即授予他官职，只给他一个小小的节推职务，办理一些勤杂事务。到1666年（清康熙五年）裁节推时，才给他一个从七品的内秘书院办事中书舍人。田雯第一次到内秘院办公，就遭到了同年翰林的侮辱。尔后，经常看人家的脸子行事，并且还时常遭到他人的嘲笑和打击。仕途的坎坷、官职的卑微、居京的困顿、别人的侮辱和嘲笑使田雯从精神上深受打击他也不免时常有些自叹。

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田雯受命主持顺天乡试，因他“秉质纯良，持心端谨，简司翰墨”，恩授徵仕郎。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苦熬了7年的田雯才升为户部福建司主事。次年，升为云南清吏司员外郎加一级。1676年（康熙十五年），身为工部营缮司郎中的田雯，奉命前往北京城东通惠河监督大通桥漕运事务，并按时完成了任务。竣工后，受到康熙皇帝的嘉奖，认为他“持躬克谨，莅事惟虔”。两年后，再补工部虞衡司郎中。在此期间，田雯已是著名诗人，官

品虽屡有升迁，但仍感到“养生须谨如防寇，再仕真痴是画蛇。拙不合时休自悔，老犹多痒倩谁爬？”，有时甚至想到弃官归隐。因此，他经常感叹“十载为郎”乞归不得。他爱学愚山，愚山即施闰章，为清初著名诗人，有“南施北宋（琬）”之说，田雯同这些名人颇有交往，他不墨守一朝一代、一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自铸伟同，力争不同凡响，务期出奇制胜。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诗坛盟主王士禛在京选《金台十子诗》刊行，当时有十位著名诗人的作品被选，田雯便是其中之一，足见其文学造诣之深，诗作知名度之高。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皇帝诏内外大臣荐举学鸿之举，用者95人，田雯在内，于是诗名噪京城。同年七月，因地震，田雯自北京万里桥边迁居崇门外，作山姜《移居诗》一篇，和者百余首。由于田雯在此期间政绩显著，官声甚好，曾三次被康熙皇帝召见于瀛台（今北京中南海处），并被派往廷外就职。

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田雯被擢升为江南学政道按察使司金事。清初的江南，因战乱不断，致使文化基础低而薄弱，士子淹没于逃离之中，学院毁坏、学风懒惰。田雯到任后，便着手振作士气，经常到各地书院为诸生讲学，制定了治理教育的条例巧则，来教导和约束士子，使江南文风大振。因此，在淮安、扬州一带人士中，田雯有“田圣人”之称。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田雯任期已满，在此期间虽政绩突出

## （二）著述丰富

田雯不仅宦绩著称，而且诗名誉满朝野。有以其诗振骚坛，与王士禛并声驾的说法，可见其诗名之尊。他留下的著作甚富，有《古欢堂文集》12卷、《古欢堂诗集》15卷、《长河志藉考》10卷、《黔书》上下两卷、《幼学编》4卷、《诗传全体备议》8卷，皆入《四库全书》。还著有《楚储米议》、《观水杂记》、《游太室、桐柏山、少林寺、司空园记》、《宝泉记》、《黔苗蛮记》和《苗俗记》等。

田雯之诗，现存《古欢堂诗集》，刊行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收录了他自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间的诗作。计1000余首。就其体制而言，有五古、七古、歌行、杂言，近体诗有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俱全。就其内容而言，有记事、记游、咏物、山水、风物、怀古、悼亡、酬答、题赠等。由于田雯仕途得意，官运亨通，在京为官，又外任江南江北贵州诸地，阅历宽广，知识精博，又加“才雄笔大”（田同之《西圃诗话》）其诗歌独辟蹊径，

自名一家。

田雯诗歌成就最高的要算古体诗，不仅题材广泛，丰富多样，而且反映生活比较敏锐迅速，揭露社会问题直接尖锐。他的《淘金谣》、《送马谣》、《种瓜辞》、《槐花驿火灾谣》、《相见坡蛮谣》等等，都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和劳动人民疾苦的诗，它深刻揭露了苛捐杂税、徭役赋敛的残酷繁多，对清统治者削平四夷，征服八方，对西北、西南各族连年用兵，血腥剿杀的罪行给予大胆抨击。《送马谣》中的“桑乾河，滹沱野，羽箭材官南送马。太仆火印何权奇，瘴乡不产龙媒姿”，说出朝命大官们向战争前方押送骑兵、弓箭武器、马匹等军用物资。那些骑兵的“健儿来何方，官帖十行。鞭垂在手，戟髯怒张。”凶相毕露，欺压良民，逼那“农夫铍草，妇子汲水”，“豕豆供给苦不足”。送走了“马队”、“吏索钱”，百姓走投无路，只有“鬻牛”卖田，倾家荡产。无怪《清诗别裁集》的评者言：“写尽农家供官之苦，作新乐府读。”那《淘金谣》中的“淘金户，户户无宁居。背上都卢，西走巴渝……苛政十倍，横索官钱，先卖黄犊，后鬻儿女！”这血淋淋的现实，多么令人发指啊；诗人大声疾呼地写到“楚山高兮沅江深，猺村无路！”象这类具有社会真实的诗歌，在《古欢堂诗集》里为数不少，都是田雯在江南、贵州为官时的佳作。在清初-大兴之时，象田雯这样大胆、直接、露骨，这样一针见血地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把矛头指向当权者，这还是不多见的。而田雯以其敏说的眼光，开阔的胸怀，毫无顾忌地抨击现实四罪恶，真乃不愧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就其诗的风格而论，“原本少陵”或“五言逼真谢、鲍；七言全仿杜、韩。”（田同之《西圃诗话》）笔者以五古逼真谢鲍，“歌行”极似高岑。再加上田雯胸怀若谷，气质刚毅，才雄思精，为诗千变万化，气象开阔，纵横跌宕，高迈奇峻，一时警卓诗坛。象那“闰五月雨霹雳飞，将军战缚蛮王归。于阗之王大宛马，十路降旗城皆下。班师吹角青海头，饮至解甲清昼同。逆浪风翎鸥鹭白，歇鞍汗血骅留红”的《大雨行》，气势磅礴，音调铿锵，犹如高适的《燕歌行》基调。又如“眼中之人南北曹，飞扬跋扈文章豪。酒后耳热各大叫，脱衫据地风萧萧”《长句送峨嵋南归》四句，虽如朋友戏语，但又概括了南北曹的为人和气质，语言粗犷而不庸俗，节奏跌宕而畅达。就其讽刺性长调也明快幽默，如《题武则天夜宴诗卷后》的“金轮皇帝雌之雄，武成殿上非龙鍾。涂泽髦状两玉手，摇笔脱腕如

飞鸿”诗句，写来萧洒脱俗，音调婉转自如。排傲跌宕中，又有灵活多变之感，风流洒脱，自成一家。

田雯近体诗，以五律、七律、排律最多，这些诗多是记游之作，而以咏物怀古、记事山水为多。象《皖江道中》的“折坂蓝舆出，衔泥骑马来。桥边枫叶下，溪口蓼花开。竹簟寻眠具，江鲈作馔材。瓦盆盛浊酒，独酌兴悠哉！”前四句写景，皆为对句相照。景动物静相宜，色彩明丽，点画出一幅桥溪花树的秋是图。后四句是抒情，凉席、鲈鲜、美酒、古瓶，人在画图中，悠哉悠哉，美不可言的行乐心情。此与陶渊明隐逸闲适之致，情调不谋而合。再如“渺渺太湖水，遥遥光福山。梅花一万树，窈窕非人间。思与尧峰叟，扁舟数往还。烟峦七十二，坐啸听潺湲”《泊舟吴门寄江沼文》，此诗写来冲淡自然，造景雅致新颖，诗人醉心山水之情，其味无穷，大有神韵之致。又煞似大谢《登江中孤屿》情致相类，有一种清新自然之美，脱俗超迈之趣。

他的七绝七律，大有杜甫风范，凝重敦厚，结构严整，质实而意远。以《景防阳宫故址》最佳。那“衰柳寒原寺迳斜，旧宫层塔集昏鸦”之夕暮残景，“何来楼下韩擒虎，可惜井中张丽华”的南朝往事，勾起诗人之痛。下面的“远圃香风开菡萏，老僧竹院晒袈裟。空智磬路无人汲，雨湿胭脂似落花”的叙写，联想当年南朝歌舞升平的宫殿之上，而今变成废墟寺院，此景此情，勾起了诗人之恨，故国之思。田雯的这类诗作，都写得哀痛悲切，苍凉凄怆，正如杜甫《春望》一般心情。

综观田雯之诗，不仅才力高，而且取材丰富，诗格雄伟豪壮，构思灵活多变，善于标新立异，能另辟蹊径，自成一家，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杰出诗人。

### 三、“德能”思想

#### （一）为官清廉，治绩卓著

读书治学、修身养德造就了田雯体恤百姓、清明廉洁的为官之道。他在任期间，每每出行往往轻车从简；自己购买蔬菜、粮食；杜绝官场宴请等等。

康熙二十六年，五十三岁的田雯巡抚江宁。当时江宁一代阴雨连绵，稻谷腐烂，百姓苦不堪言。田雯向朝廷具奏五大疏请，请求减免江宁贡米，动用国库钱财疏浚运河，并减赋税、免铜课，都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使江宁灾民得以度过灾荒。田雯还拿出个人积蓄，在城内设置两所病坊，救民于倒悬。

50岁时，他受命在湖北筹办兵粮6万石。当时粮库监守自盗、存整扣零、沿途克扣、索贿受贿等腐败现象防不胜防。征、存、运困难重重。田雯到任，明察暗访，历数弊端，增设“易知单”，规定递交公文即可验收放行。抽查运载粮米，预查册内新船，实行抽签制度，缉拿和惩办盗粮强贼。通过一系列整治措施，使索贿舞弊等近绝，保障了粮道畅通，漕运及时，得到皇帝的称赞，受到当地百姓爱戴。他离任后，百姓特地聚资为他建造了祠堂，以示纪念。

康熙皇帝称赞田雯“持躬克谨、莅事惟虔”“秉质纯良、持心端谨”“慎以持躬、敏以莅事”。1702年正月，田雯辞官回到故里，当年十月，康熙皇帝南巡途径德州，特地召见了田雯，并亲笔题写“寒绿堂”匾额，以表彰其功绩。康熙传旨问“寒绿”是什么意思，田雯回答，寒者，臣已老矣，不行了，老了。绿者，就是发声之意，形容绿苗又长起来了，寒绿就是虽然我老了，但是还能为皇上再干事业。

## （二）耕读传家，诗书继世

田雯的成功，离不开家族门风。德州田氏家族，是明永乐年间自河北枣强县迁来德州的。作为一个跨越明清两代、由农耕转向科举的文化家族，在开枝散叶、繁衍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严谨、孝悌、崇学等为主要特征的家族门风。田雯之父田绪宗、母张氏，文化修养都极高；仲弟田需，官至翰林院编修，有《水东草堂诗》一册；季弟田霭，终身未仕，著有《鬲津草堂诗集》。

少年时代的田雯聪慧、勤奋。他六岁学《孝经》；七岁学《毛诗》；十二岁始学为文；十六岁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岁试第一。三十岁殿试中二甲第四名；三十三岁被授予内秘书院办事中书舍人，从此进入仕途。

田氏家训有53则，涉及家族教育各方面，主要侧重于勉学劝读、伦理道德、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治家理内等多个方面。

田雯母亲张氏，深明大义，柔中有刚。在田雯心中，母亲即是慈母，又是严师，地位崇高，为德州田氏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氏三十九岁丧夫，一生数受皇封、两受诰命。张氏当年到浙江丽水处理丈夫后事时，取库中支纳册籍藏之内室，亲自核算，及至有人攻击田绪宗，则请地方官坐镇县衙，按册勾稽，条分缕析、质对清楚，为其夫辨明清白。七十岁时，以大义拒绝乡亲与子孙辈为其做寿。

打开田雯纪念馆大门，就像打开了历史尘封的记忆。如果说血缘是一个家族先天的印记，那么家风、家训就是它精神的图腾。“德州先生”田雯崇尚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所以他要求他的后人：“子孙才分有限，然不可以不使读书”，正是这些无声而有力的劝诫，让田氏后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用书香浸润生命，涵养品格，照亮前程。

走近“德州先生”田雯，就像走近了田氏家族代代绵延的长河之源。时光荏苒，三百年后的今天，再读田氏家训，已经不仅仅是田氏后人的先祖遗训，更是我们所有德州人的宝贵的文化财富。

#### 四、作品赏析

##### 白水岩放歌<sup>[1]</sup>

我生嗜好与俗殊酸咸，独于高山流水心德合。  
匡庐瀑布天下称奇绝<sup>[2]</sup>，何如白水河灌犀牛潭<sup>[3]</sup>！  
银汉倒倾三叠而后下<sup>[4]</sup>，玉虹饮涧万丈那可探<sup>[5]</sup>。  
声如丰隆奋地风破碎<sup>[6]</sup>，涛如天孙织锦花盘鬢髻<sup>[7]</sup>。  
溅珠跳沫行人衣裾湿，云垂烟接山寺峰峦尖。  
小犊出游太真所不照<sup>[8]</sup>，乖龙结队古冶岂能歼<sup>[9]</sup>！  
半红半黑飞斗大蝴蝶，千章万株森十围松杉<sup>[10]</sup>。  
获獠熊狸须髯爪牙古，鼃鼃蛟螭昼夜风雨酣<sup>[11]</sup>。  
安得十日五日坐潭上，二三酒侣看月凌朝遥<sup>[12]</sup>。  
头脑冬烘酈道元未注<sup>[13]</sup>，履齿倡寒谢客儿多惭<sup>[14]</sup>。  
解衣盘薄箕踞于其侧<sup>[15]</sup>，青天搔首我歌白水岩。

##### 注释

[1]选自《田雯研究》。这是描写贵州黄果树大瀑布的一首诗歌，水源即为白水江。白水岩，白水江畔山岩。

[2]匡庐:江西省庐山。

[3]犀牛潭：黄果树瀑布下的深潭名。

[4]银汉：天河，银河。

[5]玉虹：指瀑布溅起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的彩灯。

[6]丰隆:雷神。“丰隆奋地”这里指瀑布撞击山街。水泻深黑发出的雷鸣般的

响声。奋地：震地。奋，震动。《易豫》：雷出地奋。”

[7]天孙：星名，即织女星。篮鬃（lán sān）：下垂。这里喻瀑布水入潭激起的浪涛水花。

[8]太真：仙女名，指仙人。照：察看。

[9]乖龙：传说中的孽龙。古冶：古冶子，春秋时力士。

[10]千章：犹千嶂，形容山峰之多。

[11]蛟螭(chī)：即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形似传说中的龙。螭，传说中无角的龙。

[12]朝暹(xiān)：犹旭日，初升的太阳。暹，日光升起。

[13]冬烘：糊涂。酈道元，北魏人。旧有《水经》，记述我国河流水道，共137条。道元为之作注，增至1250条，注文二十倍于原书，成《水经注》四十卷，为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名著之一。

[14]展齿倡蹇：意指步履未至。服齿，术居的肉、迂指整集景降用的布席带。谢客儿，谢灵运（南朝安人）小名，时人称之为谢客。好山水，既不得意，便肆意遨游，各处题咏。谢登山常著有齿木屐，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

[15]盘薄：盘踞地上。箕踞：伸足而坐。

## 赏析

山水诗中有的写云贵高原的瀑布，最著名的当数描写位于贵州西南我国第一大瀑布——黄果树大瀑布的《白水岩放歌》。

白水岩，是指白水河畔的山岩。诗歌开篇即直抒胸臆，表明自己独好山水的态度，同时为下文蓄势，三、四句用庐山瀑布反衬黄果树瀑布之奇，并点出瀑布水源-白水河，以及瀑布下最大的峡谷--犀牛潭，黄果树大瀑布的成因是白水河从山峦重迭的东北山脉泻崖直落，流经黄果树地段，因河床突然断落而成，水从60多米高的层崖之巅跌落，落差高达57米，用一“灌”字，写出了瀑布水势之急。诗人认为黄果树大瀑布远胜于盛名卓著的庐山瀑布，原因何在？自第五句开始，从行、声、色各个角度对瀑布进行具体的描绘。

“银汉倒倾”是写水势汹汹，波浪滔滔；黄果树瀑布为九级瀑布，用“三叠而后下”来形容瀑布的多级性，写出了黄果树大瀑布的独特之处：白水河水量充足，瀑布宽时达40余米，平时也在30米左右，加上巨大的水势落差，数十里外

即可闻其排山倒海之轰隆巨响，水瀑跌落处掀起轩然大波，浪花四溅，水珠轻扬如蒙蒙细雨，满潭水雾，长年不散，水气腾腾，经阳光折射，常化作彩虹一道，直入潭中，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这就是“玉虹饮润万丈那可探，声如丰隆奋地风破碎，涛如天孙织锦花蓝鳌”。“玉虹”：彩虹。“丰隆”：雷神，这里是指雷、雷声。“奋地”：震地。《易·豫》：“雷出地奋”。“天孙”：星名，织女星。“蓝鳌”：下垂貌，这里是指花散落的样子。大瀑布组成的特大水帘的气势，令人惊心动魄而萌生一种崇高壮丽之美感。人站在潭边，跳动翻腾的浪花不时打湿衣衫，抬眼望，蒸腾的水汽和缭绕的云雾相接笼罩了整个山峦，深山古庙若隐若现，莫名的小善、乖龙恣意出没，红黑色斗大的蝴蝶翩翩起舞于一望无际的松林之间，獾獾熊狸牙须苍老古旧，鼋鼉蛟螭呼风唤雨，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原始而又贴近自然。

诗人在诗的结尾直接赞美黄果树大瀑布，说这么美好壮丽之景，学识广博的酈道元由于头脑糊涂而竟未加注释，好游的谢灵运若知道白水河畔的美景一定会倍感羞惭，我多想与几个知心侣朋十日五日坐在潭边，宽衣伸足而坐，看月落日升，听我于白水岩畔放歌。诗人把黄果树大瀑布的美描写到了极至。

这首《白水岩放歌》是否是最早的歌唱黄果树大瀑布的诗歌？不得而知，或许为了表达惊奇欣喜，诗人使用了罕见的九言诗格，字里行间表达的是对瀑布的赞美，透露出的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欢畅，是精神的完全解放，“放歌”之“放”字，也许是此时最能表现诗人心境的、最为传神的字眼。

参考文献：

- 1.袁行雲:《清人诗集叙錄》[M].文化艺术出版, 1994。
- 2.刘津鑫点校:《冯惟敏冯溥李之芳田雯张笃庆郝懿行王懿荣年谱》[M].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 3.黄金元.《田雯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 2012。
- 4.朱兴泉.《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田雯》[D].山东档案, 1994(4)。
- 5.石玲.《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6(5)。
- 6.蒋星煜.《田雯与〈桃花扇〉及其他》[M].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0(4)。

# 卢见曾

## 一、生平简介

### (一) 茁壮成长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十月十五，卢见曾（1690—1768），出生于德州卢家大院（今德城区解放路以东、勤奋街以北，芦家井街一带），为德州卢氏第十二代孙。字抱孙，号澹园，别号雅雨。

明朝初年，卢氏家族由直隶涑水迁至山东德州左卫，后世代居此。卢见曾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知识分子家庭，其曾祖父卢世滋曾为明朝大学士；祖父卢裕为当时的秀才；父亲卢道悦于康熙九年（1670年）考中进士，曾任陕西陇西河南偃师知县，并写下《公馀漫草》《清福堂遗稿》等书。卢见曾出生时候，卢道悦已五十余岁，老来得子，疼爱之余，卢道悦更是悉心教养。其生母王氏对其管教更是非常严格，对养成谨慎好学积极上进的品格，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卢见曾自幼在其父卢道悦的熏陶下，四岁开始学习声韵，六岁即已通晓，而且能每天诵读千万言。九岁已通读九经，十三岁则拜在中州名儒高矩庵先生门下。从学两年打下坚实的经学根基。十五岁时，自河南偃师返回德州参加并通过了科举的第一道门——童子试，顺利进入德州州学，成为邑庠生（秀才）。在州学里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才冠州城。卢见曾在州学里开始与州城学子交流论学，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田同之<sup>[1]</sup>。两个人互相切磋学业，问学论道，互相砥砺。其父“尤善决人科第，百不失一”对卢见曾的科举之路，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卢见曾经常游走于卢家世交谢氏、萧氏等名宦之家，得到了谢重辉、萧惟豫等名儒的赏识。山东学政黄叔琳<sup>[2]</sup>对卢见曾颇为赏识，收卢为徒并推荐他参加辛卯乡试。康熙五十年，卢见曾以五十四名的成绩秋闱胜出，荣登“桂榜”<sup>[3]</sup>，成为举人。第二年卢见曾拜于德州名儒田震<sup>[4]</sup>门下学诗，跟他学诗十余年，得到了

---

[1] 田同之，字彦威，一字砚思，别字西圃，号在田，清中期山左诗学、词学的重要代表之一。田同之出身于德州文学世家——田氏家族，是山左文豪田雯之孙。自幼嗜书如命，不好玩耍，日诵数千言，人们都说有乃祖之风，因称之“小山姜”（田雯号山姜）。

[2] 黄叔琳，字昆圃，直隶宛平人，是康熙辛未科探花，清代巨儒，世称北平黄先生。他在山东任学政其间，以兴贤育才为己任，并建白雪、松林两书院，发展当地文教事业。

[3] 桂榜为乡试录取举人的公告榜，因放榜时正值桂花盛开的时间而得名，头名称为解（jiè）元。

[4] 田震（mài），字子益，号乐园，又号香城居士，著名诗人，是清初文豪田雯的弟弟，他的诗有渔洋之风（王士禛号王渔洋）、山姜之气（田雯号山姜）。

[5] 杏榜为会试录取贡士的公告榜，因放榜时正值杏花盛开的时间而得名，头名称为会元。

渔洋、山姜诗学的精髓，对其诗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卢见曾一生对田鼐充满景仰感激之情。王士禛、田雯两位先生都读过卢见曾的诗，对他非常赞赏，断言“吾乡后起以诗名家者当在斯人。”

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卢见曾赴京参加会试，春闱胜出，荣登“杏榜”<sup>[5]</sup>殿试赐“进士出身”成为卢氏第四位进士，进入庶常馆（隶内弘文院，为新科进士深造之所），留京教习三年。卢见曾文才出众，性情豪放，尤其擅长与文人交友，在京学习期间广交四方名儒，与同年进士上蔡程元章，鄞县邵基，嘉禾钱陈群、海盐马为翰、宜兴楚雄文等惺惺相惜，互相砥砺，结成莫逆之交，激扬文字，一时名扬京城。

## （二）蹉跌仕途

雍正元年（1723）卢见曾在京教习三年期满，考核优等，以知县即用。次年，正式授四川洪雅知县。此时，卢见曾的父亲卢道悦已年过八旬，他以父亲年事已高，不宜远仕为由，想告归为老父养老送终。卢道悦听说后，急忙劝阻，说：自己的年纪虽大，但身体强壮，还没到行将就木的时候，让他以国事为重，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挂念老父亲。

雍正三年（1725）秋卢见曾遵从父命带着生母王氏、妻子萧氏、儿子卢谦等离家南下赴川上任。他们出山东入河南，过河内南行，渡过黄河，路经河南偃师县。他的父亲卢道悦曾经任偃师知县，治理偃师十年，深得民心。离职后，偃师的父老在当地名胜浥溪寄胜亭为其父建生祠，每年都会祭祀。知道卢见曾途经此地，偃师父老争相带着酒食来给他送行，令他感慨万千。

雍正四年（1726）其父去世，卢见曾立即辞官，归心似箭。卢见曾虽上任不久，但他的治理才能得到了府、道长官的赏识，再加上洪雅治理刚开始见成效，恐怕会半途而废，都劝他延缓行程，众多乡民也到省里请求将他留下。卢见曾写了《留别洪雅士民》一诗以谢绝。卢见曾离任后，乡民感念他的恩德，把雅江书院的门楼定名为“雅雨楼”，以兹纪念。不久，生母王氏因伤心过度去世。第二年，嫡母程氏也因病去世。卢见曾在家居丧守制<sup>[1]</sup>，除了督促孩子们读书外，就是研习王士禛、田雯的诗学，深得两位先生的诗学要旨。

雍正九年（1731），卢见曾守丧期满除服，补安徽蒙城知县。卢见曾一向具

---

<sup>[1]</sup> 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子或长孙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不能任官、应考、嫁娶等

有治理才能，上任后两月，县务便全面理顺，秩序井然。两江总督高其倬非常赏识卢见曾的吏才，又因为亳州知州不作为，仅两月后，特命卢见曾兼理亳州州务兼办赈灾事务；四个月后擢升六安州知州。在任三年，有很多惠民的政策，离开的时候，州人扶老携幼攀辕<sup>[2]</sup>追送数十里，授业诸生更是并缆连樯<sup>[3]</sup>送至淝河。卢见曾与众人作诗留别，集成《饮贤饯别记存集》（已佚）后来，六安人建祠刊志，以示感念。

雍正十二年（1734）六月，调任亳州知州。十三年（1735）三月擢升安徽庐州府知府，并被委任代理凤阳府。秋季，调升为江南江宁知府，九月又调任安徽颍州府知府；在颍州待了八个月后，又于乾隆元年（1736）年八月，擢升江西广饶九南道。安徽巡抚赵国林奏请“以生衔暂留颍州，办理通省大案”，事情处理完后，才赶赴江西上任。上任不到百日，又升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在此任上不到一年，因整顿盐务，被盐商诬告结党，被罢官羁押。此案先后查了三年之久，所列尽属子虚乌有。但有人还是不想放过卢见曾，说他在扬州不思悔过，整日游山玩水，沽名钓誉。于是，在乾隆五年（1740），卢见曾被充军发配到塞外二十五军台充军三年。

乾隆八年（1743）冬，54岁的卢见曾被赐还，结束了三年的塞外流放。第二年二月发往直隶省，以知州待用。六月补任滦州知州，在任一年，政绩斐然。再一年，擢升永平府（治今河北省秦皇岛卢龙县）知府。乾隆十六年（1751）62岁的卢见曾奉旨升迁长芦盐运使，到天津赴任。十八年（1753）复调两淮盐运使，赶赴扬州，第二次主持东南盐务。二十八年（1763）73岁的卢见曾致仕还乡。乾隆三十年（1765），皇帝第四次南巡经过德州时，特意亲自书写了“德水耆英”的匾额赐给他，这是卢见曾一生最大的荣耀，也是对卢见曾一生杰出成就的肯定。三年后，两淮盐引案发，卢家被抄，78岁的卢见曾被捕入狱，死于狱中。三年后（1771），大学士刘统勋在奏书上详细列举了卢见曾兴修水利，以及为灶户收回盐地所有权等造福百姓的业绩，指明贪官污吏和不法商贩的不实之词，为卢见曾昭雪。

## 二、主要成就

卢见曾作为一个从三品的大员，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是他为官三十多年的政

---

<sup>[2]</sup> 攀辕：拉住车辕。成语攀辕卧辙，意思是拉住车辕，躺在车道上，不让车走。旧时用作挽留好官的谀词。

<sup>[3]</sup> 并缆连樯 并缆：缆绳相并 连樯：桅杆相连。形容船多。

绩。

## （一）为官政绩

### 1. 勤政爱民

卢见曾是具有传统民本思想的政治家。无论他在哪里做官，都把体恤百姓放在首位。如在四川洪雅，体恤百姓，立《雅江新政》世为传颂。在安徽六安、亳州、颍州大兴水利，开龙凤沟、颍州西湖，疏水导洪，造福一方。在直隶滦州，以宽和为本，妥善处理借粮事件，化险为夷。在直隶永平，率官民筑洋河大堤，解除水患。在天津长芦，创“一条编式”税制，解盐民之困。在扬州改革盐政，维护盐民利益。淮扬大水，赈济灾民，五十余万饥民得到赈济。开挖、疏浚扬州城内、城外的湖、塘、沟、渠、重建扬州排水系统，大大减少了水患，利在千秋。

### 2. 发展教育

卢见曾不仅是一方父母官还是一位自身文化修养极高文人，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每到一地，在解决了百姓的生计问题之后，便十分关注当地的教育发展情况。所到之处，兴学重教，培养后学：“在洪雅建雅江书院；在六安，建赓颺书院；在永平，建敬胜书院；在长芦，建问津书院；扬州旧有安定书院，更因廓其规制，严其教务。前后所成就者，不可枚数。于前汉古迹，缺者补，坏者修，罔不兴举。”<sup>[1]</sup>

### 3. 弘扬文化

卢见曾在公务之余曾多次组织文人宴集，以诗文广交天下名士，促进文化交流，更进一步促进了诗学的交流与发展，对东南地区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作出了积极贡献。最著名的是“平山堂集会”和“红桥修禊”活动。

#### （1）平山堂集会

平山堂，今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中峰大明寺内。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供文人大夫交流酬唱所用。乾隆元年(1736)，卢见曾擢任两淮盐运使，上任不久，便参加了当时名士程梦星主持的平山堂宴集。乾隆二年(1737)春，卢见曾继承欧阳修、王士禛等先贤的风雅传统，与程梦星在平山堂同各界名士相会交流。并赋诗作文《重建竹西亭记》。乾隆十九年(1754)，卢见曾盛情邀请蒋恭棐、钱陈群二位老友相坐叙旧。自此之后凡有名公巨卿、骚

<sup>[1]</sup> 清 卢文弨(chāo)《故两淮都转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

客词人来到扬州，卢见曾必选佳日，邀其泛舟湖上，游于平山堂下，雅集不断。平山堂雅集及其后续的唱和活动见证了卢见曾与朋友们的深厚情谊，也成为天下文人交流唱和的媒介，对扬州文化的兴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 （2）红桥修禊

扬州的红桥现今叫“虹桥”，横跨瘦西湖，是北郊二十四景中最亮丽的一个。该桥建于明朝崇祯年间，本是座木板桥，栏杆被漆以红色，故称“红桥”。乾隆元年郎中黄履昂将木桥改建成拱形石桥，整座桥形似彩虹卧波，遂将“红桥”更名为“虹桥”。

“修禊”，本是源于上古的一项消灾祈福的仪式性活动，即于农历三月上旬“巳日”，人们相约到水边清洗沐浴，寓意为除灾去邪（古人认为流动的水可以消除不祥），古语称之为“祓禊”。后世的文人礼祭仪式之外增加了以诗文交流唱和的内容，从而把“祓禊”之俗彻底转换成了一种文人雅集，这个活动的内涵就更多的偏向了社交层面。最著名的莫过于王羲之的兰亭修禊。

而“红桥修禊”是康乾时期扬州最有名气的文学活动，是设于红桥之上的文人名士间的诗文聚会。始于清初王士禛，到卢见曾任职两淮盐运使时，扬州的政治经济已经发展至一定的高度，在相对安定的大环境下，卢见曾效仿前辈，举办了多次红桥集会。最为著名的是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三日(即上巳日)为纪念乾隆皇帝南巡到扬州而举行的这一次，其规模盛大，蔚为壮观，李勉特为此次集会作《红桥览胜图》来描绘当时盛况。在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的同时，也为当地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和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sup>[1]</sup>这七千余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名震一方的文士名流，这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也极大地提升了卢见曾红桥修禊在海内的影响力，一时被传为佳话。不论诸位文人的诗作水平如何，此次的红桥修禊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堪称空前绝后，享誉文坛。虹桥也从此成为扬州一大景色，并流行起来“不游虹桥不算到扬州”之说。

## （二）文学成就

卢见曾素有文名，在学术界和文学界都颇有成就，有“海内宗匠”之称，享“风雅总持”之誉，甚至一度被奉为“东南文坛盟主”，深受世人好评。

---

<sup>[1]</sup> 清 李斗 《扬州画舫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241页。

卢见曾在文学、经学、戏曲、校刊、刻印等方面成就斐然。他学识渊博，经、史、文、诗、词，无所不通。所著《雅雨堂诗集》《雅雨堂文集》《雅江新政》《出塞集》《感旧集》《金石三例》《雅雨堂石集》《山左诗钞》等统称《雅雨堂丛书》，共计 11 种 128 卷，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此外，卢见曾在为官期间还曾整理刊印了先贤师友的大量文学作品、诗文著作、乡邦文献等，对于乡学文化的保护具有巨大贡献，对乡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己创作的许多诗文，仅仅《雅雨山人出塞集》流传于世。诗歌创作上，卢见曾强调“真性情”，他的山水记游及题画诗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晚年隐居时所编订的诗集八卷、文集十余卷在后人搜索传抄的努力下，编为《雅雨堂诗文遗集》，于道光二十年(1840)由清雅堂刊印。

卢见曾一生还积极从事刻书活动，先后校刊的有《乾凿度》《周易集解》《尚书大全》《经易考》《战国策》等三十种，是清代中期著名的校勘家。所刊之书，校勘精细，刻印精美，堪称我国古籍中的珍本、善本，如今在出版、收藏界享有盛誉。另外，还主修了乾隆《金山志》《焦山志》，著有剧本《旗亭记》《玉尺楼传奇》《曲录》等，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卢见曾也是一位大藏书家，爱好抄书、藏书，尤其热衷研读杜诗，并著有《读杜私言》一卷，又编写《杜诗胥钞》十五卷，《余论》一卷，是清代与钱谦益齐名的南北研杜大家。编选《国朝山左诗钞》，经过五年时间，挑选诗人六百二十多个，共得五千九百多首诗，计六十卷，卢见曾一并将作家生平轶事以及自己的评论附于其作品《渔洋山人感旧集小传》之后，为世人认识了解这些作家提供了方便。

卢见曾总是亲自撰写序文，对注文的优劣得失、版本的源流变迁、典籍的主旨大意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使得不少汉儒旧说因此得以流传。

卢见曾在藏书刻书的同时，也潜心于学术研究，同时成立幕府，诚邀诸多名士名儒入幕。幕府中的学者在其支持下得以全心钻研学问，进而带动全社会形成一股浓厚的学术风气，尤其是在汉学的兴盛以及乾嘉学派的兴起方面，卢见曾更是功不可没。

他积极从事与汉学的研究和整理，提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之说，认为欲通经，则应“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

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在当时学界影响很大。为乾嘉汉学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卢氏幕府成就了清朝学幕的高峰，开创了汉学发展的新局面，促进了戏曲活动的繁荣，推进了清朝政治文化进程，功在后世。

### 三、“德能”思想

三千多年的古城德州历经沧桑，形成了具有齐鲁风韵的地域文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董子情怀影响了一代代的德州人。“德育为先”是卢氏家教的重要原则，仁义、礼智、诚信、忠孝、廉洁是卢氏家训的价值核心。卢见曾从小沐浴在“德文化”中，造就了卢见曾爱人以德、为学好尚、慷慨豁达的个性。

#### （一）爱人以德，勤政爱民

“俭以养廉，勤能补拙”<sup>[1]</sup>这是卢见曾第一次赴任洪雅知县离家前，其父将治偃师的经验面授于他的，也是他为官一生所遵循的政纲。因此在他每任一地，都是以民为先，勤字当头，勤政爱民。

卢见曾初到洪雅县任职时，因洪雅地势不平，百姓贫困，税目繁多，民众苦不堪言。卢母王氏教子为官爱民，他遵从母意，改革弊政。先是量入为出，将全年公私必要开支做出预算，减除一切不必要开支；再废除一切杂派。卢见曾以身作则，从县衙到自家，一切开支从简，从而上行下效，大兴廉洁之风，赋税减轻，百姓大悦。洪雅县在当时号称嘉定府最难治之地，狱讼不断，县衙多年讼状积压。百姓们所争的，有数百年的荒山，也有几代人的祖坟，因而必须实地勘察，才能断案。可是当地多是崇山峻岭，不通车马，只能攀山越岭，徒步跋涉。前任知县因惧怕路途艰险，不予受理，便束之高阁，因而积案如山，导致民争不断。卢见曾上任后，将积案一一查阅，按期听审。需实地勘察的，不论道路远近，还是山路崎岖，都亲往查勘，理清原委，当机立断，百姓们无不叹服，纷争逐渐减少。

在安徽六安，严格钱粮征收之法。清查田亩，将民户应纳钱粮及期限明示，不用差催，只是定好时间告知百姓，让他们自行交纳，杜绝胥吏从中作弊。对过期不交的豪强劣绅，根据违限的时间，给予处罚。这样，既无没在钱粮，百姓也不受打扰。同时，清理清理积案，解决民争。根据道路的远近，确立期限按时乘

<sup>[1]</sup>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雅江新政序》

公审理，民争渐息，社会秩序大为改观。

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在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海潮成灾，所属通、泰、淮等地盐场被淹。卢见曾全力赈灾，所有受灾户抚恤一月口粮，应纳钱粮减缓缴纳。同年夏，淮扬一带，连降暴雨，灾情严重。卢见曾主持放赈救灾，抚恤所属灶户数万家；同时，在扬州城外搭建粥棚十余处，分赈各地饥民，动员盐商大户出粮出资，广建粥棚。卢见曾命所属官员、差役等全部出动，维持秩序，以杜绝无序哄抢现象的发生，保证赈务的有序进行。扬州及到扬州就食的饥民五十余万人得到赈济，用米三十万石。灾后，妥善安置，遣送灾民回籍，给钱百万文以资路费。百姓焚香叩别，呼声震天地。

当他的儿子卢谦赴任湖北黄德道时，卢见曾又把“俭以养廉，勤能补拙”转于他，并说“监司职在安民，安民必先察史，察史必先洁己，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卢见曾虽为高官显宦，但“终身无华丽之服，食无兼味，宴客则稍丰，然亦不为流俗之奢靡也”。<sup>[1]</sup>教育子孙也是以“立品”为先。

卢见曾的人品与操守，赢得百姓的景仰。如卢见曾治洪雅县，当地父老要为卢见曾建生祠，立去思碑，卢见曾婉言谢绝。

## （二）为学好尚，兴学重教

卢见曾非常重视教育，在他任职的每个地方都会创办、修葺书院，兴学重教，礼贤下士，促进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他任职期间的所有书院，都由他订院规、立教条、延请名儒当老师。在他政暇之时还亲自前去授课，以身垂范，学子大有长进，学子、士人争相入学，大兴教化。

洪雅山僻小县，教育落后，多年未出过进士。为改变这一局面，卢见曾上任后，在城东南环山抱水、风景优美之地，建雅江书院，并亲作《雅江书院记》以记之。改“桂香阁”为“望春院”，企盼学子能科举中第，金榜题名。院生王运登科，雅江书院由此名声大震。洪雅兴学重教之风，由此兴起。自此雅江书院长盛不衰，培养了大批人才。民国时期，在雅江书院的基础上建立洪雅中学，直到今天。

在六安建赧颺书院，院生程在嵘、杨友敬等相继成进士，赧颺书院名声大噪。

<sup>[1]</sup> 卢谦《皇清诰授中大夫两淮盐运使司运使显考雅雨府君行述》

后来卢见曾充军，门生夏之璜跟随到塞外，如影随形。

在永平府建敬胜书院。永平民风刁蛮，卢见曾认为：“教民莫先于教士。”士为民之表率，士风敦而民风淳。因而在府城平山之麓，明代武学旧址兴建了“敬胜书院”。卢见曾作《永平府书院碑记》以记之。丁卯乡试，敬胜书院生员有三人中举。戊辰会试，敬胜书院生员贺让德中进士，打破了入清以来，永平府无进士的记录。

当年贺让德为诸生时，他的父亲劝说他回家改业：“你听说过我们这地方有人中科甲的吗？”贺让德告诉了卢见曾。卢见曾鼓励说：“有，应当从你开始！”卢见曾因深爱贺生的才能，而加以挽留。后来贺让德先中举，后进士，其父母欣喜若狂，为卢见曾立长生位，早晚叩拜。庚午乡试，书院中举人数多达七人。卢见曾聘请山左名儒经元先生主持敬胜书院，敬胜书院学风大振，生员发奋，科甲蝉联，永平兴文之风日盛，在直隶诸府中，名列前茅，敬胜书院由此声名远扬。

任职天津时天津学宫早已被水所毁，文庙倾圮，士风不振。卢见曾上书建议重修学宫，增建书院，以振兴当地文教。学宫竣工时，卢见曾作《重修天津府儒学碑记》一文。接着又择址新建“问津书院”，这是以“汎海问津”<sup>[2]</sup>的寓意来勉励学生勤奋学习。卢见曾作《问津书院碑记》以记之。津门重教之风日兴，科甲遂盛。

任职扬州期间，继续推行他在各地崇儒兴文的作法，全面整饬扬州安定书院，聘请长洲名儒蒋恭棐主持书院。为鼓励院生学习，按成绩分上中下三舍，区别待遇，以劝学励士。扬州兴学重教之风日盛，人才济济，诗人名家辈出，如享誉天下的榜眼洪亮吉、常州的孙星衍、宜兴的万应馨、镇江的蒋宗海、精通《广雅》王念孙、以“段王之学”著称于世的《说文》大家段玉裁，文苑儒林、才卓识高两兼之的汪中，学识渊博、被誉为“一代通儒”的焦循、精于辑佚、长于名物的任大椿等都出自这个书院。安定书院的复兴，使得江南众多士子在此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也是江南贤才雅士聚集的原因之一。

卢见曾在兴文重教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对名胜古迹的保护、修葺与重建。任职颖州时，曾在西湖之畔重建四贤祠、会老堂、画舫斋等名胜。扬州历来是文人荟萃之地，名胜很多。卢见曾以乾隆南巡为契机，重修平山堂、红桥、竹西亭，

---

<sup>[2]</sup> 卢见曾，《问津书院碑记》，“孔子之道犹海也……学者因文见道，譬如汎海者……不能达者皆不得其津者也。”《雅雨堂文集》卷三，第76页。

增建三贤祠、苏亭等，使古老的扬州更加妩媚多姿，一时游人如织，名流学士云集。

身为封建士大夫的卢见曾，敢于冲破传统伦理的束缚，广泛结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文人雅士，重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做到兼容并包，对当时那个思想文化专制的社会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与其他封建文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学习不断进步，用自己的胸怀容纳一切文化，对扬州乃至整个清朝的文化交流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 （三）孝亲敦友，慷慨豁达

卢见曾对嫡母程氏、生母王氏恪尽孝道，视程氏如生母，垂首受训，言听计从。且对于族人也是照顾有加。其弟闻曾、昭曾早亡，留下孤儿寡母，卢见曾对侄子抚养教育如同自己的孩子。他致仕还乡后，置祭田，建家庙，周济族人，延请名师教导子孙，族里人能读书的就根据他们的情况因材施教，卢门因此大为兴盛。

卢见曾才华横溢，性情豪放，文人士大夫趋之若归，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志向。不论是早年在京还是在江淮一带任职，甚至被流放到塞外时都结交了很多名人志士，吟诗作赋，研经论学，以气节相砥砺。在扬州任职时，爱才敬贤，上至博学宏儒，下至穷困潦倒之学士，有求必应，慷慨相助。被后世尊为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吴敬梓，客居扬州，穷困潦倒，卢见曾深爱其才，多方资助，最终助其完成不朽名著——《儒林外史》。

此外，卢见曾还积极参与地方公益。如天津旧有“施棺会”，为无钱殓殮者提供棺具。后来，时疫流行，木材昂贵，“施棺会”无力承担，无法维持。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卢见曾了解到此事，多方筹措，捐资助会，“施棺会”才能得以维持。

卢见曾的豁达在为政上表现就是当仁不让、敢为人先，所到之处，革除弊政、雷厉风行。他第一次任两淮盐运使时，一上任就推行唐代刘彦之“覘探法”平抑盐价，禁止盐商囤积居奇。据《两淮盐法志》记载，两淮盐商勾结官府侵占灶户（盐民）盐池，在所有权问题上，双方久讼不决，盐民深受其害。卢见曾到任后，做出了“灶属商亭，粮归灶纳”的判决，并核发文契，维护了盐民利益（民国初，盐商们力图翻案，盐民凭“卢案”力争，又获胜利。广大盐民追念卢见曾，于

1920年自动筹资修建了“卢公祠”以为纪念)。卢见曾推行的盐政措施触及了某些官、商的利益，一时谤言四起，被无故罢官。卢见曾给当朝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上书，即《上宰相书》，申述入仕为官以来的原则操守，不卑不亢、言之凿凿，为世人叹服。

乾隆九年（1744）直隶大旱，颗粒无收，数千饥民向官仓、大户强行“借粮”，滦州知州强行镇压，民怨沸腾，形势危机，震动京师。卢见曾临危受命，星夜赶赴滦州。当时，千余饥民已被拘城中，民变将起。卢见曾上任当日，即刻传讯审理，从快、从轻发落。当事人只要申明“借粮”缘由、数量及预定还期，立即释放，其他未被拘押者，只要承诺秋后还粮，再不追究。这样，“借”粮的百姓与被借的大户皆无怨言，危机被悄然化解。次日，天降大雨，滦州民众欢声雷动。卢见曾号召民众抓紧补种五谷，全力扶农。结果，秋季大丰收，“借粮”百姓自动携粮来到州衙听审，愿在原数的基础上加利偿还，卢见曾衡量轻重，从轻发落，数千百姓感泣垂泪，被借人家也感念卢见曾的德化，愿意免除债务，不再追索。这样，滦州百姓非常高兴，都赞颂卢的恩德。总督高斌、布政使沈起元、按察使王师等也纷纷赞叹：不动声色消患于未然，安民于事后，真良吏也。滦州人建“喜雨亭”以感念卢见曾。

#### （四）兴修水利，利在千秋

卢见曾善于治水，所到之处，疏河导水，兴修水利，增强了排灌能力，减少了水患，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卢见曾知六安，为民请命，保住了百姓浇灌农田的水源官塘，并开塘疏渠，兴修水利，增强排灌能力，减少了水患。在亳州开挖龙凤沟等数渠，将水引入涡河，直通淮水。在颖州重开颖州西湖，建坝修闸，疏淤开塞。重开后的西湖既可蓄水灌溉，又可泄洪防涝，惠及百姓，颖民大悦。为警示后人，重视、保护水利工程，卢见曾在西湖之畔，集资重建四贤祠、会老堂、画舫斋等名胜，将前贤兴修水利、造福于民及兴文重教的事迹刻石铭记。之后他又将全区淤塞的河、沟、渠、陂全部疏浚，将涝、洼、旱田变为高产水田，利国利民。治水平府时，治理洋河，率官民筑坝三座，开渠一条，历时一个多月竣工。再到夏秋汛期时，已无水患。任职扬州期间，开挖、疏浚志内、城外的湖、塘、沟、渠与运河水系相连，增强了排洪能力。后来，保障湖以南较狭长的水道，被命名为“瘦西湖”，成为

扬州一大景观。

卢见曾一生沉浮于宦海，却能保证正直为官。任职期间，每至一处必尽全力兴利除害，为民造福，既不固执己见，也不随意听之任之，他会采纳他人合理建议，再结合实际情况，慎重做出有效决定，这样往往更让民众信服。卢见曾十分注重实地考察，不论是筑坝治水、整顿治安或是其他工作，他都会把所有相关事宜的来龙去脉彻底了解清楚，比如当地水源地势、民风历史等。卢见曾从不居功自傲，他认为所有事情的成功都是依靠众人共同的智慧与辛劳，比如开沟修水利等工程，他都会罗列出参与者的名字，让后人勿忘其功。如若工作因故未能全部完成，则会详细记录下自己的所为与所想，希望后继之人能将之完成下去，这份责任心是十分可贵的。

至于致仕后，仍被牵连进“两淮盐引案”一事，刘统勋在给其昭雪的奏章上详细陈述了卢见曾兴修各地水利及为盐民夺回土地所有权等各项造福百姓的政绩，还指明了贪官污吏和不法商贩针对卢见曾的不实之词。刘统勋此举是为了说明卢见曾平生功大于过，而不是说他当年并没有错。当时盐政虽有亏空，但这是历任盐运使积弊所致，属于公债，卢见曾定有责任，却不至于死罪。

从某种程度上说，卢见曾是政治的牺牲者和时代的替罪羊，但他在任职期间造福民众的政绩和在诗文方面的成就以及对学术研究的赞助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 四、作品赏析

### （一）诗

翠华甫过，上巳方新，偶假余闲，随邀胜会，得诗四律。<sup>[1]</sup>

#### 其一

绿油春水木兰舟，步步亭台邀逗留。十里画图新阆苑<sup>[2]</sup>，二分明月旧扬州<sup>[3]</sup>。  
空怜强酒还斟酌，莫倚能诗漫唱酬。昨日宸游<sup>[4]</sup>新侍从，天章<sup>[5]</sup>捧出殿东头。

#### 其二

重来修禊四经年，熟识红桥顿改前。潞汉<sup>[6]</sup>畅交灵雨后，浮图<sup>[7]</sup>高插绮云巅。  
雕栏曲曲生香雾，嫩柳纷纷拂画船。二十景中谁最胜，熙春台<sup>[8]</sup>上月初圆。（台  
高耸入云，金碧交辉，汪副使令闻建余为题额）。

#### 其三

溪划双峰<sup>[9]</sup>线栈通，山亭一眺<sup>[10]</sup>尽河东。好来斗茗评泉水，会待围荷受野风。月度重栏香细细，烟环远郭影蒙蒙。莲歌渔唱舟横处，俨在明湖<sup>[11]</sup>碧涨中。（渔洋《冶春词》“邗沟未似明湖好，名士轩头碧涨天”。彼一时也）。

#### 其四

迤邐平冈艳雪明，竹楼小市卖花声<sup>[12]</sup>。红桃水暖春偏好，绿稻香含秋最清<sup>[13]</sup>。合有管弦频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冶春旧调歌残后，独立诗坛试一更。<sup>[14]</sup>

#### 注释：

[1]卢见曾为倡导风雅，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仿王渔洋之所为，修褷红桥，自作七言律诗四首。其时和者达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并绘《虹桥览胜图》以纪其胜。此诗即卢见曾之原作。

[2]阆苑：传说中仙人之居处。此借指苑囿。

[3]“二分”句：化用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诗句。

[4]宸游：帝王之巡游，此指乾隆南巡事。

[5]天章：指帝王的诗文。东头：指皇帝的从官东头供奉官。

[6]潏汊：指水塘和河汊。灵雨：好雨。

[7]浮图：即浮屠，宝塔。

[8]熙春台：位于瘦西湖西岸，与五亭桥遥遥相对，为奉承苑卿汪廷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初建成，正是卢见曾修褷红桥之时。熙春台系为皇帝祝寿所建，嘉庆后毁。1987年扬州市人民政府重建，集楼台亭阁于一体，古朴典雅，饶有皇家园林气派，为瘦西湖内重要景点。“春台明月”：为瘦西湖二十四景之一。

[9]双峰线栈：即“双峰云栈”，为瘦西湖二十四景之一。

[10]山亭一眺：即“山亭野眺”，为瘦西湖二十四景之一。

[11]明湖：济南大明湖。卢见曾为山东人德州，故以大明湖作比。

[12]“迤邐”“竹楼”两句：迤邐，曲折连绵貌。平岗艳雪、竹楼小市，均为瘦西湖二十四景之景点。

[13]“红桃”“绿稻”两句：红桃水暖，即“临水红霞”；绿稻香含，即“绿稻香来”。皆为二十四景中之景点。

[14]“冶春”“独立”两句：意为冶春诗已经不新鲜，该让我辈在诗坛上一

显风流了。冶春旧调，指王渔洋的冶春诗。

### 赏析：

这四首诗，集中体现了卢见曾此刻的心情以及它对红桥盛会的期望。

卢见曾首先赞美的是修葺一新的红桥及其四周美丽的景色，“绿油春水木兰舟，步步亭台邀逗遛”。红桥二十四景的最终落成，卢见曾的心情无疑是激动的，红桥的胜景有了人的心性。它可爱，它招摇，甚至略带张扬，他似乎想要人人都知道自己在扬州的新功绩，他极力推荐景观中的每一处楼亭、每一处台阁，唯恐他人错失美景，希望借由他人“逗留”中观景赋诗，进一步扩大红桥景观和修禊雅集的声名和影响。

新建后的红桥到底是怎样的景象呢？卢见曾也进行了具体的描绘：雨后的红桥烟雾蒙蒙。红桥周围有小山，从山上远眺，又是另外一番情景。游玩至山间，还可以品茗、听风。而到了晚上，月色朦胧，别有一番风味。不同的时节，红桥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到了夜里，这里又是一派歌舞升平。“合有管弦频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虽然是虚写，仍能感受到卢见曾的满意与对红桥景色的期望。

在景色的描绘之中，卢见曾并没有流于空泛，而是将新建或重建的景点，直接写入了诗中。如“熙春台”之“春台月明”，“尽河东”之“山亭远眺”，响起“卖花声”的“竹楼小市”，风景“迤邐”的“平冈艳雪”，……这些出现在红桥二十四景中的地名，直接出现在卢见曾的诗中。很明显，卢见曾修缮红桥景观有其政治目的，但是不可否认，这卢见曾这组诗作的流传和这次红桥修禊的影响，红桥景观中的这些风景也同时得到宣传，并逐渐成为扬州的标志景观。

“莲歌渔唱舟横处，俨在明湖碧涨中”，卢见曾将红桥周边的景色和家乡大明湖畔的景色相联系，莲歌、渔唱、横舟莲花丛中，渔歌声响，俨然是大明湖呈现眼前。而卢氏在第三首诗后的注释中对联系大明湖和红桥之景作出自己的解释：“渔洋《冶春词》：‘邗沟未似明湖好，名士轩头碧涨天’。彼一时也”，他化用王士禛的诗句，将扬州与王士禛的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其深意则在于心底对自己的期许。最后一句“冶春旧调歌残后，格律诗坛试一更”。更是表达了希望自己能够传接渔洋先生的文学传统，并期望诗坛在自己的影响下，能有一个与王士禛匹敌的新变。

为此，卢见曾特别提到了新旧扬州的对比与延续。“重来修禊四经年，熟识

红桥顿改前。”经过修复和重建的红桥景观促进扬州发生了变化，使得扬州旧貌换了新颜，可见变化之大，但他在第一首诗中就强调了他对于扬州文化传统的欣赏和敬重。同时，卢见曾也令新扬州展现出对旧扬州延续与发展的一面。“十里生香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楼台景观确实是新建的，但也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之上的延续。

这组诗虽是酬唱之作，但很好地展现了扬州城经过整修后恍若神宫仙殿的美景，表达了诗人对扬州的热爱之情。诗人与众宾朋在这良辰美景悠游赋诗，人生几何，得遇今夕！其中“十里生香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二句化用唐朝徐凝《忆扬州》中的名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诗句虽是化用，却翻出了新的新意，把扬州的旧貌新颜很好地统一了起来，在读者的心中勾勒出了一个既有深厚的历史意蕴、又有新增景致的扬州。

卢见曾在诗中也写到了红桥修禊主要内容和形式：在诗酒与游乐中进行诗歌唱和。“已憐强酒還斟酌，莫倚能诗漫唱酬。”在一轮一轮的酒宴中，诗歌创作也得以激发。诗人不由地说，且不要因为诗酒太盛就在觥筹交错诗兴大发。实际上，卢见曾对于这种状态非常之满意在觥筹交错中，卢见曾依稀想到了“昨日宸游亲侍从，天意捧出殿东头”这段回忆为卢见曾乾隆皇帝做“宸游亲侍从”的荣耀。这样的回忆，令卢见曾感到无比自豪与荣耀，也令此次的红桥修禊染上了正统的色彩。

诗歌描述了帝王南巡时的扬州新貌和人们兴犹未尽的欢快之情，可谓到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但袁枚对其评价并不高，袁枚《随园诗话》评《虹红修禊诗》曰：“先生原唱，余亦不甚爱诵也。及其致仕，《留别扬州诗》，竟成绝调：真所谓欢愉之词难工，感怆之言多妙耶？”从诗歌本身及袁枚的“不甚爱诵”的否决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修禊诗多是空洞的点缀升平之作。但此次文人雅集唱影响巨大，轰动一时，吸引了全国各地文人们的唱和，客观上传播了文人贤士的诗歌创作艺术及经验，增加了清代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对清中叶诗坛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见曾精通音韵，诗做的最好。红桥四首影响很大，但最能代表他诗作水平的还是那些生活中自我鼓励、展现乐观心态和刚正的品性的诗。

## （二）文

## 《重建竹西亭记》（节选）赏析

卢见曾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主要是卢见曾主持刊刻的各类书籍的书序，一类主要是他资助和主持修建书院、楼堂一类活动的记文，一类主要是他为亲戚知交所作的祭文、行述和墓志。

这些文章主要是为了记述卢见曾个人所参与的具体事件，他以清新的文笔描述宴游雅集的闲适雅趣。任职扬州期间，既是卢见曾致力于主办各类文学活动的时期，也是他诗文创作的高峰期。以描写具体事件为主、兼具记述游玩集会的文章中，《重建竹西亭记》一文具有突出代表性。

在文章开篇部分，卢见曾并未急于交代重建竹西亭的时间和起因，而是铺叙扬州这一处景观名称的由来：

“唐杜牧之诗云“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建亭者之以“竹西”名，盖出于此。宋欧阳文忠公有《竹西亭诗》，苏文忠公诗有《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亭之重于扬州旧矣。”

最初修建此亭并以“竹西”命名，大致应是出自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竹西亭的声名远扬，与随后各自任职扬州的欧阳修和苏轼亦是紧密相关，两位名士在扬期间都留下了与竹西亭相关的诗句。

及至清代，乾隆元年时卢见曾升调扬州任职，受程梦星的邀请同游扬州著名文化景观——平山堂，并与诸多名士相聚于彼处：

“乾隆丙辰，余为都转盐运使驻此，与同年程太史梦星大会名士于平山堂。登蜀冈眺望，问所为竹西亭者，太史为指点于荒烟蔓草间而告余曰：亭不知建于何时何人。宋绍兴间，向子固尝易其名为“歌吹”，燬于火。隆兴间，郡守周淙修之，复旧名。岁久而圯。明神宗时，县令张宁移建于北岸之皂角林侧，未几亦圯。今东望旧刹即古禅智寺，考《古今诗话》，亭盖在其前云。余于时慨然有修复之志。不数月，辄以罪去。”

彼时，经历朝代更迭兴替和遭受战火荼毒的竹西亭，早已毁坏坍塌，不见踪迹。站在蜀冈的平山堂上，只能让程梦星在一片荒烟蔓草之间指出竹西亭的大致位置，并一同追忆竹西亭几经修缮重建、又不断倾圮的多舛命运。

面对眼前的残破之景，卢见曾不住想要修复旧貌。然而世事无常，到任不满一年的卢见曾，因被诬告与高凤翰“植党营私”而被罢官、贬戍军台。等到十三

年后再次回到扬州：

“岁癸酉复转运兹土，太史已与诸同人复亭之旧，为具尊罍，召落成焉。”

竹西亭已经在程梦星的主持下修缮重建，并可以在那里饮酒集会。

“至则泉流竹茂，新亭翼然，前辟埤百尺以仿岷台，后构堂三楹以仿药圃。登斯亭也，遥睇南徐北固诸山，如拱如揖；风帆沙鸟，若即几席；渔响梵音，泅泅入耳。余顾而乐之。”

在原址重建的竹西亭，环境幽雅，景色秀丽：亭前有仿建的岷台，亭后有仿建的药圃；登亭远望，仿佛可以看见北固诸山拱手作揖，看见江帆沙鸟的来去往返。不论是眼前的景观设置，还是遥望的景色想象，呈现出的都是一种祥和静谧之景，犹如“泅泅入耳”的渔歌声响和梵禅诵念之声所带来的平静感、安稳感。于竹西亭上体会到的这一份平静安稳，便是卢见曾于这篇记文中所着意表达的恬静闲适之心绪和状态。

这一切带给卢见曾的感慨，就远不是纪念竹西亭落成这么简单。扬州卢见曾离开的十几年间，经济发展，文化景观呈现复兴的态势。个人际遇的变化，也让卢见曾此时的心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他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抒发感慨，并对为重建的竹西亭作记文的主观原因给予解释：

“余惟人世间一切盛衰隆替，如水容山态，朝夕殊形，其大者莫不然，何有于一亭之兴废哉？虽然地以人传，而非其地之盛，则亦不足以传其人。兹地因樊川之句以为亭，因欧苏之留连于是亭而益重于世。彼易其名与迁其址者，陋也。周程两君子后先辉映其贤乎哉？余抱修亭之愿以去，落成而来，亭不因予成，而予之来适与亭会，余之文不足重斯亭，而亭若有待焉。因不辞而为之记。”

卢见曾借为亭作记的机会，将竹西亭的命运多舛与自身的荣辱兴衰相牵连，以感慨竹西亭千百年来不断继续着既圯既建、几建几圯的命运，来感叹个人仕途贬谪升迁的循环往复，道出世间盛衰相替的不变真理，字里行间已悄然形成了一种物我合一的状态。

此文段落如行云流水之形态，几近一气呵成；这里所引文字，在夹叙夹议中抒发感慨，心中所藏之情与此文前篇所绘之景相互交融，将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喻于竹西亭的兴衰之中，在一片“渔响梵音，泅泅入耳”中留藏深远的蕴藉，需要细致品味才能体会其中的怅然和无奈。

纵观卢见曾的古文写作，只有极少数篇章是一文一事，绝大篇幅的古文创作，都是记述篇名本事和借本事抒发蕴藉的写作模式。这样的创作习惯，也就促使了他的古文创作，具有义正情深和蕴藉深远的特点。

### （三）曲

卢见曾幕府对清代戏曲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幕中的戏曲创作与戏曲刊刻上。卢见曾本人喜爱戏曲，对戏曲人才也很重视，他的幕宾中有不少精通戏曲的人才，如金兆燕、朱乔、程廷柞、金农、郑燮等。他还乐于出资为幕宾刊刻他们的戏曲作品《雅雨堂两种曲》——卢氏幕宾金兆燕的《旗亭记》和朱乔的《玉尺楼》的创作与刊刻就与卢见曾的支持有关。

清代中叶，“传奇”的弊端日益暴露，案头化倾向愈演愈烈，创作与舞台演出严重脱离。但《雅雨堂两种曲》却不入俗流，在创作风格上案头美与场上美并重。尽管它们仍然没有摆脱文人喜用典故、以剧抒怀等窠臼，但这两部戏曲作品都与舞台演出结合得颇为紧密。这两部戏在上演之后分别获得了“满城齐唱谢双畏”和“有井水处莫不知有朱公放”的巨大反响。可见卢见曾幕府戏曲活动在促进清中叶剧坛的戏曲创作与传播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剧本较长，这里只选曲两个有代表性的小片断，做简单赏析。

第三十四出《释疑》，王之涣、谢双鬟都不知皇上赐婚的对方正是心上人，因而双双辞婚。李龟年对王之涣说：

“（末鼓掌大笑介）好笑，好笑！老汉在宫中承应，那郡君正在那里苦苦辞婚。（中略）从前那郡君说他原有丈夫，已是死了，要替他守节，故此辞婚。如今被老汉说明，他丈夫原不曾死，所以就愿嫁了！”

《旗亭记》在曲词和科白的语言上都颇下了一番功夫，尤其善于营造舞台气氛。剧中的人物对话生动鲜活，语言色彩富于个性化，人物性格跃然纸上，矛盾冲突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段里李龟年的科白被眉批评之为“绝世妙文”，其语言技巧类似于今天相声里的“抖包袱”，先埋下伏笔，陡然一转折，最后击中要害，妙趣横生，令人捧腹。

第二十四出《反说》中，谢双鬟游说李猪儿共刺安禄山，有这样一个片段：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旦)你可曾珥貂蝉在禁御过?(丑插摆介)陪过多次的了。(旦)你却姓什么?(丑不语,现旦介)(旦)咳,你本是皇家一姓,却不道叙宗支玉牒,亲锡爵禄皇恩大。(丑弹渭介)(旦)呀,今日里荆棘满铜驼,但有人心的那个不涕泗洒滂沱。(旦丑同泪介)(旦)却怎的腆面求勋佐,还甘心受折磨。羞么,似这般挨鞭撻的凌烟阁。哥哥,倒不如猛拚身得算多!”

这是全剧的一个小高潮,夹白夹唱,极为出彩,由其笔墨不难想见其演出效果。在此处,批语的评价是:“慷慨激昂,加以调笑,不减生花之舌。”谢双鬟的话,看似信口笑谈,却句句切中肯綮,紧紧揪住了李猪儿的心。她从眼前谈起,在李猪儿得意洋洋的“摇摆”中当头浇下一盆凉水,让他蓦地记起自己的本姓和昔日皇上的恩情,李猪儿不禁落下泪来。谢双鬟仍不罢休,引他进一步思考自己寄人篱下、国家哀鸿遍野的惨状,而罪魁祸首正是李猪儿如今的上司安禄山。想到这里,李猪儿震撼了,谢双鬟也激愤了。两人抱头痛哭,这一刻,谢双鬟说出“倒不如猛拚身得算多”,游说的最关键一步来得顺理成章。层层深入,环环紧扣,直追主题,却又不乏幽默。语言之精辟,情绪之跌宕,令人拍案叫绝。

《旗亭记》的上演成功是有史可考的。作品创作于“花雅争胜”时期的扬州剧坛,新剧演出相当频繁,因此,作品的创作必须适应场上表演。《旗亭记》的场上效果经历了舞台实践的考验,并得到了历史的充分肯定。

### 参考文献:

[1]王守栋.德州卢氏家族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34-38页,第77-81页,第87-100页.

[2]王守栋.德水耆英——卢见曾.[M].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93-104页,第195-291页.

[3]俞映红.卢见曾在扬时期的文学活动.[D].浙江金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34页.

[4]王连琦.卢见曾在扬州的文学活动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75-76页.

[5]唐雅君.卢见曾研究三题.[D].江苏扬州:扬州大学.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45页

[6]鲍开恺.卢见曾幕府戏曲活动考述.[D].南京: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

期.第 29 页.

# 宋哲元

## 一、生平简介

宋哲元(公元 1885 年-1940 年)，字明轩，山东省武定府乐陵县（今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1885 年 10 月 30 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廿三日），宋哲元出生在乐陵西北城关镇赵洪都村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庭，自幼勤奋好学，7 岁开始识字，在父亲、舅父指导下熟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14 岁随父在京读书，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及诸葛亮、岳飞等帝王将相的传记也多有涉猎，从而萌发了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志向。直到 1900 年秋天，在北京的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宋哲元被迫避难返乡。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感受到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与耻辱，报国御侮、保国为民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此扎根在心中。

1906 年，宋哲元投笔从戎，考入北洋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在这里，宋哲元受到了规范的军事训练。由于他体格强健，吃苦耐劳，加上有一定的习武基础，又有相当的文化根底，他的学业十分出众，军事科目训练中，成绩优异。1908 年从军，追随西北军冯玉祥，历任哨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方面军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军职，1925 年至 1935 年先后任陕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辖热河、察哈尔、河北三省，北平、天津两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集军政要职于一身，有一定政治影响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1930 年，蒋、阎、桂、冯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宋哲元率余部退往晋南，负责北方军事善后的张学良将其改编，该部缩编为陆军第 3 军，下辖 3 个师，宋哲元任军长，归东北军序列。

1931 年 6 月，宋哲元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自此，宋哲元的名字与命运，便紧紧地与二十九军联系在一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三省，热河告急，天津震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醒了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日民族意识，同时也为宋哲元摆脱困境，在民族抗争的洪流中寻求

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率部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宋哲元率同部下七名将领请缨抗日，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1933年，长城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响后，二十九军战士组成敢死队，发挥大刀的威力，以夜战、近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五千余人，力挫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本报纸宣称：“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天津《益世报》还以《喜峰口的英雄》为题发表评论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激励。信中写道：“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引自人民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

1937年7月7日夜，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向二十九军守军官兵发出了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誓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全歼日军一百余人。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觉醒，二十九军爱国将士无愧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先锋，用鲜血谱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

7月28日拂晓，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突然进攻南苑，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率部奋勇抗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激战中不幸阵亡，5000多名守军壮烈殉国。宋哲元惊闻噩耗失声痛哭道：“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

平津沦陷后，宋哲元因心情郁闷，过度劳累，患上了肾病，但他一直在前线领导战斗，随着病情加重，两腿肿胀，鞋不能完全穿上。1938年9月宋哲元肝病复发，后又患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宋哲元卸职养病期间，时时思念旧部，尤为怀念为国牺牲的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他入南岳后，于1938年10月，在衡山半山风景秀丽的明镜台侧建造“双忠亭”，并亲自为两位将军用毛笔题写了碑铭。

1940年3月26日，宋哲元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宋哲元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报国素志”，筹划抗日大计，再次勸勉旧部诸将“努力破敌”，并坚信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操胜券”。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

宋哲元逝世后，举国震惊。以其英勇抗战，功勋卓著，政府与人民，国共两党、军政两界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平生事迹宣付国史，追赠一级上将”，并复令秦德纯奔赴绵阳主持治丧。四月十七日，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治丧期间，收到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抗日部队指挥官，中国共产党及全国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宋旧部及亲属挽幛、祭文、挽诗、挽联数百幅。其中，蒋介石亲笔题写了挽联：“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恸元良。”周恩来挽曰：“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朱德、彭德怀挽曰：“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文化大革命”中，宋哲元陵墓一度遭到破坏，当地群众将棺木转移暗藏在崖洞，一直保存了十年。1979年3月，宋哲元陵墓重修完成。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宋哲元为抗日爱国将领。

198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及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政协礼堂隆重纪念“七七”事变爆发五十周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卢沟桥畔落成，邓小平题写了馆名，万里、王震为纪念碑剪彩揭幕。纪念馆内陈列有宋哲元使用过的指挥刀和一些抗战图片、实物等，纪念馆现已被国家定为爱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2002年，宋哲元的故乡山东省乐陵市为他立了铜像。

2005年9月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赠予宋哲元亲属抗日英雄纪念章。

## 二、主要成就

### （一）兴利除弊 为民造福

1925年8月，步入不惑之年的宋哲元受命担任热河都统，开始执掌地方政权。尽管在热河主政仅仅半年的时间，但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兴利除弊，为民造福，收到一定实效，成为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枪。1926年4月，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市民夹道相送。人们纷纷对宋哲元说：“宋将军来，我们得以安卧枕席。现在将军离去，我们又要陷入水火之中了。”沿路每至一镇，均有民众夹道挽留。

### （二）投身北伐 抗日救亡

1926年宋哲元任国民军北路总指挥、西路总司令，先后在南口、多伦等地指挥所部对直奉联军和晋军作战。1926年9月17日，参加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大会，冯玉祥会上宣布国民联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自此，宋哲元成为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员，正式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踏上了人生的新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明确宣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1933年元旦，日军攻榆关，热河危急。

2月18日宋哲元通电全国，决心抗击日军，奉命开赴北平附近参加长城抗战，任第三军团总指挥，防守冀东。

3月4日承德失守，长城告急，第二十九军奉命紧急增援喜峰口，组500名擅长刀术与近身肉搏的士兵组成大刀队，于晚间向敌仰攻，登上日军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军砍毙，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这种超出日军预计的夜袭，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计划，给日军造成惨重的损失。次日，日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

攻。29 军主力部队亦相继抵达。赵登禹率部伏于峰峦幽僻处，待敌兵临近战壕数十米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给敌人以重创。同日，中央军关麟征部开抵古北口，官兵们舍身忘我，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第十六旅团的进攻。11 日晚，赵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 18 门，烧其辎重粮秣。经过几天战斗，古北口方面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轮番上阵，遭受重大伤亡，12 日退守南天门阵地。而喜峰口方面，日军虽多次进攻，终未得逞，14 日后撤至半壁山。其后，日军在罗文峪、冷口分别发动过几次进攻，均遭守军抵御而未达目的。

自“九一八”鬼子侵占东三省以来，这是日军受到的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军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挽回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

3 月 15 日喜峰口敌军被迫后撤，“喜峰口抗战大捷”的战绩轰动了全国，宋哲元特意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幅条幅，立即被多家报纸制版刊载，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16 日喜峰口日军袭罗文峪，二十九军再战罗文峪，17 日罗文峪日军受挫，19 日罗文峪激战再起，宋哲元到保定谒蒋介石，20 日北返，21 日喜峰口继续激战，25 日喜峰口宋哲元军克复半壁山。

4 月 7 日宋哲元电辞察哈尔省府主席，8 日中央慰留，宋赴天津。11 日冷口及建昌营失守，喜峰口敌南侵，第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13 日第二十九军奉命撤出阵地。14 日喜峰口敌攻滦阳，宋哲元军苦战，17 日喜峰口日军进犯撒河桥，22 日宋哲元自北平赴遵化前线，24 日宋哲元部收复滦阳，日军撤出喜峰口，长城抗战结束，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宋哲元等将领成为抗日英雄。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不由地起立鼓掌。1935 年宋哲元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

1937 年，作曲家麦新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响全中国。

宋哲元在华北艰难维持，在日寇猖獗、东北沦陷、南京默然、二十九军兵力不足的严峻形势下坚持民族大义，终于打响抗战第一枪，功不可没。以喜峰口大捷、卢沟桥奋起抵抗日军而彪炳史册。

### 三、“德能”思想

一代爱国名将宋哲元，敦厚沉毅、处世谨慎，生活简朴、尊重文化，治军严谨，作战勇敢，为西北军五虎之一，冯玉祥对他赏识有加，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在宋哲元的身上，既有齐鲁文化赋予的质朴内敛，也有燕赵文化赋予的慷慨豪放，既人品高尚又才能出众，无愧德州这方水土养育的杰出人物。

#### （一）家国情怀 贯穿始终

宋哲元自幼随父当书童，受到极为严格的经史教育，儒家的家国观念铭刻于心，贯穿一生。自幼熟读儒家基本典籍，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也培养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厚感情。后来他一贯主张“维持中国固有道德以救国”，“为保存中华民族精神”而决一死战，其渊源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结果，正因为他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才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责任走向了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败，宋哲元反思，正是因为打内战才导致西北军的失败，所以，1931年6月，在他成为二十九军军长后，提出了新军队的原则：“从此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宋将军即率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蒋介石想要调动宋哲元去富庶的安徽，让他去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明白是为了让他去围剿红军，这与他的新理念不符，便拒绝这次发财的机会，带领军队去了贫瘠的察哈尔。他领导的二十九军从未攻打过红军。

宋哲元还主动联络中国共产党，寻求联合抗日。1936年七八月间，宋哲元遣其副官刘子青转赴陕西保安会见毛泽东主席，听取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局势和未来前途的看法，毛主席于8月14日写信给宋哲元，表示对宋将军的抗日决心极为钦佩，愿以全力支持宋将军。彼时蒋介石正命令张学良东北军全力围剿红军，中共处境极为危急，前途未知。而宋哲元却敢于主动联共，派人去与中国共产党联络合作。一个国民党的高官大员，有如此胆识卓见实为难得！

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进攻河北、热河长城一线，宋哲元奉命率部迎敌。开赴战场之前，宋哲元手书“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鼓舞将士慷慨赴死，抗日杀敌。二十九军大刀队血战日军，取得喜峰口大捷，名扬全国，大刀队勇士挥舞大刀的形象，也成为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精神鼓舞。直到最后一刻，重病的宋哲元口中放不下的仍是“抗战”，可谓报国御侮，矢志不渝。

宋哲元希望宋氏家族的后代也永远爱国，为祖上争光。为家族定下了十六字家训：“兴华立宗，修德克昌，诚真正平，万世永光。”这十六字家训，在今天看来都毫无不当之处，仍然符合时代的要求，值得后人延续传承。

## （二）爱民敬民 “贵民”主政

宋哲元在治理地方上也颇有建树，他提出了“民为贵”的主政思想。

宋哲元年少时家境窘困，艰难度日，几无立锥之地，父亲又遭文字狱之祸，只能靠教书的微薄收入外出谋生，所以他深知民间疾苦。从军从政之后，他曾经在陕西、京津冀等多地担任过地方军政长官。

任热河都统时，宋哲元为发展经济，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修建公路，以利交通，皆见敷施”。为改善民生，曾在承德避暑山庄办过蚕蜂学校推广养蜂，还亲自与士兵一起种下一片桑林以供百姓养蚕缫丝。

任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时，改良民俗，清正民风。厉行禁烟，将收缴的鸦片当众悉数焚毁。在各地筹办残疾人救济所及养老院，以养成尊敬老人，救济残疾的社会风气。曾提倡妇女放足，规定“三十岁以下之妇女，强迫解放，违则处罚；三十一岁至四十岁者，惟强迫其解放，而不处罚；四十岁以上者，劝导解放，不加强迫”，以示区别，破除封建陋习。曾亲笔手书“民为贵”三字，并刻石于西安小碑林，表达并警醒自己时刻怀有爱民敬民之心。

在晋南练兵时，全军检阅时他大声问：“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齐答：“是老百姓的军队。”“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是从乡间来的。”“你们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都是老百姓。”“你们吃的、穿的、用的武器，是什么人给你们的？”“是老百姓供给的。”用这种家常式的问答方法来熏陶士兵不忘父母，不忘乡亲，不忘百姓。

## （三）重情重义 朴实孝敬

宋哲元平素不爱说话，重情重义，对朋友和部下都很好，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很忠厚。

喜峰口抗战时，500大刀勇士中有个叫侯万山的班长临行前向宋哲元托孤，“我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如果我这次殉国了，孤儿寡母求军长体恤，我死也瞑目了。”宋哲元听了以后，郑重地对侯万山说：“你放心去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向宋哲元敬了一个军礼，侯万山头也不回赶赴前线。这一役，侯万山不幸壮烈殉国。身边战友回忆，侯挥舞大刀连续砍倒了3个日军，直到大刀全部卷刃无法再用，才中弹牺牲。

之后，宋哲元果然把侯万山夫人生下的双胞胎认做亲子，并且带回宋家交给妻子抚养。宋哲元给二人取名为宋纪峰和宋纪峪，以纪念其父在喜峰口罗文峪的牺牲。宋哲元的女儿回忆，宋对于这两个孩子如同亲生孩子，和他们的待遇完全一样。到了二人18岁成年的时候，宋家出于对侯万山的尊敬，又让其恢复了侯姓。

就个人生活作风来说，宋哲元不抽烟不打牌连茶水也很少喝，业余时间多写毛笔字自娱。宋哲元的衣食住行都很简单，平时只穿粗布军服，吃饭也不刻意讲究。日常起居睡行军床、住军营、和连长营长没什么区别。即便之后飞黄腾达，宋哲元也是不在意吃穿，仅仅因为经常要见高级客人，才将军服换为一套黑缎子长袍马褂。宋哲元自己生活简朴，也很讨厌家人奢侈。宋哲元的两个女儿在家里从不穿花花绿绿的衣服。宋哲元成为29军领袖以后，南京的一些高官为了讨好宋，让自己的妻子从上海租界买了一些高档的名牌高跟鞋、连衣裙、旗袍、化妆品等送给宋家的太太和女儿。宋哲元的女儿回忆，他们从小生活简朴，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见过，惊奇得不得了，还误把口红当成了绘画笔。宋哲元收到这些却非常不悦，根本不让太太和女儿用，转手送给了负伤的军官家眷作为慰劳。

宋哲元既是国之干将，更是家之孝子。他一直将母亲带在身边服侍，每次出门时，都要来到母亲的房间，向母亲磕头告别，郑重地说一句：“娘，我要出门了”，每次回来时，先到母亲房间，说一句“娘，我回来了”。在灌县养病期间，年近八旬的老母困于津门，他朝思暮念，常怀忧伤。一天游青城山时，喜得一墨竹，便为老母刻一手杖，刻己乳名“湿”于上，作诗一首：“前岁辞亲日，中原

板荡秋。敢轻离老母，无奈赋同仇。但愿常服侍，羞看此杖头。待儿归去后，常伴我娘游。”

#### （四）重视教育 保护文物

宋哲元年轻时具有从教的经历，一向重视教育。宋哲元在出任陕西省主席时，曾就兴办平民及义务教育，向教育厅长和各县县长发出训令，还训促富户集资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他的教育思想，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其要旨在于爱国、救国、强国。

1927年12月，在教育厅长联合举行的省立学校毕业演说辞中，宋哲元要求，毕业学生“万万不要忘了国家，不要忘了父母”。为此，他又要求毕业生“第一，要尊重礼教，第二，要为国家服务”，“为国家服务呢，就是要先爱国，合起四万万同胞的思想能力来爱一国，国家焉得不强盛，在地球上总可占第一等强国之地位。”

宋哲元又鼓励他们说“诸生学成而归，正是青年有为的时候，这个救国救民的责任应该担在肩上，务要努力前进，以求达革命之主义”。宋哲元还在毕业的训词当中，阐述了他对教育与立国关系的一个看法，他说：“哲元军人也，对于学术素乏专长。惟深知世界竞争，纯视教育之废兴，定国家之隆替。吾国今日贫弱极矣。列强窥伺于外，军阀捣乱于内，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一线希望，惟在莘莘学子”。

宋哲元还非常注重保护文化遗产。西安为周、秦、汉、唐各代都城，宫殿、古刹、陵墓等古迹颇多，而盛唐时期，尤为文人汇集之地，碑铭石刻向为全国之冠。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加以匪盗明抢暗窃，使得这些珍贵国宝，特别是大小雁塔及被誉为天下金石渊藪的陕西碑林，都遭到严重的践踏和损毁。他主陕后，看到这些极为痛心。为了挽救和保存祖国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他除严令禁毁外，还筹措专款，请名匠对碑林进行修葺整理，将所有碑刻凹字油饰一新，并加固碑基，重新排列整齐，使不少罕贵断残古碑得以保全，从而恢复了碑林圣地的壮观。他还派专人搜集散佚在民间的石刻碑碣以及历史名人的诗词文赋、书法真迹、勒石碑刻等，于大碑林外新城省府后院一块古陨石周围，建立了小碑林。

此外，1936年，屯驻北平期间，他还曾吁请当代书法家，以其代表作各刻一石，置于北平天坛，拟立碑林。事后已刻成百余石，但工未竣而抗战爆发，这些碑刻竟被入侵的日军用作建筑材料，相继散失。

### （五）治军严谨 练兵有方

西北军号称中国军阀部队的前三强（西北军，桂军，湘军），强悍的战斗力来自于严格的训练。1918年，冯玉祥担任常德镇守使，时任营长的宋哲元部练兵为全军第一。宋哲元和士兵一起训练跑步，所有要求士兵的训练项目，宋都做到首先自己达标。1922年，冯玉祥又在北平南苑大练兵。旅长宋哲元部的训练水平，又是全军数一数二的，受到冯玉祥再三嘉奖。

严格的训练，让宋哲元的部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成为西北军最厉害的杀手锏，也为西北军立下重大战功。讨伐复辟闹剧的张勋时，宋哲元率领自己的营一马当先，首先攻入北京右安门，击溃张的辫子兵，张勋丢下部队狼狈逃亡。攻打皖系军阀陈树藩时，宋哲元的营也首先攻入陕西的东面门户潼关。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西北军同归属奉军的河南督军赵倜于郑州激战，又是宋哲元的一个团作为急先锋，同赵军激战七天七夜，终于将其击溃。冯玉祥由此当上河南督军。

宋哲元因领导过多次战役，有丰富的作战及练兵经验。在二十九军，特别重视体能与射击。值得一提的是宋哲元自幼习武，据家人回忆，他健步如飞，走路速度极快。为加强部队机动力，他就训练部队“飞毛腿”，最高纪录可以日夜不休，行军90公里。

宋哲元的军事谋略和应变能力也非常惊人。在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正面火力根本无法和日军对抗，装备明显处于劣势，身在后方的宋哲元果断决定用大刀队进行夜袭。当时很多军官认为，二十九军白天作战用尽全力还守不住阵地，哪有余力夜袭。况且日军火力过于强大，这岂不是鸡蛋碰石头，徒遭伤亡而已，是宋哲元不了解前线的战况。宋哲元却力排众议，命令夜袭。事实证明，日军夜战能力一般，大刀队攻击是以我方的优势攻击日军的劣势，自然获得相当好的效果。

宋哲元不断使用大刀队夜袭反攻，连续重创日军。夜袭都是近战，而二十九军由于装备低劣，连最基本的刺刀都有很大缺口，被迫采用粗劣但容易制造的大刀片代替刺刀。好在宋哲元的部队一向训练严格，加上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给日

军造成惨重伤亡，尤其日军死于大刀下的不在少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为了对抗大刀砍脖子，日军甚至发明了铁围脖，这让日军高层非常震怒和羞愧。

### （六）歌曲练兵 激励精神

抗战全面爆发前，宋哲元率领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驻扎在冀察平津一带。面对日军日益暴露的侵略态势，宋哲元一面不断扩充二十九军的实力，一面加紧训练将士。

在西北军时期，冯玉祥在组织士兵训练时，针对当时新兵以青年农民为主力、文化水平低的现实，采用“歌唱之易于感人与记诵”的方法来普及军事知识和其他知识。早在追随冯玉祥的时期，宋哲元便完全掌握了冯玉祥总结出的这套“歌曲练兵方法”。执掌二十九军后，他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加以发扬和改进，将“歌曲练兵方法”发展为二十九军的特色之一。

1936年年底，宋哲元在北平南苑设立军事训练团，学期为3年，编有3个大队，第一、第二大队为步兵，第三大队为特种兵(骑、炮、工、化)。这个军训团的干部几乎全是二十九军的骨干，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军训团除唱《二十九军军歌》外，还要唱《军训团团歌》，因为团歌言简意赅、使人奋进，唱起歌会增强抗日救亡的信心，所以深受团员们的喜爱。《团歌》歌词是：

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厉精神，诚真正平树本根。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

此外，军训团团员还需学唱《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形地物歌》这三大军歌，这三首歌对于学员迅速记牢训练动作要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宋哲元更奋笔疾书，于8月18日写成《杀敌救国歌》一首，以唤起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敌、保家卫国的斗志：

中国要自强，齐心到战场。杀尽日本兵，铲除狗豺狼。自从九一八，寻衅在沈阳，占了东三省，热河也遭殃，强占我平津，又往上海闯，进扰我南口，察北亦披猖，得寸又进尺，要把中国亡。同胞须奋起，人人都抵抗。

宋哲元还编有《国耻歌》，每逢9月18日“国耻日”，都要举行演讲会，并在官兵吃的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让每个官兵铭心刻骨，不忘国难家仇，以期洗雪国耻。

二十九军官兵在这些歌曲的熏陶下，勤学苦练各种战斗技能，在全面抗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官兵的文化素养，也得到了潜移默化的提高。

在帝国主义欺凌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今天，缅怀宋哲元将军的爱国业绩，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四、作品赏析

### （一）八德歌

(孝)父天母地孝敬礼当先，养育之恩重如山，怀抱三年整，移湿又就干<sup>1</sup>，不孝双亲禽兽一般。

(悌)弟恭兄友<sup>2</sup>家庭乐陶然，同气连枝<sup>3</sup>莫相残，弟弟要恭敬，哥哥也要宽，孔融让梨传为美谈。

(忠)圣人之道忠孝列第一，诚诚恳恳最为宜，人事若己事，不屈又不移，人人效忠国治家齐<sup>4</sup>。

(信)言而有信为当务之急，三尺童子不可欺，言行能相顾，感化到蛮夷，人而无信大车无輹<sup>5</sup>。

(礼)言笑不苟衣服要整齐，举动从容气安稳，处己务严肃，待人须恭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义)关公扶汉义气贯千古，夜读春秋古今无，桃园三结义，始终如手足，曹操奸雄他都敬服。

(廉)非己之财立志莫去贪，廉洁自爱理当然，杨震有四知<sup>6</sup>，岳侯不爱钱<sup>7</sup>，见利思义方是奇男。

(耻)圣人垂教耻字关紧要，知耻有勇志气浩，能耻不若人，圣贤不难学，立身处世<sup>8</sup>以此为高。

### （二）杀敌救国歌

中国要自强，齐心到战场。杀尽日本兵，铲除狗豺狼。自从九一八，寻衅在沈阳，占了东三省，热河也遭殃，强占我平津，又往上海闯，进扰我南口，察北亦披猖<sup>9</sup>，得寸又进尺，要把中国亡。同胞须奋起，人人都抵抗。

国人要认清，日寇太蛮横，经过城乡镇，钱粮抢一空，奸淫人妇女，残杀人弟兄。有敌就无我，两者不相容。中华好男儿，为国应尽忠。同胞雪此耻，个个向前冲，杀一日本兵，心中还不平，要杀便杀尽，方能算成功。

同胞要认真，救国莫因循<sup>10</sup>。国破家亦破，国存家始存。无论前后方，责任不可分。或者出人力，帮助杀敌人。或者出物力，接济我国军。国家有决心，人民不怕拼。我们全中国，大家同一心。打退敌人后，幸福自来临。

大家倾耳听，国军已进攻。同胞都奋起，个个逞威风。枪击敌飞机，人人都能成。奋勇夺敌炮，紧追不放松。破坏坦克车，要用炸弹崩。有进绝无退，努力向前冲。日本必然败，中国一定胜。打回老家去，宁死也光荣。

### 注释：

1 移湿就干：推干就湿，汉语成语，意思是形容抚育孩子的辛劳。出自明徐田臣《杀狗记·孙荣奠基》。

2 弟恭兄友：兄友弟恭，哥哥对弟弟友爱，弟弟对哥哥恭敬。形容兄弟间互爱互敬。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3 同气连枝：比喻同胞的兄弟姐妹。出自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

4 国治家齐：“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谚语，意思是自己品德好才能治理好家，家业兴旺才能治理好国家。出自《礼记·大学》。

5 大车无輹：輹（ní），大车辕端与衡相接的部分。大车无輹指车子没有輹，则无法前行。比喻若言而无信，则无法取信于人，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出自《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

6 杨震四知：就是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出自《后汉书·杨震传》：“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

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又《传赞》：“震畏四知。”后多用为廉洁自持、不受非义馈赠的典故。

7 岳侯不爱钱：出自《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岳飞传》记载：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8 立身处世：指做人和在社会上待人接物的种种活动。也说立身行事。出自元代《沙弥十戒法并威仪序》：“夫乾坤覆载；以人为贵；立身处理；以礼仪为束。”

9 披猖：亦作“披昌”。猖獗，猖狂。

10 因循：拖延。

### 赏析：

军歌是军队的精神象征。这两首军歌，体现了不同时期宋哲元对二十九军的教育与激励。只有了解它背后的故事，诞生于怎样的时局，才能更好地理解它涵养教化的功能。

第一首歌词的亮点在于语言古雅，用典精当，几乎每句歌词都有丰富的典故，富有感染力。

1936年，在日寇步步紧逼，亡国危机日益严重的影响下，二十九军全体官兵的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而直接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亲身感受同胞惨遭蹂躏的中下级军官更有一种炽热的守土抗战的责任感，这种抗日的热情蕴含着抗日的行动。宋哲元不失时机地教育和激励二十九军将士，希望他们升华自己，真正成为有良知的中国国民，成为有觉悟的中国军人。

当年旧军队的士兵文化素质都较低，宋哲元却做过教书先生，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为了加强部队的文化修养，宋哲元于1936年10月20日亲自颁发了《八德歌》，号召官兵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广泛发扬“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传统“八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创造，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元素，历经数千年沉淀与凝结，深深影响了每一位炎黄子孙。宋哲元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来激励士兵，真诚地为国家服务，为民族争光。

正是唱着这首歌的二十九军，能不惧怕日寇占优势的飞机坦克，拥有敢战敢胜的信心，能够齐心协力、精神昂扬奋勇杀敌，舍小我成大我，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二十九军在卢沟桥抗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上写下一页又一页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成为抗战时期最有血性的部队。

随着日军的不断南侵，形势日趋恶化，二十九军以更积极的姿态认真备战。1937年7月底，日寇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为了灭亡中国，日寇紧接着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南口战役为中日战争早期的平绥铁路沿线作战之一，地点是在当时昌平周边居庸关的南口一带。发生时间则是1937年8月8日至8月26日。

第二首《杀敌救国歌》创作于这一时期，宋哲元目睹山河破碎，愤懑交加，通过《杀敌救国歌》唤醒同胞，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面对凶恶的侵略者，奋起抗战，保家卫国。歌词语言淳朴简练，自带一往无前的气势，我们仿佛看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日疆场，奔赴前线的战士的雄姿，奋勇杀敌的矫健身影。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高度的责任感，军人的血性与自醒。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企图控制整个华北地区，由此将目光投向了南口。为何南口这个地方，如此重要呢？

其实，南口距离北平城不远，大约45公里。一方面，南口此地经居庸关往西，可以直达宣化、张家口，平绥铁路横贯其中，成为连接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南口的南北两侧便是内外长城，山上仅有羊肠小道能够通行，所以南口此地可谓是天险、易守难攻。

日军也看到南口的战略重要性，在1937年8月初，出动7万军队扑向南口。整个战役持续了18天，进行到尾声时，战况已经相当惨烈。除了比我军先进的武器外，日军还出动了飞机和坦克。试想，在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坦克几乎就是一个无敌的存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贴身打，这就少不了巨大的牺牲！

没办法，战士纷纷发起冲锋，向坦克冲去，往坦克里丢手榴弹、或者用手枪往里面打。虽然将士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也缴获了6辆坦克。最后，中国军队伤亡3.3万人，歼敌1.5万人，虽然南口还是失守了，但是我们用18天浴血奋战的时间，彻底击垮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可笑计划。

懂得了这首军歌的创作背景，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充满尊严的顽强抗争，我们的民族经过多少风雨，走过多少的逆境，挺过多少的失败才来到了今天，才会更加珍惜和平与安宁。

### 参考文献：

1. 陈世松. 《宋哲元传》. 吉林: 文史出版社. 1992年7月。
2. 张立新. 《宋哲元年谱》. 北京: 线装书局. 2012年11月。
3. 侯中军《战略与策略的平衡抉择：再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4. 黄黎. 《国共双方对宋哲元抗日转向的推动》. 北京: 《北京党史》2015（3）。
5. 赵秀宁. 《再论七七事变中的第29军与宋哲元》. 北京: 《军事历史研究》. 2017年03期。
6. 贾晓明. 《宋哲元的“歌曲练兵法”》. 《人民政协报》. 2015年9月10日。
7. 陈政祥. 《宋哲元对二十九军的激励》. 山东菏泽: 《菏泽学院学报》. 2013年S1期。

# 任继愈

## 一、生平简介

任继愈（1916. 4. 15-2009. 7. 11），字又之，其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现代哲学家、宗教学家。山东省平原县北任庄人。先后入天津南洋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

他治学勤奋，造诣深厚，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哲学研究人才，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人才难得”<sup>11</sup>。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学术论著百余种，主持《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多项重大文化工程。

### 小荷才露尖尖角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中等家庭。任家祖上曾经也属殷实富裕之家，但任继愈祖父在和几个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败，而致家道中落。任继愈的父亲任箫亭出于经济考虑，报考了费用较低的保定军官学校，后来官至少将，但由于生性耿直，不畏权贵，一直被国民党嫡系部队视为“异己”。1954年，他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到张自忠的部队，参加了抵御日军的“老河口战役”<sup>12</sup>，之后转任参议闲职。任氏家族，四代同堂，是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后来任继愈一家搬离大家族，任父远在外地从军，任母独自担负起家庭重担。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平日非常严格、节俭的母亲，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她将孩子送去学堂读书，孩子们需要购买的报纸书籍，她也从不犹豫。

由于在小学打下的良好基础，且坚持着认真专一的读书态度，任继愈的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喜欢读书，喜欢文学，喜欢那些让人默默深思、频频颌首的哲理和道理。任继愈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三年学习生活，对他的性格、阅历和知识的培养历练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也坚定地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目标。1934年，他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期间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等哲学研究大家，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打下了良

---

<sup>11</sup>毛泽东：《毛泽东文集》中“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sup>12</sup>老河口战役，1945年1月29日，驻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部下达了老河口作战命令。日军获胜，老河口沦陷。

好的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北平成了边城。在当时严酷的时局和动荡的生活、学习中，任继愈更加理解了古代圣人、哲人、贤人，无不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他更加理解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而要研究哲学，就必须和积贫积弱的国家结合起来，和探究贫苦大众的出路结合起来。哲学不是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是活着的文化。然而，还未等他学成毕业，日军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进攻北平。从1937年6月开始，驻丰台日军经常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制造战争气氛。国难当头，任继愈等一众学生奔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西迁的北大、清华、南开3所高校组成的临时大学），他用脚步丈量中国西南的国情，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使他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他治学的出发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sup>13</sup>

1941年，任继愈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并选择留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这里学习和工作，度过了长达七八年的青春时光。

### 激昂岁月挥斥方遒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继愈与夫人冯钟芸也已经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大。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在西山的夕阳剪影，成为他们一生魂绕梦牵的精神家园。

崭新的生活画卷在任继愈面前展开，欣喜之余，他开始对这幅画卷进行如痴如醉的研读。不料想，不久之后，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破灭。

内战再次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任继愈在沙滩红楼虽有一间住房兼书房，却也读不下书去。那个时期，任继愈说他感觉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方面，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他的心情一直比较苦闷，直到解放后才有所好转。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一个包围圈。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南苑机场，专程接胡适等一批高等学府文化学者。偌大的总统

---

<sup>13</sup> 任继愈：《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

号，接走了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任继愈与众多老师——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郑天挺、沈钧儒、张岱年等，均毫不动摇，满怀希望的心情，留在了北平。他们和欢欣鼓舞的人们共同迎来了北平解放，一同度过了一个个兴奋狂欢、令人鼓舞的日子。

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正赶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再加上清华文科的加盟，当时的北大可谓群英荟萃，俨然西南联大文科力量的大本营。

从 1942 年到 1964 年，任继愈任教于北大哲学系，先后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当时的学术环境，正如风光旖旎的燕园一样，令人赏心悦目。知识分子如同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仿佛脱掉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春装，浑身也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让任继愈不由得陶醉其中。这时候，他心中想到的是北大图书馆中的满架图书，借着书香墨迹，脑中萦绕的是乘着大好时光，像自己西南联大那些无私无畏的老师一样，为国家、为北大多尽绵力的理想。

1956 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中共中央决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很多人都在那时入了党，任继愈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为新中国奉献、为人民服务成为他们的信念。也是从那年起，任继愈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 星光不负赶路人

1963 年，周恩来总理向中央呈报了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提出中国国际地位在提高，国际上重视研究中国，我们也应当了解外国，建立一些研究所。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了这份文件。196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众多研究所里，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任继愈主持筹备并一直担任领导工作。研究所当时设在北京大学，时年 48 岁的任继愈出任所长。工作开展以后，研究所又办了一个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sup>14</sup>，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任继愈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宗教研

---

<sup>14</sup>《世界宗教研究》创刊于 1979 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宗教学专业学术刊物。

研究所的同事们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1978年研究所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事实上，当前国内宗教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们，大多都是出自世界宗教研究所，而且他们在各方面的研究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成绩。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繁荣发展也表明了任继愈为我国宗教研究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任继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已经工作了20多年。同年，任继愈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被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从此坐拥书城，传播知识与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这一年，任继愈71岁。

任继愈待人诚恳和蔼，对待学术问题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正是因为他这种勤恳朴实的学风、真诚谦卑的为人态度，他一生获得了许多人的高度赞扬与认可，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尤其高。1987年至2005年，任继愈任国图馆长期间，始终作为学术界代表，研究宗教学、哲学，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他还曾当选第四届至第八届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 二、主要成就

### 其佛教研究成就凤毛麟角

任继愈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的一代宗师，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他精于学问，不攀龙附凤，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实事求是、正直谦虚的节操。他一辈子以国家社会需要为己认，无论在治学、教学，还是执掌国家图书馆的各个领域，均有重要贡献。

任继愈是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sup>15</sup>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开此先河，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继之，随后

---

<sup>15</sup>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又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哲学界纷纷开始服膺马克思主义。上个世纪中国的哲学大家冯友兰、张岱年都曾经多次修改自己的著作以适应环境，冯友兰重写了 7 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从唯心唯物对立的角度，对之前的《自序》进行了语气严厉的批判。任继愈与这两位前辈均有亲谊，而且均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但相对来说，任继愈的学术观点却自成体系。

任继愈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逐渐摸索出一条以释、道、儒三教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由此，他走出了一条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任继愈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宗教问题的先河。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几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他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2000 多年独立发展，独具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举出以下几种特点和品格：不失自我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应变性、取之有节的开发性、刚柔并济的进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但最突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善于吸收一切有价值的外来文化，融入固有文化主流，不断发展，几千年沿着既定方向，走着自己的思想体系、思维模式来迎接外来文化的。后来的儒佛道三教会同，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圆融无碍、海纳百川的特点。研究佛教不知不觉与儒、道两家会合；研究儒教又必然与佛、道两家贯通；研究道教又必然与儒、佛两家相会。

正是在唯物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任继愈从新中国建国之初开始，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重新建立中国哲学史的论述体系。20 世纪 50 年代，任继愈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任继愈和他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后来便有了在中南海与任继愈一席长谈的佳话。任继愈是最早为毛泽东所注意到的哲学史家，他的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 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

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 提出“儒学是宗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人们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了很久，而抛出这个问题的人恰巧是任继愈，正是由于他的“儒教是宗教”的观点才引起了这场长达 20 多年的哲学大讨论。

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焦灼，任继愈决定在“中国无宗教”这一他看来的谬论上有所突破。任继愈认为，宗教是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学说一经抛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谁也未曾想到，在中国思想界情绪低落的时候，一个看似文弱的老者竟挺身而出，抛出一个“儒教是宗教”的观点，让学界开始重新思量。

1980 年，任继愈重新提出“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一篇又一篇的论述性文章在他手中源源不断地诞生。从 1980 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 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 1984 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 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 1988 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述中，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

任继愈认为，儒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所以，得出结论，儒教就是中国式的宗教。这一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并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理解和赞同。

### 领导古籍资料整理工作

担当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在写作、授课兼顾的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古籍资料整理工作。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积累时期，要实现

真正的文化繁荣还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因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转向对中华传统古籍的整理，为未来、为后辈学者打基础，积蓄了力量。

从1987年到2005年，任继愈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任继愈提出的整理佛教典籍的项目通过审批、国家立项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八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对比参照，由任继愈主编，开始了《中华大藏经》的编撰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

1992年我国开始编纂《中华大典》，任继愈应邀担任《中华大典》编撰委员会主任。此外，他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而这个时候，任继愈已经76岁了。《中华大典》计划完成8亿字的古籍整理，它属于类书的性质，相当于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地理等各个分卷，把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编辑。工程浩大，耗时惊人。《中华大典》办公室主任伍杰说，当时之所以要请任继愈先生当主编，就是觉得他在那层人里面是最能工作的，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人品好。

在他眼里，编撰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是“抢救”更是“铺路”。他毫不犹豫地将这双重责任扛在自己的肩头，他甘当铺路的基石，甘当拉车的老牛。作为本色学者，任继愈不求名利，默默耕耘，先后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等大型古籍丛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吃一些，后人用起来方便。”<sup>16</sup>对于古籍整理工作，任继愈说得很朴实。他的这些工作远离喧嚣，远离热闹，甚至远离公众视线，做这样的工作，尤其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扎扎实实的学风。这一点，在当前浮躁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其难得。

### 始终坚持科学无神论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人们从过去压抑、禁锢的气氛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给曾经沉闷、保守的中国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但与此同时，伴随这股新鲜活力一同进入的，也有苍蝇、蚊子一类的“害虫”，曾经遭到批判颠覆的神鬼、命运等封建迷信和西方不良思潮卷土重来，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重新有了“立足之地”，也在一些人的心中渐渐复苏。

---

<sup>16</sup> 李申：《任继愈的学术之路与学术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主义社会，封建与迷信思想在一些人心中还有着一定的地位，社会中存在着滋生它们的土壤。社会进入转型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外的各种思想也不断渗透我国，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在部分人中，产生了信仰迷惘或信仰危机。

他提倡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总结传统哲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才能有机结合，找出根本。他在《我们应该求助谁》一文中写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书上找现成的答案，那是愚蠢的。”言下之意，是要灵活掌握马克思的真正思想。任继愈还认为，研究宗教的，不能陷入宗教中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20多年，任继愈就始终不迷信任何宗教。

他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 三、“德能”思想

众所周知，任继愈是山东平原人，平原隶属德州市。有着“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的德州人杰地灵，黄河农耕文明与运河工商文明在此交融碰撞，北方地区独特的精神文明风貌孕育出勤恳务实、善良睿智的德州人民。任继愈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且杰出的代表。

#### （一）家国情怀，经纶济世

任继愈非常重视和关心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所做的古籍整理工作正是能够弥补传统文化继承的薄弱之处。任老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通过可视的文化风物、透过人文科学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历程，才便于勘破其文化深层的奥秘。他曾提到，国家缺少历史教育，年轻人应该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经久不衰，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有利条件。不管学习何种专业，接受何种技能，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抱有敬畏之心，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怀有崇敬之心，明白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多优秀，才能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工作做起来才更有动力，爱国主义是激发工作热情的强大动力。有了中国文化历史知识的基础之后，爱国主义就有了根，有

了归宿，可见教育大学生回顾历史、树立爱国主义家国情怀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有计可施的。

任继愈一向推崇书法，他认为中国人应当习书法，不仅仅是为了将字写漂亮，更重要的是，中国书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强有力的代表，在写字过程中也是在培养一种情感，培养对语言文字的情感，培养对书法艺术的情感，这本身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

任继愈还谈到过中国人共有的价值观，诸如爱国、忠孝、诚信等，这些在传统文化里是一个骨干的东西。这些像是水的波纹慢慢扩散，推己及人，由小及大，蔓延至整个民族。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所以经典的东西很有价值，是经得起推敲的。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sup>17</sup>任继愈坚信，学问的生命与理想来自浩浩汤汤的中华文化传统。

## （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任继愈经常对学生说，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搞学术不能华而不实、有名无实、抄袭剽窃。他说：“中国古代邮局顺口溜，叫做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兵器库的刀枪，光禄寺的茶汤。”他对学生解释说，太医院的大夫给皇帝看病，怕药不合适或太厉害吃出问题，就开些不关痛痒、任何人任何病都能吃的药方，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不至获罪；翰林院学士的文章堆砌辞藻，华而不实，无实质内容；因为不打仗，兵器都放着生锈了；光禄寺经常施粥，但是很稀吃不饱——都是中看不中用。他教导学生，研究学问，首先要掌握这一学科的全貌，整个历史，把基础打好，再去研究派别或断代。他经常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做学问、搞工作都要有这种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取得成就。”

立德树人，德行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对自身而言，“见贤思齐焉”；对国家而言，“德不孤，必有邻”。好的德行代代传承，任继愈和他的学生就是如此。他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方面，还体现在学习、生活各方各面。他对自己极为苛俭，资助学生却不计付出，他从回到北大起就经常资助困难学生。著名学者李泽厚至今念念不忘恩师资助他的那份情谊。

---

<sup>17</sup> 来自 2003 年版《中国书法全集》任继愈的题词。

### （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任继愈认为，人文学者必须接受经典教育、科学教育和现代精神教育，才能成为健全完整的人。所以培养人文学者要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来。无论是带学生，还是做学问，任继愈始终坚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为人十分谦和、低调，任继愈门下弟子众多，李泽厚、余敦康、张岂之等在上世纪80年代早已声名在外。李申师从任先生读硕士、博士，再到后来跟随恩师做学问、搞研究，前后有30余年时间，相随如此之久并能够进行多年合作的，这在近代师生关系中并不多见。李申在一次接受记者专访时，追忆心中的恩师：“一生中能够遇上这样的老师，是我的幸运。”

当然，在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而且是有古风的学者。任继愈生命中有刚毅、柔韧的气质，说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做人有原则，很坚持。此外，他也是一位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在做学问方面“择善而固执之”，体现了北大哲学系的开放精神。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任继愈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敢当铺路的基石。他的性格似乎就是哲学的性格，穷追不舍，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去探究新的问题，克服一个不圆满又会生出新的不圆满，追求无止境。任继愈说，人的存在是一个奇迹。为了回报这个奇迹，他一生低调不图虚名，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任继愈严肃的学术风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使后辈深受感染，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 四、作品赏析

### （一）书法作品赏析

任继愈喜爱书法，留心翰墨，发表过很多关于书法的观点，也应人之请题写了大量的书名、展标、牌匾和格言警句。读其书，赏其字，见其为人，由任继愈墨迹，不难一窥其治学风范和人生境界。任继愈在为《中国书法全集》题词中写道：“中国书法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发扬光大。”对于当代书法存在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如果书法技术不过关的话，成不了书法家，可是它不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它包括了文化素质在里面。整个的文化修养一部分表现在书法上，表现在学问上，表现在做人上。“我们说‘文如其人’，字也如其人，‘千人千面’，一个人应该是一个样子。现在的书法，缺的

不是临池功夫，缺的是学问。过去像王守仁、朱熹的书法，他们不是书法家，但他们的字大不一样。以后，书法不要断了。年青人要接上来，一个是临池练字，一个是念书。不要说写字，演戏也一样，演员学问不够，就不能深入，品位就不高，一个道理！”<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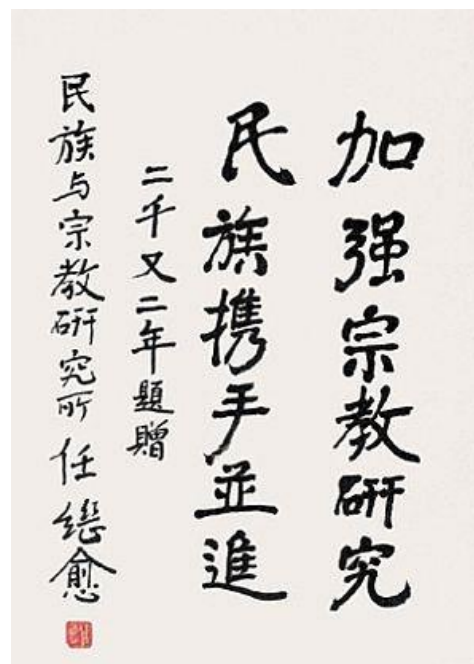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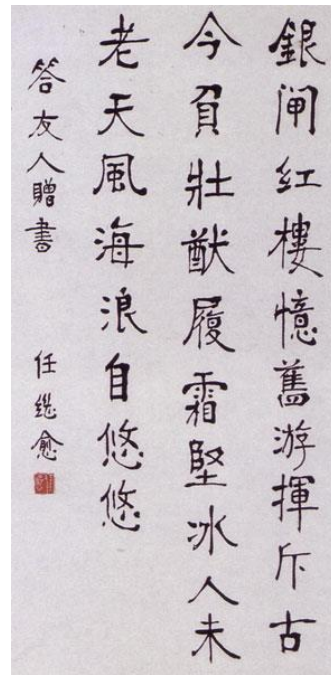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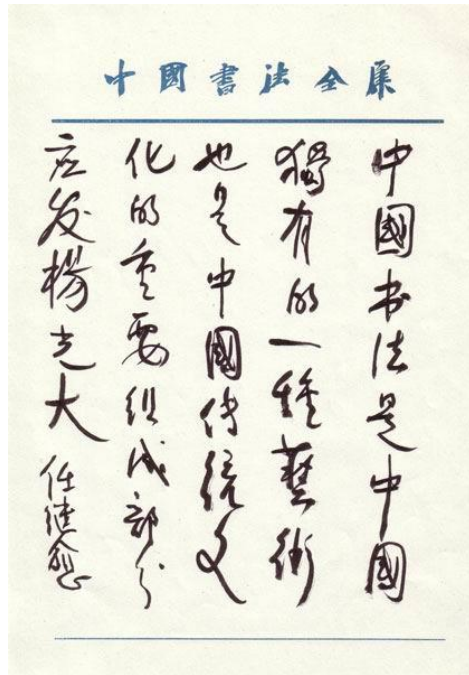
任继愈热衷弘扬书法文化，他与那个时代的很多学者有着同样的看法，书法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有艺术功能和陶冶功能。全世界文字都可以看作具有审美属性的书法艺术，但欧美的拼音文字一般不能成为专门的书法艺术，伊斯兰国家的文字有画画的意味仍然不能成为书法。只有中国的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型符号，真正成为精到艺术的“书法”也只有中国书法。因此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书法实在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sup>19</sup>

任继愈的书法，字体极其认真端庄，一笔一划，务求到位，体现了一种诚朴厚实的学风。这与任继愈沉静儒雅的性格关系极大，读书、公务之余，他会花不少时间临帖、读帖，因为他的字谨守楷则，可谓笔笔有来历，更显传统功力，充盈着蔼然儒者的浩然正气。任继愈的嫡传弟子田源撰文说：任先生的书法，是一种颤颤巍巍、平凡的、正统的、重细节、充盈且自信的隶楷字。充盈无疑来自大学问，平淡大概来自泰山经石峪，正统或者来自印光法师？总之很丰富，确实彰显了不少学问的神髓。对于任继愈的墨迹，仅仅从书写技巧的角度予以置评是狭隘的，联系其学问、修养来体悟其中的魅力，能帮助我们新的视角认识他为传统文化传承所做出的卓越成就。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任继愈的墨迹，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

---

<sup>18</sup> 来自 2003 年 8 月 28 日任继愈与《中国书法全集》编辑的谈话。

<sup>19</sup> 续鸿明：《中国文化报——美术周刊》，中国文化报社，2009 年。



## (二) 文章赏析

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sup>①</sup>（节选）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进行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国的经济实力正在一步步地壮大，科学文化水平正在一步步地提高。但是，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脚步声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

谐的音符，鬼神迷信的沉渣正在假借科学和民族文化的旗帜重新泛起，损害着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 **新的鬼神信仰的主要表现**

违背科学常识，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近几年来，有人公开宣扬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正宇宙之外，存在着一个由我们的亡灵组成的负宇宙，如此等等。

众所周知，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成就，就是证明了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神灵是不存在的。这样的思想成果使人类从有神论的长期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开动自己的脑筋，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了超过以往多少代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近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世界观的武装，就不会有近现代一系列的文明成果。因此，无神论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也是一切近现代科学思想的理论基石。假如我们仍然相信鬼神存在和灵魂不死，不知道求助自己的力量和智能，而向神仙皇帝祈求解救，只能永远当奴隶，就不会有现代社会。

新的有神论的重要特点，是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贩卖伪科学，宣扬真巫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中华民族有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化传统，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只能弘扬精华，不能弘扬糟粕。但是这些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风水，招亡魂，滥修小庙，向神灵求雨、求药，种种消沉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又猖獗起来。把糟粕说成精华，把迷信叫做科学。

### **新有神论的理论伪装**

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科学的权威性在于经得起检验，在同样条件下，用同样方法，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而科学骗子往往用非科学的手法，利用现场观察者的无知，运用魔术加骗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某些“大师”及其鼓吹者，打着科学实验的旗号，却拒绝严格的科学实验。他们玩弄的障眼法的表演，根本不是科学实验，与实践毫不相干。

一些自称预测大师的算命先生，常常利用许多所谓占算准确的“事实”来证

明算卦的灵验和有效。事实上，在对吉凶成败这两种对立因素或此或彼的选择中，根据数学概率原则，总会有一半是猜中的。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求卦者总是希望得到自己所企盼的结果，也总是倾向于记住与自己的希望相符合的结论，而在面对接触的情况下，人的表情、动作，都能够传递信息，经验丰富的江湖术士巧于从求卦者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信息，于是，占算的准确率又会提高许多。然而，这并不是各种占算术本身的准确。算卦实践的某种准确度，决然证明不了算卦术的真理。

算卦术是巫术的一种，它的前提，是承认神灵的存在。算卦所借助的那些道具和五行、干支等符号系统，和占算的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认为它们可以占算吉凶，是由于首先认为其中渗透着神灵的意志。古代的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去预测前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的、反复的实践使古人一步步地认识到，算卦术是不可靠的，古代医学家早已指出，信巫不信医，病治不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也警告，靠占卜打仗，将导致亡国。时至今日，人类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只有依靠科学的理论，依靠获得尽可能多的情报和信息，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人类千百年来的实践，不仅获得了足够丰富的认识成果，而且也批判地认识了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工具。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认识到人自身的感官往往容易被假象所迷惑，因而不能仅仅依靠它们来认识真理。于是发明了种种科学仪器，来补充和延伸感官的功能。借助这些科学仪器进行科学实验，所得出的结果往往和感官所得出的是不同的。如在视觉中，太阳是东升西落，绕着地球转；实际上，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类似的例子，每个受过现代中等教育的人都可以举出许多。但是一些人却硬要人们仅凭肉体感官承认他们魔术表演的事实和对这种事实作出的解释。当有人揭露他们的骗局，指出眼见未必为实时，他们反而指责揭露者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实践。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事实和实践，在严肃的科学面前，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任何经由长期实践和严格科学实验所产生的科学定律，都是客观的真理。任何客观的真理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绝对真理并不是存在于相对真理之外某个遥远的地方，而是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在自己适用的范围之内，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碰钉子。

**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

当前国际上重大的事变提醒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愚昧也要挨打；在愚昧的基础上，也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因此，我们在努力脱贫的同时，必须进行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那就是努力“脱愚”。只有整个民族摆脱愚昧，才能真正地脱贫。摆脱愚昧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

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是必要的，在当前的建设年代同样是必要的。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五四运动提倡科学精神，主张用科学的世界观代替落后和愚昧。当时科学口号的直接对象之一，是所谓“新灵学运动”<sup>[2]</sup>，这是中国传统迷信和国外洋迷信的杂烩<sup>[3]</sup>。他们用现代的技术去“证明”鬼神的存在，宣称只有发扬鬼神之说，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五四运动的先进分子，坚决反对旧的和新的迷信，从而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对于此后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向着新的社会制度前进起到了振聋发聩<sup>[4]</sup>的启蒙作用。

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之一，就是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十九世纪末叶，鉴于当时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形势，恩格斯曾经建议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翻译和大量传播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列宁继承恩格斯的思想，更加明确地指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落后和愚昧，单是进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提供给群众，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群众，用各种办法来影响群众，帮助群众从愚昧迷信中解脱出来，建设自己的新生活。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无神论的关系，类似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只有具备初等数学的扎实功底，才能学好高等数学；只有具备坚定的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才能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无神论的关系，又不完全等同于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不懂初等数学，或者初等数学的基础不好，就不可能谈论高等数学；但是有些不具备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人，却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这种自认出发，他们往往做出一些害人害己、甚至危害社会的蠢事，还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掌握一门科学，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知识。

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应注意处理好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与维护正常

的宗教活动的关系。我们长期进行的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是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本清源<sup>[5]</sup>，我们一面要大力宣传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一面要依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两个方面，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在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破除新的有神论，破除这些年来滋生的各种迷信，反对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各种非法、违法活动。因为这种新的有神论和种种貌似宗教、实为迷信的活动，不仅侵蚀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影响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而且也损害了正常的宗教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科学无神论，也是为了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我们坚持正面宣传，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关心下一代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一步一步地提高我国人民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就一定能促进我们的民族精神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 注释：

[1]选自任继愈《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江南论坛，2001年。

[2]新灵学运动：起源于1970-1980年西方的社会与宗教运动。涉及的层面极广，涵盖了灵性、神秘学、替代疗法等等。

[3]杂烩：“乱炖”，用几种原料混合烹烩而成的菜肴。也比喻把各种不同的事物胡乱拼凑在一起的混合体。

[4]振聋发聩：声音很大，使耳聋的人也听得见。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使他们清醒过来。

[5]正本清源：从根本上整顿，从源头上清理。比喻从根源上加以整顿清理。

### 赏析：

本篇文章从弘扬无神论的角度谈了脱愚的问题，敲响了脱愚的警钟，对推动我国社会正规地科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文章中肯定“当前国际上重大事变提醒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愚昧也要挨打；在愚昧的基础上，也无法摆脱贫

困和落后”。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欺诈泛滥等现象，仍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阻力，而要清除这些腐朽的现象，必须着眼于擦亮公众的眼睛，即“脱愚”。任继愈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论述科学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意义，表明了解决脱愚问题、提高文明水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主张不是去改变人们的有神论观念，而是改变有神论存在的社会基础。并且认为，信仰有神论的愚昧，和贫困一样，不是广大信仰者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神论的愚昧，如同对待贫困一样，不是简单地否定和反对，而是帮助不幸者“摆脱”。任继愈认为，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帮助人们摆脱有神论观念的重要举措。该文还提到，无神论宣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的。无神论宣传不可能消除有神论，就像医疗不可能消灭疾病一样。但是医疗可使许多患者恢复健康，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也可以扩大无神论者的队伍，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摆脱有神论观念的束缚。否认无神论宣传的必要和作用，是错误的。

自古以来，追求知识，摆脱愚昧，是一项艰巨费力的长期任务，也是志士哲人的奋斗目标。任继愈先生的“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主张，既是从古以来人类追求智慧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目标的坚持。

### 参考文献：

- [1] 任继愈. 任继愈论儒佛道[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 [2] 任继愈. 国际汉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 [3] 任继愈.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J]. 哲学研究, 1979, (4).
- [4] 严青, 郭改云. 真理的思考-任继愈传[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82-158.
- [5] 何南. 一代大师任继愈[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 [6] 郭齐勇. 存斋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M].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46-52.
- [7] 任继愈. 国史讲座·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J]. 决策与信息, 2010, (7).
- [8] 邹方芳. 任继愈的儒教观研究[D].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13.
- [9] 李申. 任继愈——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4, (1).

---